副总编辑：李瑞虹
责任编辑：周　彤
美术编辑：刘　燕
印刷：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82-714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3-0484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2546/D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发行代号：BM1082
定价：国内每本 10.00 元　境外每本 3 美元

47　台湾选举政治中的网络媒介及其影响 / 翁明源
50　蔡英文当局继续炒作消费陈同佳案 / 香港 姚志胜
51　国民党“双提案”是闹剧 / 刘红

宝岛之声 THE VOICE OF TAIWAN
55　解决政治对立台海才能持久和平 / 台湾 纪欣
58　让社区服务成为两岸交流重要角色
——从社区防疫服务说起 / 台湾 王裕庆

两岸交流 CROSS-STRAITS EXCHANGES
61　一次与母亲河亲密的相约
——“龙的传人·相约黄河”两岸媒体大美黄河行联合采访活动综述 / 孙永鹭
64　两岸青年互动与交流的助力与掣肘：以文化治理的观点 / 能武
67　2020 年 10—11 月海峡两岸大事记

两岸经贸 CROSS-STRAITS TRADE AND ECONOMY
70　台湾芯片产业现状与两岸合作前景展望 / 钟厚涛

海外统促会之声 VOICE OF CCPPR OVERSEAS COUNCILS
73　民进党当局逼近红线也逼近两岸最终统一 / [美国] 吴惠秋
74　纪念台湾光复 75 周年意义重大 / [菲律宾]董拔萃

历史
历史顾往 HISTORICAL RETROSPECTIVE
76　台湾“大一中架构”的名与实 / 王英津
80　凝固的岁月——寻访台湾义勇队在福建武夷山史迹 / 杨瑞荣



《统一论坛》集孙中山先生之墨宝

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超星期刊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合作媒体：
CNKI中国知网 www.cnki.net 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统一论坛》联络处

台湾
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一段 138 号之 1，4 楼之 1(荣爵大厦)
电话 :00886-2-23969678　传真 :00886-2-23979678
香港
香港九龙红磡崇安街 18 号半岛广场 17 楼 1701-11 室
电话：00852-31517576 传真：00852-31517977
澳门
澳门士多纽拜斯大马路 1-1B 号东曦阁 3 楼 A 座
Avenida de Sid ó nio Pais, No.1-1B, Edf. Tung Hei Kok,
3 andrar A, Macau
电话 :00853-28702791　传真 :00853-28703531
喀麦隆
B.P 13000 Douala CAMEROUN
电话 :00237-9993352　传真 :00237-3437633
南非
39 Faiesiand Ave. Cyrildene Johannesburg 2198 South Africa
电话 :0027-11-6228521、6164816、6156068
传真 :0027-11-6163720、6228534
尼日利亚
Golden Gate Complex.25B Glover Road. Lkoyi. Lagos, Nigeria
电话 :00234-1-2695337　传真 :00234-1-2695192
菲律宾
Unit 1108 Dasma Corporate Center #321 Dasmarinas St.,
Binondo Mla Philippines
电话 :0063-2-2477141　传真 :0063-2-2449973
日本
横滨市中区山下町 166 番地中山纪念堂 1 階〒 231-0023
电话 :0081-45-6818879　传真 :0081-45-6643278
日本国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八丁目 2 番 12 号 〒 104-0061
电话 :0081-3-35717611
韩国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新沙洞 587-13 番地新东和 B/D
电话 :0082-25438833 传真 :0082-25428280
泰国
149 Galaxy Place,Nonsee Road(Rama Ⅲ)
Chongnonsee Yannawa,Bangkok 10120 Thailand
电话 :0066-26811777 传真 :0066-26811764
爱尔兰
9 Kilcronan Court,Clondalkin Dublin 22,Ireland
电话 :00353-1-4578193　传真 :00353-1-4578193
比利时
GROTE MARKET 38 9100 SINT-NIKLAAS BELGIUM
电话 :0032-3-7760565　传真 :0032-3-7767470
波兰
02-202 ul.drawska 17,Warszawa Poland
电话 :0048-22-8223062/63　传真 :0048-22-8223061
丹麦
OESTERBROGADE 132 2100 COPENHAGEN OE DENMARK
电话 :0045-40412238　传真 :0045-35428033
俄罗斯
电话 :007-095-7377941　传真 :007-095-1664319
荷兰
Francina spoel straat 21 2135 HK Hoofddorp Holland
电话 :0031-647490890　传真 :0031-235354661
罗马尼亚
Romania Bucureati Bd. Basarabia, Nr.244,BL.MYB,Sc.B,Ap.39
电话 :0040-722227038　传真 :0040-213482122
葡萄牙
Av. Boavis TA 1588, SALA 314, 4100 PORTO-PORTUGAL
电话 :00351-917847880　传真 :00351-226063289
塞尔维亚
JURIJAGAGARINA 87/229 SRVIJA BEOGRAD
电话 :0038-163249888
传真 :00381-11-2260874　00381-11-3185788
西班牙
C/LEGANITO 4’’ 1B 28013 MADRID SPAIN
电话 :0034-915422324　传真 :0034-915481994
意大利
MONTESUELLO 9 MILANO ITALIA
电话 :0039-3386309396、 0039-021701258568
传真 :0039-0270125856
英国
61 FitzJOHN’S Ave London NW3-6PH U.K.
电话 :0044-207-4356087　传真 :0044-207-1688501
哥斯达黎加
De la entrada principal de las pisinas de plaza viquez 100 metros al norte sobre la linea del tren apartamentos de color Amarillo con portones de color caf é .San Jose, Costa Rica
电话 :00506-22227952 / 88856468
美国
370 RIVERSIDE DR. #2A New York N.Y.10025 U.S.A.
电话 :001-917-2243356、 001-212-2221699
传真 :001-212-2221699
墨西哥
Calle Azucena No:4061 Esq con Blvd.Agua Caliente Plaza
Estancia Local 7 Fracc.Del prado C.P.22105 Tijuana, B.C
Mexico 电话 :0052-664-6080188　传真 :0052-664-6084666
澳大利亚
Suite 97, Level 9, 420 Pit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 :0061-2-92818911　传真 : 0061-2-92818966
斐济
26 LAUCALA BAY ROAD SUVA FUJI P.O.BOX17019
电话 :00679-3362829、9916823　传真 :00679-3311288
瓦努阿图
P.O.BOX 282 PORT VILA VANUATU
电话 :00678-22881　传真 :00678-26848
新西兰
NZ Wgtn Assc Promoting Peaceful 16 Arnot Ave
Upper Hutt New Zealand
电话 :0064-4-5266518　传真 :0064-4-5266518
巴西
RUA DOS ESTUDANTES, 15 APTO.33 LIBERDADE
SAO PAULO BRASIL CEP 01505-001
电话 :0055-11-32098762　传真 :0055-11-32720180
厄瓜多尔
AV AMERICA 109 Y JOSERIOFRIO QUITO ECUADOR
电话 :00593-2-2236624　传真 :00593-2-2507786
智利
Av. Chile Espana 330 Nunoa Santiago-Chile
电话 :0056-2-2250945　传真 :0056-2-2250945

“十四五”规划建议擘画两岸关系发展

■ 吴为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建议。这是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做出的纲领性重大战略规划建议，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明确路径，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雄厚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指引了方向。

一、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引领两岸关系发展大势

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对“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做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建议》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列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的目标任务，阐述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政策主张，必将为广大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发展创造更好机遇和更广阔空间，必将为推进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奠定更坚实基础，提供更有力支撑。

“十四五”规划建议在深入、准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台海局势的基础上，科学明确地提出两岸关系发展路径和方向。首要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只有坚决维护这一基础才能推动祖国统一。重要的发展路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共同弘扬中华文化。这明确了两岸关系发展仍然要扩大交流合作，促进融合发展，同时要积极致力于运用文化共鸣增进同胞心灵契合。祖国大陆主动积极作为的方面，在于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祖国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台商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祖国大陆上市，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这些充分体现了祖国大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践行造福台湾同胞福祉的承诺。建议还指出要加强两岸基层和青少年交流，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这既明确了祖国大陆要争取的是广大台湾同胞尤其是基层和青少年支持，反对的是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充分展现祖国大陆既关心关怀台湾前途发展，同时又绝不会容忍任何“台独”分裂的底线。

二、深刻认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为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积极奋进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并将向台海方向传导。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激烈，美国新任总统将继续加紧“以台遏华”战略，打“台湾牌”力度不会减弱。民进党当局在岛内“一党独大”，不断操弄“渐进台独”“法理台独”，

制造两岸敌意对抗，限制两岸交流合作，打压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发展的积极力量，不断“绿化”台湾社会土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进程面临着一系列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

也要看到，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中国不仅是其中的参与者、受益者，还日益成为引领者、塑造者。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朝“西降东升”方向发展。中国抗疫斗争在全球率先取得巨大成效，经济发展展现强劲韧性和良好势头。综合实力持续发展，对引领和塑造两岸关系发展的能力更加强劲，对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的实力更加突出。所以，尽管台海形势面临各种各样挑战，只要祖国大陆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两岸走向统一是必然历史大势。

总体看，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治基础，加大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总根源。其行径挑战祖国大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严重冲击台海和平稳定。但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是决定两岸关系走向、引领民族复兴进程的关键因素。当前，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祖国统一进程的信心更足、能力更强、条件更多。

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关乎两岸关系发展方向，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是“九二共识”的核心要义。“九二共识”对两岸建立互信、开展对话协商、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得以实现正是建立在这个重要政治基础之上。“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不容否认和破坏。实践已经充分表明，坚持“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台湾同胞就能受益；否认“九二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会受到危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就会受损。

民进党当局2016年在台湾重新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否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根本性质，不断抛出否认“九二共识”的谬论，充分暴露了其顽固坚持“一边一国”分裂立场、企图破坏“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谋求“台独”的本质。“九二共识”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任何人、任何势力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将之翻篇，对之歪曲抹黑。

民进党当局炒作只存在“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而不存在“九二共识”，是妄图抹煞两岸“两会”协商会谈成果。“九二共识”达成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过程事实很清楚。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就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进行协商。通过“两会”代表1992年10月香港会谈及其后“两会”一系列函电往来，“两会”达成了共识，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双方都表明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对于一个中国政治涵义，台湾海基会表述“认知不同”，海协会表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作了求同存异的处理，从而确立了两岸商谈的政治基础。这是双方平等沟通协商、运用政治智慧达成的，不是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其过程和内容均有明确的文件和文字记录。

“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重要历程中都得到了两岸双方的共同坚持，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九二共识”达成后，“汪辜会谈”顺利举行。2005年4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谈，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明确了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展对话与交流，改善两岸关系，维护

台湾统一与“被统一”的异同、心态及前景

■ 周天柱

近年来，尤其是2020年台湾选举之后，与台湾学者深入交流时，发现对方的关注点已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仅停留在“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更为关注的是统一与“被统一”等以往禁区。这也印合了岛内一项持续、重要的社会调查。依据从2017年起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做的长期追踪调查研究，台湾社会“预期未来的统‘独’走向”项，以“被统一”居多，高达49.7%-51.2%。

台湾统一与“被统一”的异同

谈及台湾统一与“被统一”的差异，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虽从语句上两者仅差一个字及一个标点符号，可其时代意境、核心意涵却相差甚远。

首先应该看到，这两者的最终目标完全一致，即祖国大陆与台湾合而为一，实现中华儿女久盼的祖国统一大业。这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必须完成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只可提前，不容滞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解决台湾问题，有时限，但暂无具体时间表。

其次论及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则归属为路径、方法及手段。如果说最终目标是战略总图，那

台海和平稳定。马英九2008年上台执政，明确承认“九二共识”，“两会”立即恢复制度性协商，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等23项协议，开启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新征程。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举行历史性会晤，两岸领导人在会晤中都强调坚持“九二共识”。这些都充分证明“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支柱性作用。

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才有保障。2008年至2016年，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两岸双方建立和增进了政治互信，为两岸交流合作、协商谈判创造良好条件，两岸“两会”举行11次领导人会谈，签署23项协议，达成一系列共识。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建立联系沟通机制，部门负责人实现互访。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蓬勃发展，两岸人员往来规模创历史新高，2015年达到985.6万人次，其中台湾居民到祖国大陆549.8万人次。两岸双方务实沟通，妥善处理涉外事务，台湾以适当名义和身份连续8次出席世界卫生大会，1次列席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与新加坡、新西兰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反观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全盘否认“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协商大门关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折损，两岸关系发展遇阻，台湾民众福祉受损。历史事实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对话协商就能顺利开展，两岸关系就能行稳致远；什么时候否认“九二共识”，两岸商谈就难以为继，台海形势就会紧张动荡。

“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政治基础不容否认，也无法破坏。无论民进党当局怎样歪曲抹煞，其一手摧毁两岸互信的基础，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的事实昭昭，其责难逃。

路径、方法、手段纯属战术范畴。既然祖国大陆已明确宣示，必须实现最终统一，不可一代一代拖下去，若台海双方都有意愿选择“统一”项，当然就比较好办。祖国大陆与台湾都想到一块，有意愿携手合作，共通共融，迈向统一，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的长治久安。这是历经几十年理论研究，再结合现实观察，谁也无法否认的合理结论。当海峡两岸心平气和坐下来谈，统一的成功已有了一半的希望。双方都愿意以对话取代对抗，以谈判消除分歧，各种问题一一摆到桌面上，通过友好协商，逐步解决问题，最终共同走向两岸的统一。

但若台湾想尽办法“以拖待变”(所谓“维持现状”其实质就是“以拖待变”)，甚至处心积虑抗拒统一，那负有高度历史责任的祖国大陆只能“对拖施压”，“统一”只能借助于有形、无形的“铁扫帚”来扫除“台独”灰尘。“铁扫帚”不到，灰尘自然不会自己跑掉。至于“铁扫帚”如何扫掉灰尘，那就要视届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见招拆招，采取不同方法。这不是简单到只能通过武统加以解决，也不是一味局限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唯一路径。但有一条必须强调，双方有意愿谈“统一”，台湾手头掌控许多砝码，有许多办法可以自如运用，最后获得最符合自身利益、较为满意的结局。而落到“被统一”的地步，在外力的作用下统一，原先掌控的砝码便会大量流失，要想最大程度维护自身设想的利益，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台湾统一与“被统一”的心态

社会学家指出，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归结为社会心态。台湾的统一与“被统一”，与岛内的社会心态息息相关。这一点谁也不会轻易否认。而社会心态往往通过社会主流民意表现出来。谈及岛内的社会民意，台湾有一句话十分形象，叫做民意如流水，时时在变。而在民进党长期、压迫式地灌输、唆使下，当今的台湾社会，尤其是2020年选举后的岛内氛围，变得如此诡异、压抑、反常，真叫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明白。

新冠肺炎爆发后，一水之隔的台湾也受到冲击。面对疫情的蔓延，外界大多认为，不论是基于防疫工作的需要，或是两岸民间往来密切的情形，台湾应与祖国大陆合作抗疫，方能有效地防治新冠肺炎。可台湾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大肆“反中”，将抗疫心力都花在如何借此凸显台湾“主权”，切割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连结，想尽办法“以疫谋独”，与祖国大陆唱对台戏，借此拼命扩散“台独”政治病毒，蓄积“反中拒统”的政治能量。

更有甚者，如今的台湾进化到无法容忍一丁点儿“中国”因素的存在。只要有一点“中国”的声音，蔡英文当局及其豢养的媒体和网军便会猛扑过去，群起攻之，其走火入魔的癫狂和偏执与邪教已无二致。在他们的党同伐异之下，加上凭借政治权力制造的政治高压，岛内各界已噤若寒蝉，唯剩“台独”“反中”“抗统”的叫嚷。

然而，这种不可一世的举动，对台湾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向上提升了，还是向下沉沦了？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正是这一幕幕层出不穷的“反中”“仇中”“抗中”戏码，正在把台湾引向一个低智化且道德沦丧的社会，正一步步窒息台湾的生机与发展，进而企图全面阻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之路。这岂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社会？！尽管人们有理由相信，它并不能代表台湾社会大众真实的心声，但无论如何这绝不是正常社会应有的现象。

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疫病，就因为它是在祖国大陆发生，民进党当局及其拥趸就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连人类最起码的道德良知都不顾。这难道不是道德沦丧？！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大陆建立良好关系、分享中国大陆发展机遇的时候，蔡英文等却在变本加厉地干“台独”“反中”“仇中”“抗中”的勾当，充当某些外国反华制华的棋子，执意与14亿祖国大陆人民为敌。

眼下在执政党拼命型塑“台

独”唯大的岛内，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逻辑推理，你要爱台，就得“反中”，“反中”与爱台划上等号。随之而来就是拒统。当社会民众一举一动被泛政治化，被“仇中”、“拒中”、“反中”、拒统意识形态化，这个社会的正常心态确确实实已被严重扭曲，已被掏空颠覆。若再进一步，持有这种心态还若无其事，沾沾自喜，那离祖国大陆被迫推行的台湾“被统一”就仅一步之遥，随之所付出的代价将悔之莫及，无法挽回。

惧怕心理的脆弱因素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长期调查中，一半左右的台湾民众认定“被统一”是台湾终极命运，现今“大陆因素”已成为无法摆脱、影响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至今蔡英文当局仍“天真”地认为，只要抱定美国，就可摆脱“被统一”的结局，但与笔者接触的几乎所有的蓝绿及无色的学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是不屑一驳的伪命题。

回顾国民党执政8年，领导高层视“统”为洪水猛兽，闪避唯恐不及。“独”性当头的民进党执政至今，两岸关系更是由“冷和”快速走向“对抗”。虽然祖国大陆倡导“心灵契合的统一”，但在民进党“台独”病毒驱使下，台湾民众惧怕统一的心理越来越脆弱。而这种惧怕、脆弱，集中表现在“惧大”。拿台湾学者的话说，这要分为三步予以解析。第一步，“惧大”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天生就对“巨大事物”存在害怕心理。第二步，由于近10多年原先自认为优越的台湾经济、文化，逐步乃至全面被祖国大陆超越，优越感丧失的同时，失落感、沮丧感随之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上一下的剧烈变化，脆弱的心理承担不起，陷入被边缘化、无法挽回的困境。第三步，失落、沮丧再掺和恐惧，这三者之间不断产生化学反应，让因怕而缩，因缩更怕的心理不停搅合，再在民进党当局的极力煽动、蛊惑下，拒统的心理随之发酵。由此形成的有色眼镜，用来观察祖国大陆，疑神疑鬼，歪曲抹黑，这是“统战阴谋”，那是“打压台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前已所述，两岸的最终统一，与岛内民众的社会心态有着压倒一切的密切关联。针对彼岸民众拒统心理的发酵，祖国大陆必须做好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蔡英文迫切想在台湾社会形成一张张抗拒统一的网络，有可能通过颁布一系列“绿恐法案”，再助长民众的惧怕心理四处膨胀而逐步成型。对此祖国大陆应该“以法制法”“以法反法”，予以反击。

台湾统一与“被统一”的前景

展望台湾“被统一”的发展前景，有几个重要问题必须厘清。

一、“被统一”正在加速，台湾社会准备好了吗？

对于这个敏感问题，岛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台湾朝野无疑是仍处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地步。蔡英文一再声称，“拒绝任何被统一的过渡性安排”。但拒绝“被统一”，绝非“台独”政权能力和实力所能及。民进党继续执政无疑会加速两岸统一进程。台湾根本无法脱离祖国大陆，这是“台独”分裂势力永远的痛。因此，台湾现在的选择以及民进党当局未来能做什么，与他们对台湾前途的单向思维或一厢情愿关联不大。在当今祖国大陆发展不断加速的大背景下，民进党的持续执政正导致两岸统一方式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有迹象表明，可能会从祖国大陆一再提倡的两岸民主协商，共议统一，逐步转变为台湾非自愿走向“被统一”的归宿。

二、在中美“大两岸”的战略博弈下，如何解决台海“小两岸”的“被统一”？

民进党当局一直认为，并不断向岛内民众宣扬这种观点，即西太平洋地区对于美国永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与战略价值，而台湾则在西太平洋发挥阻挡中国大陆冲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战略作用。因此台湾虽小，但在美国各届政府心目中，举足轻重，无法替代。美国竭尽全力力保台湾脱离中国大陆是坚定不移的政策。但蔡英文没有精算的是，时代在变，世界格局在变。中国大陆迅速发展，迫使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逐步战略收缩与撤退，而

收缩、撤退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有可能放弃台湾。美国若在战略利益驱使下，与中国大陆达成某种战略默契，最终放弃台湾，两岸的统一即可加快进行。

与此同时，祖国大陆对任何战略问题的思考都充分做好两分法，即做好最坏的准备，同时向最好方面努力。美国战略分析家坦陈，美国军力虽全球第一，但要想布防在全球每一角落，进而掌控全球并无可能。更关键的是，西太平洋距中国近，离美国远。所以从军事上分析中美在西太平洋何时开战，以及谁将胜出，就取决于美军的介入能力及中国反介入能力的较量。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说到底，也将取决于将要到来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对此一形势做出判断，李光耀作为一个有智慧的政治家，或许他的观察与分析值得参考。李光耀说，中美必将在西太平洋出现对抗，结果是中国胜出，因为这个地方离中国近。这正如国台办原副主任王在希所说：“用什么方式来统一，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实力、我们的决心以及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到位。”

三、如何让台湾民众不怕祖国大陆，真心欢迎统一？

要让台湾民众不怕祖国大陆，真心欢迎统一，最为重要的是祖国大陆不但要宣传统一对台湾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有哪些具体好处，更要通过各级政府落实各项惠台政策，让更多台湾民众看到，祖国大陆政府和民众对台湾、对台湾同胞的善意。

今年3月，上海的台湾律师李梦舟在送修电脑途中突发脑出血，被素不相识的上海江沪公司职员龚为民发现后，当即报告了公司董事长谢益元。谢益元立即指示拨打120，并安排就近送到第四人民医院。在此过程中，谢益元还安排公司总经理黄永春和副总经理郭金平一同前往，并拿了自己的银行卡，先行支付抢救费住院费共3.5万元。120急救车送李梦舟入院后，医院神经外科立即成立医疗救治小组。经过两周的努力救治和精心护理，李梦舟病情转危为安，并恢复了瘫痪肢体的活动功能。

心怀感激的李梦舟说道：“疫情非常时期，我受到非常关爱。大陆朋友的无私相助，让我真实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真切感受到了两岸同胞的手足之情。”

抗疫期间，这类“两岸一家亲”的感人事例，在上海，在祖国大陆时有发生，第一时间在岛内引发强烈反响，加深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好感，也有利驱除对两岸统一的担忧与恐惧。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讲话中再次重申，“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两岸统一肯定要由祖国大陆主导，台湾的任何积极变化也需要由祖国大陆的动力去触发。对此一定要形成坚定的认识。为最终实现两岸统一，祖国大陆还需要有不断承重的决心、意志和耐力。

首先，蔡英文的胜选，掩盖不住更解决不了台湾经济民生的固有矛盾。如果民进党当局坚持进一步分化台湾社会，坚持进一步与祖国大陆对抗，恶化两岸关系，最终受损的只能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福祉，台湾的未来也只能继续向下沉沦。一旦台湾“被统一”后，极端“台独”分子必将受到严惩。

其次，这么多年来，祖国大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与此同时也一直在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经过与“台独”势力的无数次较量，早已经证明祖国大陆是有能力遏制“台独”的。时至今日，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了不能“独”的集体意识。如果民进党错判形势，铤而走险，必将遭到灭顶之灾。

第三，不管台湾岛内怎么闹、怎么乱，祖国大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定力与节奏，始终把“做好自己的事”放在第一位。当前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正在分裂祖国的绝路上越走越远，和平统一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但祖国大陆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强，台湾“被统一”的速度正在加快。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始终由祖国大陆掌控。

台海形势变局之下
如何认识与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 王建民 倪霞

两岸融合发展是党中央提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重大方针政策。近年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政策举措，取得一定进展与成效。然而，中美关系形势巨变与岛内政局发展，特别是蔡英文当局在“抗中亲美”与“脱中融美”战略下，积极配合美国，抵制与阻挠两岸融合发展，甚至推动两岸经济“脱钩”与两岸文化“断链”，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带来重大冲击与挑战。在此严峻复杂形势之下，如何认识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需要有新的思维，做出新的判断，提出新的路径。

一、当前两岸融合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与主要挑战

海峡两岸与国际形势均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岛内政治格局与政治路线的调整，对祖国大陆倡导与推动的两岸融合发展带来很大挑战。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内，两岸关系发展除统“独”(实质是“台独”与反“台独”)较量之外，还将呈现推进融合发展与抵制融合发展、加强两岸经济紧密关系与推动两岸经济“脱钩”的斗争与较量。可以说，两岸融合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一)台湾当局推动两岸经济“脱钩”企图日益明显

蔡英文当局推动两岸经济“脱钩”源于政治上的“台独”分裂主义政策与路线。搞“台独”分裂，即实现台湾独立，必然要寻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避免两岸经济关系的紧密发展，避免台湾经济对祖国大陆的过度依赖。这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一贯主张。特别是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在首次就职讲话就明确提出“告别过去以往过度依赖单一市场现象”主张，是谋求两岸经济“脱钩”的重要讯号。蔡英文用“告别”一词，就宣告了蔡英文当局有意切断两岸经济往来，就有两岸经济“脱钩”之意，只是当时各界还未普遍使用经济“脱钩”概念。当时笔者将其定位为“经济台独”。当美国明确提出与推动中美经济“脱钩”之后，学界才意识到蔡英文当局谋求两岸经济“脱钩”之深意。

蔡英文虽从未明确使用两岸经济“脱钩”概念，就像她不曾明确公开表示台湾独立一样，但其所作所为全是推动“台独”分裂活动，也在全力推动两岸经济“脱钩”。其实，蔡英文不只是要推动两岸经济“脱钩”，而是要让两岸全面“脱钩”，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台湾独立。蔡英文在政治文化上全面推动“去中国化”与经济上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管制，均是“脱钩”与“台独”的重要举措。

至于蔡英文当局能否真正做到两岸经济“脱钩”，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像中美之间很难彻底经济“脱钩”一样，却不会改变美国推动中美经济“脱钩”的战略，会给中美关系带来重大伤害。况且，事实上，不论是美国还是蔡英文当局，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领域已达成了局部或部分“脱钩”的事实或效果。在多种因素交织影响之下，近年来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放缓，而台商返台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依台湾经济主管部门统计，截至2020年9月10日，“投资台湾三大方案”，投资台湾的企业计641家，批准投资金额11046亿元新台币)，

已出现某种程度的两岸经济“脱钩”迹象，只是还无法彻底改变与扭转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

（二）蔡英文当局对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设置了更多政治法律障碍，尤其是建立了一套详细地遏制与阻挠两岸融合发展的法律制度

蔡英文上台后，没有出台任何一项推动或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反而是全面强化管制、遏制与阻挠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上台之初，蔡英文当局就解散了经济主管部门下设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工作小组，放弃了马英九当局推动多年并致力于两岸经济园区对接的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特别是推动修订一系列加强两岸人员、资金、技术、产品等往来规范、管制、处罚的法规，包括所谓的“国安六法”与“反渗透法”等，对两岸交流合作与协商设置了层层法律与政策障碍，核心就是要抵制与阻挠两岸融合发展，阻挠与遏制两岸和平统一。这些法规政策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重大制度性障碍。2019年以来，加上2020年的新冠疫情发展，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受到严重影响。

（三）不断阻止与防范祖国大陆资本进入台湾

尽管两岸经贸关系密切，两岸年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其中祖国大陆对台湾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但这并没有改变蔡英文当局对祖国大陆产品、资金与人员等进入岛内的防范意识与持续加强管制的做法。

祖国大陆一直鼓励与支持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发展，但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资本进入台湾则具有强烈的防范心态，即使马英九执政时开放祖国大陆企业赴台投资，也在绿营强烈反对与压力下采取了特别严格的限制措施，开放是非常有限的。自2009年台湾当局开放祖国大陆企业投资台湾10余年来，到2020年7月底，祖国大陆企业对台直接投资累计只有23.4亿美元，还不到近年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额最少年份的三分之一。近年来，蔡英文当局更是不断清查陆资、打压陆资、处罚陆资。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于2020年8月宣布对陆资从严审查，重订陆资认定标准，不再以某一最终投资总额占股30%作为陆资认定标准，而是采取“逐层审查”，即每一次转投资都以30%认定。同时，台湾当局禁止台湾企业代理经销爱奇艺与腾讯等祖国大陆OTT（网络视听）服务业务。其核心就是要阻挠两岸双向融合发展，防止所谓祖国大陆资本对台湾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影响。在此政策限制之下，未来祖国大陆资本与企业进入岛内发展更加困难。

（四）岛内“反中仇中”社会政治气氛更加浓厚

近年来，台湾岛内政局与社会政治气氛发生重大变化。蔡英文上台执政后，彻底改变了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形势，终结了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时代，两岸关系形势急转直下，陷入对抗僵局，并持续恶化。绿营全面执政，推行“抗中亲美”与“脱中融美”战略，操控社会舆论，制造祖国大陆“威胁论”与“打压论”，岛内社会政治气氛发生重大变化。尤其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岛内出现强烈的“反中抗中拒中仇中亲美”的“台独民粹主义”气氛，民调显示支持“台独”的比率显著上升，而且出现强烈的“仇中”现象，广泛认同与支持蔡英文当局对陆生、陆配、未入籍陆配子女的公然歧视性政策，进一步恶化了两岸关系，不仅两岸政治军事对抗升级，而且两岸民间对抗与对立情绪显著上升，严重影响两岸融合发展。

二、台海形势巨变之下如何认识两岸融合发展问题

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同时出现重大变化形势下，如何认识与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确实需要做出科学、客观、正确的判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做法，既避免盲目急躁心态，又要避免消极退缩情绪，才能行稳致远，稳步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一）持续坚定两岸融合发展的正确道路与历史大趋势

美国推动中美经济“脱钩”与蔡英文当局推动两岸经济“脱钩”，给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这是客观存在与现实。但这种“脱钩论”与“脱钩”

战略，违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不符合两岸人民与全人类发展的普遍期待，是一股历史逆流，因此站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与追求两岸关系和平统一的高度，仍要坚持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正确道路，不为一时的逆流与困难所改变。

同时，两岸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在新时期确立的对台大政方针，是一条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发展道路，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正确道路。因此，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与阻挠，都必须坚守这一信念，坚持这一正确的对台方针政策。即使未来两岸统一了(不论是和平统一还是非和平统一)，还是要持续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现深度融合。

(二)坚持与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符合并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

处理涉台问题或两岸关系发展要服从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与整体利益，服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对台工作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各项对台工作自然要服从与服务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服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当前情况下，在和平统一条件尚不成熟情况下，在被迫最后使用非和平统一手段之前，就要继续坚持两岸融合发展理念，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要揭露与批判蔡英文当局推行两岸经济“脱钩”的政治图谋与危害，争取与团结广大台湾同胞融入到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来。

蔡英文当局两岸经济“脱钩”思维与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配合美国推动的中美经济“脱钩”与美国遏华战略，确实对国家总体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与困难。在此形势下，就更需要从国家总体利益与国家全局战略高度认识两岸融合发展问题，以便为应对这些巨大挑战赢得更多时间与更大空间。

(三)避免情绪化，不轻意使用对台“经济制裁”，避免掉入蔡英文当局设立的两岸经济“脱钩”陷阱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中美关系形势与外部环境之下，在两岸关系恶化与蔡英文当局有意推动两岸经济“脱钩”之下，依然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在两岸之间，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言战争；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在推进两岸融合发展进程中，也不轻言对台“经济制裁”，不轻言终止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事实上，不论是当前的美国当局，还是台湾的蔡英文当局，均有意制造两岸经济“脱钩”，甚至引诱中国大陆中断两岸经济交流，实现两岸经济“脱钩”。如果祖国大陆轻意采取对台经济制裁手段，中断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正好掉入了蔡英文当局设置的两岸经济“脱钩”陷阱，不利于两岸融合发展，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倡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并不能放弃政治原则与政治斗争，仍需要持续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与一切抵制两岸融合发展与谋求台湾独立的反动行径进行坚决斗争。

(四)要认识到坚持与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有助于化解敌意，降低两岸紧张气氛

蔡英文当局采取“抗中去中反中仇中”政策，加深了两岸之间的敌意与对立，甚至利用新冠疫情激发岛内激进的“台独民粹主义”，使岛内出现更为强烈的“仇中”情绪与现象，进一步恶化了两岸关系。这不符合两岸同胞的利益，不符合中华民族总体利益。在此形势下，祖国大陆要因势利导，在坚持反“台独”斗争的同时，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以争取更多台湾同胞的理解与支持，逐步化解两岸的敌意与紧张气氛，为未来两岸和解、合作与融合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五)要了解祖国大陆庞大的市场与政策支持，蔡英文当局两岸经济“脱钩”企图难以从根本上阻挡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基本发展格局

尽管蔡英文当局极力推动两岸经济“脱钩”及配合美国推动两岸“断链”，但依然难以改变两岸紧密的经济联系，难以扭转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基本态势。据

海关统计，2020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1126.7亿美元，同比增长7.8%，其中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852.5亿美元，同比增长7.7%。据台湾财政主管部门统计，上半年台湾对祖国大陆（包括香港）出口668亿美元，同比增长9.8%（其中8月出口增长22%），祖国大陆（包括香港）市场占比上升到42.3%。前半年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额31.7亿美元，同比增长52.5%；台湾上市上柜公司在祖国大陆投资企业1191家，占全体上市上柜企业1609家的74.02%（祖国大陆之外的海外上市上柜企业1274家，占总数的79.18%），在祖国大陆获利达1543亿元新台币，创历年同期新高，投资收益汇回台湾的金额5087亿元，占原始投资金额的20.15%，也创新高。可见，在强大的市场力量之下，蔡英文当局违背市场规律与经济利益原则的两岸经济“脱钩”图谋是难以实现的，是阻挡不了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基本态势的。

三、台海形势巨变之下如何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对大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台海两岸形势以及两岸融合发展有了正确认识，就要在这样的认识与思维下，寻找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适当方法、手段与途径。

（一）在现阶段坚持以单向融合为主、相互融合为辅的两岸融合发展道路

理论上两岸融合发展应该是双向的，是相互推动与促进的，是双向政策驱动的，既有市场需求的动力，又有政策的引导与推动。然而，由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蔡英文当局采取了抵制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还企图推动两岸经济“脱钩”，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两岸融合发展双向推动就遇到很大阻力。现阶段只能采取以祖国大陆为主体的单向融合策略，同时也不排除或排斥一定程度的双向融合。在岛内政治环境改变与两岸关系改善之后，有条件时再推动两岸双向融合发展。

（二）以两岸经济融合为主，目前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重点之一是巩固、发展既有两岸产业链与供应链

现阶段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应以两岸经济产业融合发展为主。两岸经济关系经过40多年的恢复与发展，已形成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绵密的两岸产业链与供应链，促进了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面对美国与蔡英文当局经济“脱钩”“断链”思维与作为，中国大陆在表达反对立场的同时，要持续推进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坚定巩固与完善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尽管部分台商因种种原因回流台湾与外移，但大部分台资企业并没有外移与回流，也不易外移与回流，已紧密融入到以祖国大陆为主体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之中。当前形势下，祖国大陆需要做的是，充分了解台商的新需求，协助解决台资企业经营发展面临的新困难，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让其更好融入到两岸产业链与供应链之中。

祖国大陆有关部门要深入台资企业调研，充分了解其困难与需求，有针对性地为台资企业发展与进入供应链提供必要协助。同时，在不同行业与产业，在行业协会支持下建立产业链与供应链联盟，发挥好两岸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

（三）要善于借鉴台湾经济产业发展经验与企业经营管理理念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不只是吸纳台湾产业、资本、技术与人才等生产要素，还要重视台湾企业家精神，要借鉴台湾推动经济产业发展的经验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做法，并积极引入与融入，与祖国大陆生产要素相结合，成为企业与产业发展的一种新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台湾在推动经济与产业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创造性或创新做法，尤其是扎实、务实与精细的企业家精神，官产学界合作的制度建设与做法（日前启动的“全球智慧供应链中心”与农业生技领域的“产学链合作奖”是典型代表）。台湾这方面的理念、经验与做法，值得祖国大陆学习，可作为一项专门课题进行研究，吸取经验，融合到祖国大陆经济发展进程中。这是一种新的两岸经济融合途径。

同时，将台湾的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与做法引进祖国大陆，融入到祖国大陆的科技创新之中，

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这可以视为两岸经济的软性融合与知识融合。

另外，今日台湾经济有较强的竞争力，关键在于台湾在许多行业有一批优秀的、极具竞争力的企业。这些企业培育了精益求精、专业进取、不断创新的企业精神。在未来两岸经济融合过程中，要善于学习、引进与融入台湾企业先进的经营理念与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让两岸企业家智慧充分融合，激发强大的中华创造力。

（四）积极落实现有惠台政策措施，政策要细化与具体化

中央与地方出台了大量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的政策措施，但政策效能未能有效发挥，效果不甚明显。关键是目前政策条例原则性强，部分敏感度高，具体方案少，操作性不强。未来对台工作重点不是出台更多的涉台惠台政策措施，而是完善与落实既有“31 条措施”“22条措施”“11条措施”，及各地政府出台的诸多惠台政策措施，列出明确的政策措施清单，做好政策配套，提供更好的政策服务，让现有惠台政策发挥更好的融合效果。

（五）要利用好现有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平台

中央与地方建立了许多对台交流合作以及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平台。以福建省为例，就有海峡西岸经济区、平潭综合试验区、国家级台商投资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台湾农民创业园，与诸多闽台青年交流合作基地。



平潭一景

另外，还有非对台平台也发挥着对台工作功能，如厦门经济特区、福州与厦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未来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不一定再设立更多的平台与机制，这样会分散资源与精力，而是建设好、整合好现有平台，发挥现有平台的作用。

（六）充分发挥企业与市场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中的作用

两岸关系受政治因素影响大，发展过程起伏不定，但近40多年来两岸民间互动合作从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民间经济社会往来一直在发挥着积极作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就是要充分发挥两岸广大企业与民间社会组织的优势。同时要充分利用好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重要引导作用，让市场在两岸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角色。

祖国大陆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在新形势下提出推动新基建、推动双循环发展，要鼓励台资企业与有志于到祖国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抓住机遇，融入到祖国大陆新的发展进程之中。

台湾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尽管“台独”分裂势力已经坐大，而且掌握了执政权，但台湾还有广大的“反独”“不独”与“非独”力量。广大台湾同胞希望两岸和平，希望两岸交流，希望两岸合作。在两岸现行法律政策框架下，要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突破政治障碍，让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合作中来，参与到祖国大陆现代化建设之中。祖国大陆要为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学习、工作、经商与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化服务，尤其是创造更为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与氛围。拉近两岸民众心理距离，促进两岸社会融合发展。

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转变给民进党带来“冲击”

■ 周忠菲

美国大选进入冲刺阶段前后，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画风”出现某种改变，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各自释放了一些前后矛盾的信号。这些信号显示，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有可能转向追求“某种战略稳定”(在华盛顿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肯尼迪语)。此种战略考虑传递到对台政策，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激进分裂主义的“台独”路线，肆无忌惮地默许台湾民进党当局挑战地区稳定的做法，也可能出现变化。这种“冲击”对民进党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点。

使用“画风”一词，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并未进行根本性调整，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大陆发展，仍然是美国的战略诉求。但“画风”改变也意味着，美国因战略需求变化，今后对台政策将“更加多元”。过去单一集中，通过支持台湾当局挑衅行为以激化海峡局势，强化中美对抗程度的做法可能改变。也意味着，对民进党“暗画红线”，释放“加强风险管控”的信号，成为可能。

美国对台政策“画风”发生变化，这对依靠两岸关系紧张逻辑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将产生冲击，岛内政治会进一步分化。当前民进党当局释放了一些“放软身段”的动作，以应对美国对台政策“画风”的变化，但台湾当局不会轻易接受“缓和路线”。对民进党当局挑衅海峡和平，以身试法的冒险性，应随时保持高度警惕。

一、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画风”有所改变

特朗普执政以来在中美关系上不断挑衅，贸易战、科技战、法律战、舆论战、外交战，几乎穷尽所有手段。2020年下半年，美国打“台湾牌”更加肆无忌惮。然而随着大选“冲刺”阶段临近，美国涉台“画风”出现某种改变。例证有：

其一，美国大选首场辩论并未“聚焦美中关系”。美国媒体对此解释为：“释放美国从中国的边缘后退之意。”(10月6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而在大选初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8月11日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休·休伊特(Hugh Hewitt)采访时表示：“如果这次选举唐纳德·特朗普输了，中国将拥有美国。如果我没有赢得选举，中国将拥有美国。”末尾还加上一句，“(这样)你们会不得不学习讲中文(You're going to have to learn to speak Chinese)。你们会想知道真相的”。

9月29日，首轮大选辩论正式开场后，“真相”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辩论中，特朗普和拜登都回避阐述各自的政策主张，都不提具体政见，事前渲染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问题、种族主义等议程设置，统统在“言论互殴战”中被“弥漫”、被“跑题”、被“脱轨”。当晚美国媒体对辩论报道使用的头条标题，意外地保持高度一致：不涉及任何政策报道。媒体将这场辩论定位为“政治抹黑秀”，内容集中批其“纯属混乱”和“无穷无尽的吐槽”。其中《纽约时报》的评论是：两位候选人对彼此的尖酸蔑视，在现代美国政坛可谓闻所未闻。《华盛顿邮报》称：“哥们儿，别插嘴，闭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难得“委婉”地擦边点评为：“首场辩论并非主持人原本可能期待的，那种平和的政策理念交流。”甚嚣尘上的舆论中，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场全美关注的首场大选辩论中，中美关系“意外地”没有被提及。

其二，行政部门发声，调子有变。美国中期选举

时，副总统彭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曾高调发声：“美国绝不会在南海退缩。”彭斯声称：“特朗普的领导起效了。中国想要一个不同的美国总统。”中期选举后，彭斯又“画龙点睛”，抛出“美国受到威胁说”。彭斯宣称：“就像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发现中国正在试图干预我们美国的民主。”其后，美国围绕南海、台海，涉台动作“层层加码”。进入8月，美台关系往“突破行政限制”和强化武器售台两个方向发展。先是环境与卫生部部长访台，后又策划副国务卿访台。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见台湾驻纽约办事处人员。美国行政部门进一步放风说，“不排除国务卿可能访台”。个别高官甚至释放“美台可能建交”信号。中国大陆以战机飞越台湾“领空”，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回击。就在台湾当局大声喧哗“共军来犯”的同时，两岸所有民航班机如常运行，显示祖国大陆维持区域稳定的能力。

10月9日，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表态有所“微调”。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本届政府一直不懈努力，以确保我们与中国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的谅解能够得到落实。”他的进一步表述是：“认识到台湾是美中冲突点，（我们）不想这样。”主持人提到英国《金融时报》当周有篇文章谈“中国和美国是否会因为台湾开战”。主持人追问，“一些美国议员、军事专家和一些对华鹰派人士，呼吁华盛顿对台湾防务做出更明确的承诺”，请问“国务卿有何看法？”蓬佩奥的回答提到“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的承诺”，提到“向台湾出售武器”，以及“确保台湾及其周边航行自由”。蓬佩奥调整以往的强硬立场，将中美关系描述为“有一系列已经存在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谅解”。蓬佩奥在采访结束时戏剧性地宣称：“我们想要和平”，“但我们将确保履行我们对台湾的所有义务。”就是说，举起“和平”旗号，绝不放弃敲诈。

其三，美舰“低调”穿越台湾海峡。10月14日，美国海军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贝瑞号”(USS Barry—DDG 52)，“低调”穿越台湾海峡，这是今年以来美国军舰第10次穿越台湾海峡。国际社会观察到，美国政府对此次行动，事前和事后均未做任何“声张”。此举遭到中国政府强烈指责，严厉警告美国，“不得侵犯中国领海领空”。

10月20日，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工作小组”再次“按部就班”地在售台武器问题上发出挑衅信号，提出所谓中国问题“包裹式法案”。国会除了旧调重弹“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等项目外，还宣称10月13日国会提出的，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计划（包括水雷、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在内的7种主要武器系统），其中有3个项目已获国务院批准。对这一“强化”动作，国会强调说，是为了“维持美军阻止中国大陆武力攻台”。这是美国首次出售空对地长程武器给台湾，也是特朗普政府第8次对台军售。而这次是在突破防卫性武器范畴方面，试图打“擦边球”。这就是美国的“和平”面目。在释放“准备从中国边缘后退”信号之后，又开始“强化”美国与“台湾安全”的关系。

台湾民进党当局立即利用美国此举“壮胆”，不过采取的方式是由“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紫云出面发声，表白台湾“不会主动发动攻击”。不忘强调，过去美国对台军售都属“消极防卫武器”。这次出售的空对地长程武器，“按以往狭义的防卫性武器定义，是不可出售的”。随后，美台对媒体炒作的“美国军机飞越台湾”一事，做出“绝无此事”的“澄清”。这种反应与宣称“美台联手”共同“应对中国威胁”的高调形成反差。台湾民进党当局的表现，有所“收敛”。

二、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关系紧张的逻辑受到“冲击”

美国大选冲刺阶段释放出的，中美关系可能转向追求“某种战略稳定”的信号，反映出美国在社会、政治、国际关系三对矛盾关系中，社会、政治矛盾更加突出。内部矛盾尖锐化带来的危险性，使美国决策层认为有必要在世界战略和中美关系方面追求缓和。极有可能，这种考虑不受大选结果的影响并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样，美国对台政策中利用民进党制造两岸关系紧张的需求，出现相对下降。对民进党而言，其制造两岸关系紧张的政治逻辑，必然受到“冲击”。近期，“台独”分裂主义势力将出现三大不安。

第一个不安：“激进台独”政治路线的“合理性”受到挑战。

1月以来，踩着中国大陆与美国冲突的节奏，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激进台独”的举动越来越疯狂。还记得1月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充满挑衅的“新年贺词”吗？还记得3月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自己是抗击疫情的“战时总统”时，民进党当局立即跟进，在其外事网站上公然把新冠病毒定性为“武汉病毒”吗？还记得“双十节”民进党当局“打着中华民国台湾”旗号，那些充满敌意的对祖国大陆“喊话”吗？这些举措，直接导致两岸紧张局势直线式上升。

现在看来，8月以来，由美国批准部长级官员和副国务卿访台，民进党高级官员散布“美台可能建交”等政治冲刺，不得不告一段落。而民选政治下，岛内各种“政治暗礁”将变得突出。“反中”“中共威胁”等政治口号，成为民进党的“累赘”。台湾执政当局在两岸事务上“坐冷板凳”，与祖国大陆“没有任何交集”的现状，对民进党构成巨大压力。

第二个不安：经济政策走不出“误区”。

民进党的不安也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其一是民进党执政以来对世界经济趋势，中国大陆经济复苏能力判断的失误。许多台湾工商界人士指出，民进党的经济政策始终处在错误的方向，信奉“美国优先”，进口美猪美牛，期待台美自由贸易协定，全都成为泡影。台湾没有从美国得到任何经济利益，还要面对美国战略收缩带来的困境。民众对经济状况的满意度，接近创历史纪录低点。即使不与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相比，与陈水扁第二执政期相比，也是危机重重。最典型的是民进党不遗余力鼓吹的“新南向政策”，前景堪忧。台湾工商界人士指责执政者如今一味空谈台湾“经济结构改革”“产业升级换代”，却回答不出台湾经济增长的基础在哪里。这种经济政策，无异于“空穴来风”。认为台湾经济要发展，不能不思考大陆在东亚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中地位的重要性。未来大陆经济复苏，将促进周边经济体发展，产生更大的市场作用。民进党的两岸经贸经济政策，只会使台湾对这种趋势反映迟缓，颗粒无收。

此外，还有台湾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定位问题。后疫情世界经济表明，中国大陆作为世界重要生产基地与全球供应链上最重要一环的地位，不可能被取代，跨国企业仍将中国大陆视为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进行布局。世界多个外商投资咨询公司调查结果显示（包括台商在内），大部分大企业仍然肯定中国大陆市场，不会轻意撤离。认为中国大陆在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上仍然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台湾是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体，无论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如何变化，台湾在产业链上的地位主要是生产和加工组件。在地区生产链问题上，与祖国大陆的互补性关系，仍然非常重要。民进党设置障碍，“弃陆投美”，攻击祖国大陆“经济沉沦”。现在，眼看“台美供应链蓝图”破碎，内心黯然不安。出于政治考虑，又不敢承认“误区”。可以预见，由于疫情出现长期化趋势，民进党在经济政策，尤其是两岸经贸关系上，面临的压力将迅速增加。

第三个不安：挑起两岸军事冲突的空间被美国压缩。

如前所述，美国对台政策“画风”改变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准备用两手政策应对中美关系，美国需要打出“和平”旗号，同时又不放弃继续用“台湾牌”进行敲诈。但美国“需要某种战略稳定”也是现实需求。这个前提，导致美国对民进党在军事上挑起海峡冲突的空间进行压缩。

陈水扁时期，台湾在军事战略方面选择“决战境外”，暗含与祖国大陆对抗之意。现在的民进党当局，不但公开宣扬祖国大陆是台湾“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且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以此作为杜绝两岸缓和的手段。

现在，美国释放“低调”信号。从美国的算盘看，在保持所谓政策连续性方面，扩大售台武器，鼓吹“美台联手”，上演“军事合作”大戏等，是对中国大陆施压，也是利益敲诈。在对台政策“画风”改变实现真实目的方面，美国需要在更高层次上顾及如何实现其“战略稳定”。因此，需要对台湾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挑起两岸冲突的政策空间进行压缩。美国盟

新形势下优化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创业就业机制服务统一大业

■ 曾晓栩

一、两岸关系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新形势

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安全和战略等领域的分歧与竞争激烈。美国不愿看到自身被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与其完全不同的中国赶超，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和围堵。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美国以“台湾牌”为工具对华掀起新攻势，台湾民进党当局“倚美抗中”，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两岸关系呈现全新复杂严峻的新态势。

（一）美国对中国采取全政府全方位的遏制战略，在国际上煽动对华敌意

特朗普自2017年开始执政以来，将中国树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持续收紧。从白宫到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门，美国行政部门在对华政策上基本已不存在部门分歧，呈现出全政府全方位的对友对周边安全形势的认知，也不让美国放纵“台独”。例如，日本新任首相出访越南时提出，日本政府反对任何可能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行动。最近，日本在“亚洲版北约”表态，也强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又如，作为美国“印太战略”重点的印度，据媒体报道，疫情可能导致其经济倒退三年。更加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以实际行动显示了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这种建立反华包围网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美国也担心，一旦形势失控，自己蒙受损失。因此，美国有可能“适时”举起对“激进台独”进行“管控”的“尚方宝剑”（陈水扁第二执政期，美国曾经公开警告，如果海峡局势出现的失控是由于台湾当局的“误判”引起，美国“不会介入”）。从亚太安全层面看，美国对台政策“画风”的改变，具有“画红线”的警示作用，民进党当然“感到不安”。

8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在涉台方面采取一连串疯狂动作，试图刺激中国大陆，在海峡进行贸然应对。短短两个月，美国涉台“画风”就出现转变，说明美国内部矛盾尖锐，美国对世界战略和中美关系将进行调整。这也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差距大幅缩小的一个反映。

民进党推行激进“台独”路线，试图在中美冲突中寻找筹码，依靠两岸关系紧张，实现长期把持政权的算盘，目前，这种盘算被美国猛敲了一记。在美国对台政策“画风”改变带来的“冲击”下，民进党面临“三大不安”。

近期，民进党当局在两岸关系上做出了“放软身段”的动作，开始就“寻求两岸和平”发出“试探信号”。这些现象说明，民进党当局的“两岸紧张逻辑”已经走不通。但也要看到，只要民进党不放弃“台独”党纲，美台勾连就会以各种形势再现。只要美国还在中国家门口撒野，民进党就不可能真心寻求两岸缓和。

美国对台政策“画风”的改变，只是反映了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在台湾问题上对利益需求的调整。中美之间面临的是长期较量。中国追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决心不可动摇。对民进党挑衅海峡和平，以身试法的冒险性，须随时保持高度警惕。

华遏制态势。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将美中对抗定调在制度之争与价值之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以及蓬佩奥等美国政府高官、部分美国国会议员针对中国议题，在国际社会不断炒作“中国病毒”等负面论调，对中国政治体制和中国共产党频加指责和诬蔑，利用疫情追责索赔等问题，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煽动对华敌意，试图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感，加剧中国与美国、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冲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4月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 (66%) 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达到2005年这项调查以来最低点；62% 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

(二) 美台关系持续升级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底线

特朗普在正式执政之前与蔡英文直接通电话，执政之后签署一系列友台法案，对台军售不断。美国访台官员层级升高，执政团队挺台动作频频，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底线，以“台湾牌”为筹码遏制中国大陆的图谋明确。特朗普政府极为重视“台湾牌”的战略和战术价值。在国会和行政当局内部亲台势力的竭力推动下，特朗普政府通过立法、军事和外交等手段加大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力度。

打“军事牌”协助台湾提升对抗中国大陆的能力，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2019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公然把台湾地区称作“国家”。2020年以来，美国军舰和军机持续在南海、台海地区展开高频次所谓“自由航行”行动，为蔡英文当局撑腰意图明显。特朗普把台湾列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借印太战略平台强化美台合作内容，抬高台湾的区域安全战略地位。美国为台湾量身定制了增强台湾自主防卫能力的“不对称战力”作战策略。为提升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的能力，美国加快对台军售节奏，提升售台武器的针对性，对台军售常态化，协助蔡英文当局尽快获得装备“不对称战力”的武器。特朗普执政以来，已经宣布了8批一百多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甚至在2020年5月21日蔡英文连任上任第二天，就再度批准售台1.8亿美元鱼雷，被台湾岛内鼓吹“台独”的媒体热捧为最好的贺礼。美国在同意售台 F-16V 战斗机后，逐渐解除部分对售台武器和技术转移的限制，在台湾建立 F-16战斗机维修中心。蔡英文当局甚至希望借助这一合作协议，在台湾建成 F-16机队亚洲维修中心。为帮助台湾提升现役军事人员素质，美国大幅增加台军赴美交流和进行军事训练的机会。在中国大陆开展对台军事威慑军事演习过程中，美舰美机频繁对中国大陆进行近距离窥探。

选举期间频派高阶官员访台，充分运用“台湾牌”拉抬选情。2019年5月，经美国同意，台湾地区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CCNAA)”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TCUSA)”，将“台湾”与“美国”并列，旨在凸显“台湾”的政治身份。特朗普签署通过了一系列涉台法案，从“与台湾交往法”到“台北法案”，以及每年一度的国防授权法，为提升美台关系提供法理依据。以相关涉台法案为基础并付诸实施，提升美台高阶官员交往，美国派往台湾的政府官员层级一次比一次高。继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访台打抗疫“台湾牌”之后，国务院副国务卿科拉奇于9月17日访台，成为自1979年美台断绝外交关系后访台的国务院最高层级官员。科拉奇访台也是特朗普团队选举策略的一部分。美国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助长“台独”分裂势力嚣张气焰。批判中国对抗中国是特朗普的选战主轴策略，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美台关系升级必然引来中国大陆的批评与反制，激化美中摩擦关系，可为其拉抬选情。

(三) 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人员交往，在台湾岛内建构“去中国化”社会生活环境

2016年民进党再度执政之后，一是快速开展一系列“去中国化”“去中华文化”“去蒋化”等行动。如移除蒋介石铜像、停办抗战周年纪念展、台北故宫“本土化”、大幅删减语文教科书文言文比例、裁撤“蒙藏委员会”等。二是以“维护台湾安全”“防止大陆渗透”为借口，充分利用执政优势，特别是在立法机构中的多数优势，通过“国安五法”和“反渗透法”

等一系列“修法”“立法”，建立限制和惩罚两岸交流的机制。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民进党当局的一系列防疫政策操作，也带有强烈的“去中国化”和“反中抗中”特质。如防疫只针对中国大陆不针对欧美，再三阻挠中国大陆后续加班机运送滞鄂台胞回乡，对滞留武汉台胞的证件进行特别标注，不顾人道而将台胞拒之门外；不让陆配无台籍子女入台；拒不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对新冠肺炎的命名规则，跟随欧美反华势力使用“武汉肺炎”“中国肺炎”，操纵“网军”散布“中国用病毒攻陷台湾”等极端言论。民进党的这些行为在台湾社会基本上都没有遇到真正的阻力。据《美丽岛电子报》4月28日民调显示，大部分台湾民众满意蔡英文当局的表现，蔡英文的满意度创出新高为70.3%，比3月的69.4% 再升高，为2016年上任以来的高点。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当局推行的防疫政策的反应，显示出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蔡英文当局“去中反中”言论所左右，认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蔡英文当局一系列“以疫反中”“以疫谋独”的表现。

9月，祖国大陆举办海峡论坛，为了阻挠两岸交流，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9月3日发表声明称，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禁止岛内办理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同时禁止台湾当局人员参与，也不乐见地方官员参与，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也不行，“奉劝民众及民间团体，勿轻易参加”。此外，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还恫吓台湾民众称，当局已完成所谓“国安五法”及“反渗透法”等修订，民众应“避免触法”。

二、继续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对两岸和平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我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一如既往尊重台湾同胞、关爱台湾同胞、团结台湾同胞、依靠台湾同胞，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广大台湾同胞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不分阶层、不分军民、不分地域，都要认清“台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祸害，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两岸同胞要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蔡英文当局十分清楚，如果不遏制两岸融合发展、不阻断两岸互通往来，不阻止两岸民意碰撞和交流，其两岸全面“脱钩”的策略就会失败，因此，目前蔡英文当局在法律层面、行政层面借由各种手段限制台湾公职人员赴祖国大陆参加相应活动。民进党当局对海峡论坛下禁令，把恐吓对象从公职人员下沉到普通民众，连视频参与祖国大陆活动的形式都被禁止，这种极其恐怖的恫吓手段恰恰是其心虚的表现。民进党当局打着安全的旗号，其实是害怕两岸民间互动会动摇其“执政”基础，正因为如此，要采用更多办法和手段拓宽两岸交流的途径。同时也要有信心，即便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逆历史潮流，但目前两岸交流的大门已经打开，打开了就很难关上。

三、争取台湾青年一代工作刻不容缓

李登辉与民进党当局通过教改修改课纲，进而进行“台独”史观建构，改变了青年一代对中国的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政治认同。“台独”种子随着教改落地，植入台湾社会土壤之中，现在处在开花结果之时，已经制造并且还在制造更多的“天然独”世代。当前的台湾青壮年一代，过去二三十年间正处于学习受教育阶段，是人生观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形成时期，但因受“台独”教材荼毒，对历史事实大多是非不分，同时也大幅降低了对中国的认同感。在民进党刻意营造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网络媒体、舆论氛围等影响下，在生活、言语使用与政治倾向上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使得很多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认同“台独”意识与社会价值观。后天制造而成

的“天然独”不是不了解中国，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系影响，在国家民族认同上，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在自我认知上，自认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自认为展现对“台独”的忠诚与对“中国”的仇恨才是真正的“爱台湾”。在民粹盛行和“绿色恐怖”氛围下，很多理性的人不愿或不敢发声，只要政治或史观立场稍有不同，就会被攻击，舆论暴力铺天盖地。而“以台湾为主体”的“台独”理念，正在被普及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携手推动民族复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实现同胞心灵契合等重大主张。2019年3月10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明确要求，“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习近平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及台湾同大陆的关系存在一些误解，对台湾前途命运存在一些误判。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要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把工作做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心里。要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民族、对国家的认知和感情，消融一些人的心结。要在对台工作中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

四、优化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就业创业机制

祖国大陆2018年推出惠台利民31条措施，2019年又推出26条措施，2020年为帮助在祖国大陆台企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推出11条措施。习近平对新形势下两岸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强调要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有所作为，尤其是要持续推动台湾青年赴祖国大陆交流学习工作生活，增强青年人的归属感，助力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一）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就业创业存在不足

一是政策知晓度不足。祖国大陆的惠台政策很难深入台湾岛内宣传，台湾民众知晓有限。二是台青的认识不足。台湾青年对祖国大陆的政策认识不足，希望拥有超国民待遇而不是同等待遇，易产生落差心理。三是服务体系有不足。服务体系的短板主要包括政策覆盖面不广，就业创业门槛较多，相关创新创业基地在管理模式上、孵化体系方面的不足等。四是社会力量参与不足。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参与较少，社会资本对台湾青创企业投融资力度不大。

（二）优化台湾青年在祖国大陆就业创业机制

优化制定与执行机制，提高政策实效。加强对各项就业创业政策的指导与鉴定，做好各类基地的风险管控与评估工作；利用大数据对在祖国大陆的台青进行个性化管理与引导，优化政策的执行力。

开展有效宣传，提高对政策细则认识度。一是以台湾青年习惯的方式开展宣传。以“台味”语言和新潮的方式制作相关宣传手册，活用台青经常使用的自媒体平台，创新宣传渠道。二是深入岛内宣导，依托台湾地区社会民间组织在台湾进行政策细则内容的宣传，增进台青的信任感。

完善服务体系，提高就业创业成功率。一是提供职业规划服务。建立创业项目信息库、就业资源渠道、项目和市场专业评估机构，进行个性化事业规划。二是强化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扩大优惠政策的覆盖面，推动金融政策的落实，落实在祖国大陆就业的补贴政策，拓宽就业领域。三是强化平台的服务功能。建立有助于提高决策运行效率、统一规划建设和统一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平台，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四是提供精神援助。为失败的青年提供精神上的引导，将台青就业失业纳入援助范围，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就业创业救急基金。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一是发挥行业协会优势。通过行业协会帮助台青认识行业发展状况、政策优惠条件，降低就业创业风险。由行业协会中的会员单位提供实习岗位、信息与咨询及培训服务，提升就业创业技能。二是发挥社会组织优势。鼓励台湾青年参与祖国大陆基层建设与服务、民生调研，接触祖国大陆基层，积极组织有丰富经验的社会组织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提供服务。三是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鼓励民间资本开发有助于青年创业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为台湾青年提供服务。

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五）

五、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民主改革不仅废除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且变农奴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使农奴拥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进程，西藏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逐步与全国同步，西藏各族人民不断享有日益丰富的现代文明成果。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发展水平

民主改革使翻身农奴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发展生产的激情、创造财富的活力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西藏农牧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西藏的生产总值1960年比1959年增长45.8%，人均生产总值增长42.9%，均为历史最高。1959年冬至1960年春，农业区修水渠长达1500公里，修整水池300个，扩大了灌溉面积37万余亩。1960年又修水渠5000公里，水库、水塘1500个，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1959年冬至1960年上半年，西藏共积肥料110亿公斤。到1960年春，农区耕地面积扩大到273万亩，比1959年增加了30万亩。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使农牧民群众的生活显著改善。以乃东县（今乃东区）克松乡为例，民主改革初期，全乡119户中有90多户缺口粮，到1964年不仅全乡农户家家有足够口粮、种子和饲料，而且95%的人家有了余粮。到1961年底，西藏牲畜存栏总数超过了平叛前的最高水平，达到了1206万头（只）。

在分得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国家还为分得土地的农民配备了生产工具，无偿拨给农牧民366957件铁制农具。之后的几年内，政府向农牧民发放了几十万件铁制农具，并且在拉萨、昌都、日喀则、江孜、泽当和林芝等地新建了小型农具制造厂。

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中央政府立足西藏实际提出了“稳定发展”的方针。1961年“农村26条”和“牧区30条”下达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据统计，到1965年西藏粮食总产量达到29万吨，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66.1%；牲畜存栏总数达到1701万头（只），比1958年增长54.1%。这一时期，西藏的交通、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重大进展。到1965年，西藏公路总里程达14721公里，是民主改革前的2.6倍，西藏90%以上的县有了公路，仅拉萨市区就新修了8条柏油路，95%以上的居民用上了电灯；西藏小学达1822所、在校生66781人，中学4所、在校生1359人，中等专业学校1所，高等学校1所；专业文艺团体和电影放映单位133个；医疗机构发展到193个、床位数增加到1631张、卫生人员增加到2947人，分别是民主改革前的3.1倍、3.4倍和3.7倍。1966年，林芝毛纺厂建成投产，是西藏历史上第一座现代化毛纺企业。1965年，中尼公路建成通车。1973年，滇藏公路通车。

——实现了经济结构根本性转变

经过60年的奋斗，西藏农牧业彻底走出了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困局，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含农林牧渔服务业）由1959年的1.28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34.14亿元。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18.29万吨增加到2018年的104.9万吨；粮食单产由1959年的1370公斤/公顷提高到2018年的5688公斤/公顷。农牧业特色产业从小到大、快速发展，具有西藏高原特色的农牧业品牌

建设成效显著，建成了一大批优质粮油生产、无公害蔬菜种植、标准化奶牛规模养殖、特色藏猪藏鸡养殖、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基地。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经过60年的发展，西藏已建立起一个包括能源、建材、机械、采矿、轻工、食品加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20多个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告别传统的生产模式，逐步达到现代化水平。工业增加值从1959年的0.15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14.51亿元。

经济总量实现了巨大飞跃。2018年，西藏全区生产总值1477.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9年的1.74亿元增长了约191倍。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59年的73.6%下降到8.8%，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到42.5% 和48.7%。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全域旅游快速推进。2018年接待游客3368.7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90.14亿元，10多万农牧民借助旅游业增收致富，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成效初显。商贸物流、金融保险、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新业态发展迅速，正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面推进了基础设施建设

旧西藏没有一条正规的公路。和平解放后，西藏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建设开始起步，国家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修建了青藏、川藏公路及通往各地区的较低等级的公路。民主改革后，迅速建设了新藏、滇藏、中尼等干线公路，青藏、川藏公路也陆续铺起柏油路面，并建成了拉萨至贡嘎机场的高等级公路。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公路、铁路、航空为主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截至2018年底，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到9.78万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660公里；全区所有县通公路；全区697个乡镇中579个实现通畅，696个实现通达；全区5467个建制村中2624个实现通畅，5457个实现通达。2006年，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2014年建成了拉萨到日喀则铁路，拉萨到林芝铁路现已进入铺轨阶段。


青藏公路

航空站和机场建设不断推进。1956年，西藏建成首个简易机场，现在已建成通航机场5个，开通国内国际航线92条，初步形成了以拉萨贡嘎机场为干线，以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日喀则机场为支线的航空网络。

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仅供少数上层贵族且断续发电的小水电站。1960年，纳金水电站建成发电，拉萨普通市民首次用上了电灯。此后，羊湖、沃卡、查龙、金河、直孔、狮泉河、雪卡、老虎嘴、藏木、多布、果多、觉巴等水电站，羊八井地热电站，大型并网光伏电站等相继建成。以水电为主，油、气和可再生能源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基本形成。实现青藏、川藏电力联网。城镇供暖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冬，拉萨市城区首次实现了天然气供暖，同时也满足了居民生活用气需求。截至2018年底，区内主电网延伸到62个县（区），供电人口272万人，其他地区通过小水电、光伏局域网、户用光伏系统等方式初步实现用电人口全覆盖。（待续）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Sixty Years On(Ⅴ)

V.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abolished the feudal bondage of individual serfs to serf owners, and enabled the people to be masters of their own affairs. It replaced serf owners' land ownership with peasants' land ownership, which allowed serfs to own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significantly liberated and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Since China adopt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Tibet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nd have now caught up with the national level; the people in Tibet are sharing more and mor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 Improving productive forces

Democratic reform in Tibet enabled the former serfs to own their own land, farm tools, cattle and other means of production. They showed ever growing passion for working hard to create wealth.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gressed significantly.

From 1959 to 1960,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 prices, Tibet's GDP grew by 45.8 percent and its per capita GDP rose by 42.9 percent, both of which represented a historical high. From the winter of 1959 to the spring of 1960, 1,500 km of new water channels were built and 300 reservoirs were repaired in the agricultural areas, adding more than 24,666 ha of irrigated land. In 1960 as a whole, 5,000 km of new water channels were built along with 1,500 new reservoirs and ponds, which further expanded the area of irrigated land. From the winter of 1959 to the first half of 1960, Tibet collected 1.1 million tons of fertilizer. By the spring of 1960, arable land had expanded to an area of 182,000 ha, an increase of 20,000 ha over 195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ed t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live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Take the example of Khesum Township of Nedong County (present-day Nedong District). In the early days of democratic reform, 90 of its total of 119 rural households suffered food shortages; by 1964, all of its rural households had sufficient grain, seed stock, and fodder, and 95 percent of them had surplus grain. By the end of 1961, Tibet's total livestock inventory reached 12.06 million heads, surpassing the highest recorded figure before the 1959 rebell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rovided farm tools to peasants in Tibet who had acquired land. For example, some 367,000 metal farm tools were given free to the peasants and herdsmen. In the following yea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stributed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farm tools, and built small farm tool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in Lhasa, Qamdo, Shigatse, Gyantse, Tsethang, Nyingchi and other cities.

After democratic refor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opted a policy of stead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al conditions in Tibet. In 1961, the CPC Tibet Working Committee issued Specific Policies Towards the Rural Areas and Regulations on the Curr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Pastoral Areas, which received heartfelt support from officials and the public. By 1965,

Tibet's total grain yield had reached 290,000 tons, up by 66.1 percent over 1958; its total livestock inventory was more than 17.01 million head, up by 54.1 percent over 1958.

From 1958 to 1965, Tibet made major progress in transport, education, culture, healthcare and other social undertakings. By 1965:

• Tibet had a total of 14,721 km of highway, up by a factor of 2.6 compared with 1958, connecting 90 percent of all its counties;

• There were eight new asphalt roads in downtown Lhasa;

• More than 95 percent of Lhasa residents had access to electric lighting;

• There were:

• 1,822 primary schools with 66,781 students,

• four middle schools with 1,359 students,

• on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and

• one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 Tibet had 133 professional art troupes and cinemas;

• The number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had increased to 193,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number in 1958;

•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had risen to 1,631, 3.4 times the number in 1958;

• There were 2,947 healthcare workers, 3.7 times the number in 1958.

In 1966, Nyingchi Woolen Mill was established and put into operation – the first modern wool textile mill in Tibet's history. In 1965, the China-Nepal Highway, connecting Tibet and Nepal, was completed and opened to traffic. In 1973, the Yunnan-Tibet Highway opened to traffic.

– Accomplishing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economic structure

Through 60 years of hard work,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Tibet is no longer subject to n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t is steadily modernizing. The added value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fisheries and related service industries rose from 128 million yuan in 1959 to 13.41 billion yuan in 2018. Grain yield increased from 182,900 tons in 1959 to more than 1 million tons in 2018;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increased from 1,370 kg/ha in 1959 to 5,688 kg/ha in 2018. Specialty industries related to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have grown in size and productivity. Tibetan plateau brand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 large group of specialty industrial bases have been created, such as high-quality grain and oil production, pollution-free vegetables, large-scale standardized dairy cattle farming, Tibetan pig farming, Tibetan chicken farming, and cashmere goat farming.

Modern industry started from scratch and has grown steadily. Through 60 years of development, Tibet has now established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covering over 20 sectors, including energy, construction materials, machinery, mining, light industry, food processing, ethnic handicrafts, and Tibetan medicine. Tibet has abandoned its traditional industrial model and is approaching modernized levels of production. Tibet's industrial added value increased from 15 million yuan in 1959 to 11.45 billion yuan in 2018.

Economic aggregate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growth. In 2018, Tibet's GDP was 147.76 billion yuan, about 192 times the 1959 figure of 174 million yuan, calculated at comparable prices. Tibet's economic structure is improving. The share of added value from primary industry in GDP dropped from 73.6 percent in 1959 to 8.8 percent in 2018, while the share of secondary industry rose to 42.5 percent and the share of tertiary industry increased to 48.7 percent.

Tertiary industry is thriving, and tourism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 2018, Tibet received 33,687,300 tourist visits, with a total tourism revenue of 49.01 billion yuan. More than 100,000 farmers and herdsmen have added income through tourism, and Tibet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tourist destination. Trade logistics, banking, insurance, e-commerce, logistics, and other new forms of industry have grown fast and have become new sources of growth.

–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Tibet had no proper highways before its liberation in 1951, when highway construction in the modern sense began. Despite economic difficulties, China built the Qinghai-Tibet Highway, Sichuan-Tibet Highway and other low-grade highways connecting Tibet with other regions. After democratic reform, trunk highways such as the Xinjiang-Tibet Highway, Yunnan-Tibet Highway, and China-Nepal Highway were built. The Qinghai-Tibet Highway and Sichuan-Tibet Highway were asphalted, and a high-grade highway connecting downtown Lhasa and Gongkar Airport was completed. Now Tibet has formed a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network composed of highways, railways and air routes. By the end of 2018, Tibet had 97,800 km of highway, 660 km of which were high-grade highways. All counties in Tibet had access to highways, and of the 697 townships and towns, 579 had direct access to highway transport and 696 could be reached by highways. Of the 5,467 villages in Tibet, 2,624 had direct access to highway transport and 5,457 could be reached by highway. In 2006, the Golmud-Lhasa section of the Qinghai-Tibet Railway was completed and opened to traffic, which was the first railway in Tibet. In 2014, the construction of Lhasa-Shigatse Railway was completed and tracklaying started on the Lhasa-Nyingchi Railway.

The construction of air stations and airports is progressing. In 1956, the first airstrip in Tibet was completed. Tibet now has five airports and 92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ir routes in operation. There is an airline network with Gongkar Airport in Lhasa as the main hub, and with Bamda Airport in Qamdo, Mainling Airport in Nyingchi, Gunsa Airport in Ngari, and Peace Airport in Shigatse as branches.

Before liberation in 1951, Tibet had only one 125-kw hydropower station, which supplied electricity only to a handful of aristocrats. In 1960, Ngachen Hydropower Station was completed and entered service, bringing electric lighting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citizens of Lhasa. Subsequently, many more hydropower stations were completed, including Yamdrog Hydropower Station, Wiga Hydropower Station, Tralong Hydropower Station, Jinhe Hydropower Station, Drigung Hydropower Station, Shiquanhe Hydropower Station, Shoka Hydropower Station, Laohuzui Hydropower Station, Dzam Hydropower Station, Tobe Hydropower Station, Godok Hydropower Station, and Joba Hydropower Station. Yangbajain Geothermal Power Station has also been completed, as have a series of large grid-connected PV power plants. A comprehensive energy network is in place, with hydro power as the mainstay, and supplemented by oil, natural gas and renewables. The power supply in Tibet has been grid-connected with those in Qinghai and Sichuan provinces. Tibet's urban heating system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the winter of 2014, natural gas heating became available in downtown Lhasa, meeting the everyday needs of Lhasa residents. By the end of 2018, Tibet's power grid had extended to 62 counties (districts), supplying electricity to a population of 2.72 million; the other areas in Tibet had full power supply through small hydropower stations, local PV networks, and household PV systems. (To be continued)

一“侨”连五湖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周一平与祖国的别样情

2018年10月23日，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大桥开通当天，曾在香港短住一年，又与澳门有诸多不解之缘的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周一平，在电视机前为这一世纪工程啧啧称叹。

一同观看新闻的同事笑言，港珠澳大桥“一桥连三地”，周会长是“一侨连五湖”，身在葡萄牙，心连大中国，与港澳台三地都有深厚渊源，相比港珠澳大桥毫不逊色！



周一平

继承华侨世家荣光

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港澳台情结

周一平先生出生于著名的华侨之家，他的外公是第一位踏足葡萄牙的华侨华人，同时又是一位名震西欧的爱国侨领。

20世纪30年代，中国饱受日寇侵略之际，周一平的外公便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号召，在欧洲各国华人中为祖国募集捐款、支援抗日。家中至今珍藏着当时国民政府颁发的孙中山先生“博爱”墨宝和蒋介石先生手书的嘉奖令。

1962年，年幼的周一平与表弟随舅舅到葡萄牙与父母团聚，期间途经香港，因等待签证而在当地居住、上学一年有余。在香港的一年多时间，在幼小的周一平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印象。至今已过去近60年，周一平仍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特别喜爱港式点心和甜点，他对香港这片热土有着一份别样的感情。

2014年10月，针对香港特别

行政区一部分人举行“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周一平先后在不同场合发声，并联合葡萄牙华社各界共同谴责“占中”行为破坏香港法制、扰乱社会秩序，呼吁还香港安定与和平。

2019年7月31日，周一平再次痛心于自己童年时代的圣地香港陷入暴力事件的阴影，倡议发表旅葡侨团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乱港分子的暴力行径。声明称，“我们旅葡华人侨团强烈呼吁香港社会全体市民，认清极少数激进分子的暴力危害和本质，坚决维护‘一国两制’，维护法治。香港是中国的香港，绝不会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更不会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搞乱香港！”

如果说周一平与香港的渊源来自于美好而短暂的童年印象，之于台湾，则始于青年时代的浪漫姻缘。

周一平的太太来自宝岛台湾，与他结婚40余年，育有一子两女。40年来，周一平夫妇相敬如宾，上孝父母，下教子女，周太太默默地支持周一平热心的各项事业。周一平家是真正意义上的“两岸一家亲”。

2002年8月，周一平任会长的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肉相连，台湾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想把台湾分裂出去，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2004年3月10日，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再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陈水扁顽固推动“3·20公投”、肆意分裂祖国的行径，呼吁世界各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台湾当局利用“公投”改变台湾地位的图谋。

2019年1月6日，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强烈谴责蔡英文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分裂行径。

2020年5月17日，在蔡英文即将就任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之际，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布正告蔡英文书《顺应历史潮流 维护祖国统一》。

相比于香港和台湾，周一平与澳门似乎有更多的不解之缘，拥有许多澳门朋友，这源于澳门与葡萄牙之间独特的历史关系，更包括许多机缘巧合。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周一平开始经营中葡进出口贸易，将中国制造的百货商品、工艺品引进葡萄牙，同时把葡萄牙物美价廉的酒和橄榄油等产品推销到中国市场，在中葡两国和澳门商界积累了大量人脉资源。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在葡萄牙长大的周一平也像父亲一样，逐渐成为葡萄牙华人社会的重要侨领。他还发挥语言和文化优势，积极融入葡萄牙主流社会。

2000年8月22日，周一平担任会长的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澳门特区驻里斯本经贸办事处宣告成立，并就中国和平统一问题发表声明。

2019年8月25日，40年前曾是周一平的商业伙伴，上世纪90年代共同出席浙江省政协会议的贺一诚先生当选澳门特区新一任行政长官，愈加坚定了周一平利用自身资源，促进葡萄牙和澳门之间经贸文化交流的信心。

2019年12月18日，周一平在纪念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活动上表示，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说明“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很成功，说明“一国两制”符合澳门的实际，“一国两制”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在实践中也完全行得通。

2020年6月10日，周一平倡议发起的葡中中小企业商会在葡萄牙正式成立。作为葡中中小企业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周一平表示，葡中中小企业商会将为葡中两国的中小企业搭建一个信息服务平台，一个沟通的平台，一个文化商贸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推动葡中中小企业参与“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的平台。葡中中小企业商会在搭建葡中两国交流平台的过程中，将充分利用澳门在中葡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澳门回归20周年的成绩不仅证明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也彰显了澳门在中葡两国经贸文化交流领域的功绩。

深度融入葡萄牙社会
联合中葡各界共抗疫情

作为葡萄牙华社知名侨领，周一平有很多头衔。他是葡华侨

联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还是葡萄牙移民咨询委员会委员、葡萄牙反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葡萄牙东方合作发展协会执行长，葡中中小企业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周一平是旅葡华社的侨领，又身兼居住国社会职责，这在葡萄牙华侨中并不多见。

身兼数职的周一平清楚地知道每一项职务的职权范围和工作重点，并根据具体工作行使职权。

作为葡华侨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周一平强调葡华侨联是得到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移民协会承认的华侨团体，这是对华侨群体工作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也反映出在葡华侨愿意遵守葡萄牙法律法规，渴望积极融入葡萄牙社会。

“葡华侨联联合若干旅葡华侨华人社团，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困难，主要工作就是把华侨华人社团的工作宣传出去，与葡萄牙政府部门对接，与当地新闻媒体对接，然后把葡萄牙社会的资源引进华侨华人内部来。”周一平用一句话概括了葡华侨联的工作重心。他说，如今的葡华侨联已经不再局限在旅葡华侨华人社会，有很多葡萄牙的知名人士、政治官员乃至国会议员义务担任葡华侨联顾问。

2015年7月8日，由葡华侨联、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组织举办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在葡萄牙共和国议会大厦举行。葡萄牙国会葡中友好小组主席 Doutor Vitalino Cana、葡中世代友好联合会主席拉马略将军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除担任葡华侨联主席、葡萄牙移民咨询委员会委员，周一平还连续担任葡萄牙反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维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

2020年2月，中国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周一平多次接受葡萄牙当地主流媒体，如葡萄牙广播电视台 (RTP)、SIC、TVI，听众最多的广播电台 TSF 和多家报纸的采访，用葡语介绍中国政府大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呼吁葡萄牙民众不要因为担心新型冠状病毒，而害怕到中国超市购物或者中餐厅消费。

2月3日，周一平应邀参加葡萄牙北部地区最大华商聚居地维拉贡德市 (Vila do Conde) 市长 Elisa Ferraz 召集的一场关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联席会议。周一平向与会者表达了葡萄牙民众对疫情的恐惧会对遍布全国的中国商店和中餐馆造成损失的担心，希望能够获得葡萄牙政府的支持，给华人社区及商业活动打了一记强心针。

2020年4月20日，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葡华侨联就里斯本刑事法院在司法批文中使用“中国病毒”一词，向葡萄牙司法最高委员会 (CSM) 提出抗议，并要求做出解释。随后，里斯本刑事法院专门就此做出纠正。

3月初，葡萄牙疫情爆发，周一平与停工停产的侨胞们开始尽自己所能为葡萄牙当地抗疫做贡献，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帮助身边同胞和当地民众。

3月30日，葡华侨联、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侨团作为浙江省侨联海外抗疫关爱基金指定侨团，先后向500余位困难侨胞发放关爱基金，帮助侨胞抗击疫情。

4月23日，经周一平联系，浙江省兰溪市、兰溪弘泽善举堂捐赠的10万只防护口罩，转赠葡萄牙当地消防、警察和医疗机构。“这是从中国跨越千山万水的关爱呵护，无疑为我们送上了一场及时雨，我们深受感动，深表感激。”葡萄牙接受捐赠的政府机构负责人在交接仪式上表示了谢意。

“疫情之下，没有国界和地域之分，只有人类共同体。无论有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在葡华侨与葡萄牙人民一道携手同心，必能战胜疫情。”面对葡萄牙持续肆虐的疫情，周一平如他的性格一样乐观。

周一平展望后疫情时代中葡两国合作远景说：“中葡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在现有的国际大环境下，相信葡萄牙政府和民众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加强双方沟通和交流，支持中国政府的一个中国立场和原则。”

新世纪以来台湾当局武器装备政策分析

■ 瞿定国

武器装备是“自造”还是对外特别是对美军购，一直是岛内各界争论不休的议题。2000年以来，历经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三任领导人，台湾当局在武器装备政策方面不断调整。

一、推行“国防自主”，自制重型装备

台湾“国防法”第22条指出：“行政院所属各机关应依国防政策，结合民间力量，发展国防科技工业，获得武器装备，以自制为优先，向外采购时，落实技术移转，达成独立自主之国防建设。”台湾防务部门提出“确立核心、整合能量、策略联盟、分工合作”原则，运用外部资源，整合民间技术，扩大防务工业产制规模，加速武器装备生产与部署，积极建立防务自主能量，厚植部队战力发展基础。

（一）陈水扁强调“要大力发展自制武器”

陈水扁上台之初，台军外购与自制矛盾相当突出。2002年7月，亲民党民意代表公布的研究显示，以往10年军购清单中外购占92%，自制仅8%。有鉴于此，陈水扁推出了“自主国防”计划，意在通过“自造武器”，打造台湾的“‘国防’工业体系”。为加强研发，台湾成立了专司武器开发、制造、提供的“国防部军备局”。10月，台湾当局宣称，“今后台湾要大力发展自制武器”“要在未来三四年内，斥资上千亿元（新台币），全力落实潜艇自制计划”。

2002年5月7日，亲民党、民进党、国民党三党民意代表发起组成“潜舰国造推动联盟”，提案要求美国售台的8艘潜艇中，6艘必须在台湾制造，否则不得动支预算。该项军售案涉及2000亿元商机，在台湾制造不仅可以提升景气及就业率，还可借技术转移发展台湾的防务工业。

面对来自民间企业和本土派研发机构的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有所表现。2002年8月，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游锡堃称，未来10年将有7000亿元用于军事投资。10月，游锡堃和防务部门负责人汤曜明主持，在高雄举行“国防资源释商政策说明会”，展示了台湾自制的武器组件、火箭、“天隼二型”无人飞机、导弹、成功级导弹巡防舰、油弹补给舰与锦江级导弹巡逻舰等装备。会议提出，台军应结合民间力量，鼓励民间厂商投入防务产业领域，为台湾创造更多商机，同时运用既有的防务科技研发能量，协助传统产业升级，促进军民科技交流互补。

（二）马英九着力推动“军舰自造”

马英九执政以后，在“国防自主”方面，充分利用台湾的军事科技与研发能量，大力研制部署各型舰艇、导弹、甲车、飞行载具，并进行IDF经国号战机的性能提升，积极规划“潜舰国造”等项目，力求通过发挥台湾自身的能量，提升防卫战力。至2012年马英九第一任期结束之际，台军已陆续完成“光华6号导弹快艇”“雷霆2000多管火箭”“云豹甲车量产”及“IDF战机性能提升”等计划，展现出台湾致力于“国防自主”研发的丰硕成果。

2015年3月31日，马英九在左营潜艇基地亲自主持“磐石舰”“沱江舰”成军典礼，颁发新舰成军命令、舰旗及印信，并检阅了现场停泊的“光华六号”导弹快艇、“沱江舰”、“磐石舰”，以及隶属“海巡署”的“台南舰”“巡护9号舰”。马英九致辞称，7年前他上任后着力推动“军舰自造”，如今成军的“沱江舰”与“磐石舰”，从构想、设计

到建造，都由台湾自力完成，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是“象征海军战力跃升重要里程”。7年间台湾当局总共投入560亿元新台币，建造“光华6号”等36艘舰艇，“海巡署”也新建6艘巡防舰与7艘巡防艇。

8月13日，台湾防务部门在台北世贸中心举办的“2015年台北国际航天暨国防工业展”盛大开幕，以“国防自主、军民双赢”为参展主轴，展示“中山科学研究院”“国防大学”及“军备局”等单位，投注在国防科技自主研发的成果。

（三）蔡英文强调推进“国防产业”发展

蔡英文上台后，更是积极推动“国防自主”政策，强调其“核心概念”是建立自主的“国防科技能力”，推进“国防产业”的发展。台湾防务部门结合民间产、学、研技术能力，积极建立武器研发、生产与全寿期支持能量，增进“国防自主”科技能力，并借助向外国采购，进行工业合作及技术移转，以达成振兴“国防产业”及“国防自主”目标。蔡英文叫得最响，并开始实际作为的是“国机国造、国舰国造”。

1.“国机国造”正式启动

为筹建符合联合防空作战需求的未来战力，台湾防务部门规划由“中山科学研究院”在IDF研发基础上，执行现有战机性能提升，并整合岛内外系统供货商参与，以凝聚研制能量。

2017年2月7日，台湾防务部门在“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举行“新式高教机委制协议书暨合作备忘录签署启动典礼”，宣示“国机国造”正式启动。典礼由蔡英文主持，空军司令沈一鸣与“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签署备忘录。台湾防务部门决定采用汉翔航空工业公司“XT-5型蓝鹊”高教机设计构型，编列预算686亿元新台币。4月26日，由台中市政府举办中部场招商说明会，邀集岛内104家机械厂商150多人，加入“国机国造”供应链。依照协议，量产构型确认后，逐年提高产能，2026年完成66架高教机生产任务。

蔡英文说，台湾自1990年停止生产“经国号”自制防御战机后，“国机国造”已经原地踏步30年。期盼“国机国造”启动后能协助台湾航太工业厚植人才链，加强产业连结，“重新发展我们的国防产业”。

2.“国舰国造”签署合作备忘录

观察家认为，台湾造船业陆续参与多项水面舰艇建造，造舰质量已逐渐成熟，岛内已具备水面舰艇自制能量。台湾防务部门依作战需求规划未来新兴兵力，采取批量、循环及长期方式自制，以满足建军备战需求。2017年，新增加了新型两栖船坞运输舰、高效能舰艇后续舰、快速布雷艇建造案，以及潜舰、新一代导弹巡防舰合约设计案。3月21日，“潜舰国造”设计启动及合作备忘签署仪式在左营海军军港举行。在蔡英文主持下，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冯世宽、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董事长郑文隆以及“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冠群，共同宣布“潜舰国造”启动命令和签署合作备忘录。郑文隆表示，2018年3月提出潜舰初步设计方案，预计8年下水测试、10年成军。合约设计全案预算29亿元新台币，目前已完成重要工作管制节点并全力推动。在启动仪式上，蔡英文高调表示，“潜舰国造”是“国防自主”政策中最具挑战性的一环，也是“三军统帅”对“国家”的责任；目标不仅是打造出鱼雷潜舰，而是要完成代表台湾“国家安全”、产业发展和社会团结的“潜舰国造”任务。

3.“国防自主”规划难以实现

2018年新年伊始，在蔡英文领军下，台湾当局致力于研拟至2025年的详尽预算规划，增加长期防务开支，投资先进武器系统。优先项目包括新型导弹、无人驾驶飞机、电子战系统、战斗机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企求“打造更强大的威慑力量，以对抗大陆攻击”。2025年前，台湾年度防务开支预计至少增加20%或624亿元新台币，达到3817亿元新台币。这样大一笔开支，能否落实，尚待观察。应当说，台湾在军事科技发展方面还是有一定进展的，然而把它上升到“国防自主”的高

度却是勉为其难。美国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安大维表示，台湾自制柴油潜舰平台不是问题，但武器和电子战系统需要外援。

二、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军事合作内涵扩大

2000年以来，美台出于各自战略利益，积极推动和深化双方多元军事交流管道。美国把台湾看成是其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棋子，纳入“事实上的主要非北约盟友”圈内，不断强化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卫性武器”。而台湾不管蓝绿执政，为了达到或“以武拒统”或“以武谋独”目的，也都积极迎合美国意愿，大力购买美国武器装备。在2008年3月9日的选举电视辩论会上，政见迥异的蓝绿两位候选人马英九、谢长廷对军购问题却作出了颇为一致的表态：支持继续采购“防卫性武器”。台美之间，有时由于在政治策略或军售环节上产生某些矛盾，但经过很快调整后，美国照样售给台湾武器装备，而且数额越来越大，价格越来越贵，“进攻性武器”也越来越多。据报道，台湾购入的各种武器装备95%以上来自美国。

据百度百科、维基百科最新修订的词条，以及有关方面资料综合统计，1979年7月至2020年5月，美国对台军售总计609.027亿美元，其中台湾实现政党轮替以后，2000年3月至2020年5月，美国对台军售445.037亿美元。

（一）陈水扁主政时期：美国开始向台提供进攻性武器

民进党陈水扁上台以后，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屡次以各种借口突破中美“八一七公报”限制，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武器。资料显示，在陈水扁8年任期内，美国对台军售达113.077亿美元。

2001年，小布什刚上台就替台湾提出了一个预算为180亿美元的大清单，用于购买8艘柴电潜艇、12架P-3C“猎户星”反潜巡逻机及6枚PAC-3“爱国者”导弹电池。但此案在蓝营民意代表占多数的情况下，台湾立法机构数十次将其挡掉，直到2006年12月29日才予以批准。不过有意思的是，除后两项预算通过外，前一项拟购的“8艘柴电潜艇”改成了“潜艇设计方案”，主要是二战后美国再无柴电潜艇建造，寻求西方盟友支持对台军售又无人响应，这样就使得预算从160亿美元一下子减少到1.92亿美元，着实令美国难堪了一番。此项计划迄今也未能全部兑现。

陈水扁任期内，美国向台湾销售的装备性能显著提高，主要标志就是由防御性向进攻性发展，正好适应了陈水扁提出的“决战境外”攻势战略需求。2004年以后，美国突破美台军购“红线”，答应向台湾出售AGM-88“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帮助台军对F-16、“经国”号战斗机进行设备升级和改造，并为其配备“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再加上台军装备的“小牛”导弹，从而使台军具备了攻击中国大陆内地重要战略目标的能力。美国对台军售十分重视软件支持和系统构建。2005年6月23日，美国宣布将为台军制造远程预警雷达，使其预警能力达到3000公里以上。美国在售台的“Link-16”战术数据链中预留了与美军对接的接口，为未来台美联合作战预做准备。台湾学者指出，由于Link－16不仅为美军现役主战战术数据链，而且日本自卫队和北约盟国也都采用，因此当台湾“三军联合作战指管通情系统”建构完成后，台军不仅可以完成内部指管机制整合，同时也在技术上建立了与美日军队的资讯交流。未来台海一旦有战事，美日侦监设施都可成为台军耳目，这就等于为美日台军事合作预留了伏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陈水扁任内，美国售台的“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Link-16战术数据链等资讯装备，虽不属进攻性武器，貌似敏感程度低，但部署后却起到了提高美国对中国大陆早期战略预警能力、并将台军整体纳入对中国大陆“介入/拒止”作战力量的作用。

（二）马英九主政时期：美台军售额大幅增加

马英九在两届任期间一直奉行“和陆、友日、亲美”路线，美国售台武器表现积极，先后于2008、2010、2011、2015年共4次宣布对台军售。资料显示，马英九任职期间，美国政府宣布的对

台军售总额205.22亿美元，平均每年军购超过25亿美元，远超陈水扁任内的10.1亿美元、李登辉任内的13.5亿美元。

2014年12月26日，马英九在“陆海空军将官晋任布达暨授阶典礼”上说，上任后，美国曾分别宣布三批总金额高达18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缔造了20年来金额最高的纪录，包括P-3C反潜巡逻机、AH-64E及UH-60M直升机等，均已陆续到位，完成训练即可加入战备。2015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又宣布将总额18.31亿美元的10项对台武器输出案送交国会审查。这是马英九上任后美国第四度宣布对台军售，其中包括佩里级护卫舰2艘、密集阵近防系统、MIDS终端机增购、猎雷舰战系(商售)、AAV7两栖突击车36辆、单兵毒针防空导弹250枚、陶式反坦克导弹769枚、标枪导弹及迅安系统(Link-16战术数据链)后续支援等项。

马英九在《八年执政回忆录》中提到的相关数据，与本文前引数据有差异，特录于此存查。马英九说，在8年任期内，美国有4次对台军售，总额达201.3亿美元(约6491亿元新台币)，超过李登辉(任期12年)的162亿美元，以及陈水扁(任期8年)的84亿美元。马英九解释，他主政后第一笔68亿美元的美台军售案，其中有许多建案是陈水扁任内提出的。由于当时美台关系有所抵牾，互信不足，直到马英九上任后美国才予以同意。

(三)蔡英文主政时期：美国实行“常态化对台军售”

蔡英文上台后，对美国更是亦步亦趋，紧抱美国大腿。特朗普上台后，打“台湾牌”的频率也越来越高。2017年11月，特朗普表明美国会继续提供防卫性武器给台湾，没有考虑终止对台军售。美国国会2018年3月通过“台湾旅行法”、8月通过《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12月通过《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9条款“对台湾之承诺”，重申支持美国与台湾间政治、经济及安全的合作，规定“美国总统应依来自中国之威胁而定期对台军售”。从2018年年底起，为“因应台湾的防卫需求”，美国将对台的“包裹军售”改为更常态化的“逐案处理”，以便更能“因应台湾的防卫需求”。

2019年，适值“与台湾关系法”40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表现出对“台湾安全”以及双方“安全合作”的重视。5月，美国国会提出“2019年台湾保证法案”，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决议案，再次表达了对于“常态化对台军售”以及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坚定支持。值得重视的是，仅2019年就4次批准对台军售，较以往有所突破。8月20日，美国更是直接推出80亿美元F-16V新型战斗机计划，成为继1992年老布什政府之后再次大规模对台出售战斗机。蔡英文当局赶紧制定“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于10月29日完成立法机构三读，做好了充分法制准备。10月31日，台湾行政部门火速通过特别预算案，从2020年至2026年，共编列2472亿元新台币，用于购买美国F-16V战斗机。今年5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布新闻稿，声称已批准向台湾出售18枚MK-48AT重型鱼雷以及相关设备和技术，总金额达1.8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与台湾的合作已超过军售范畴，包括训练、交流与准则发展等。据台湾防务部门统计，美台在“政策对话”“军(商)售管理”“军备科研”“防卫评估”“专业国防”“教育训练”“情报交换”“战训整备”“后勤维保”及“通资指管”等领域，日益拓展交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2018年至2019年8月，台湾出访计380余案，邀(来)访计250余案，交流逾2700余人次。

三、台军作战能力分析

20年来，无论是依靠“自造”还是对美军购，台军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有所提升。当前，应该怎样认识台军的作战能力呢?

(一)全球军力排名虽靠前，但两岸力量对比悬殊

20年来，经过一系列军力调整，台军作战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还存在诸多“短板”和“缺项”。可以这样认为：台军

已初步形成多种手段相结合的侦察预警体系，但由于防御纵深短浅，预警时间有限，反应能力不足；防空导弹在数量和性能上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自身技术保障能力有限，系统暴露在外易被摧毁；作战飞机技术水平较高，但持续作战能力不足；水面作战能力有所提升，但水下作战能力仍然欠缺；网络战能力建设资金逐年递增，但在实施网络战的情报收集、密码破译和数据处理等关键环节上，存在着效率低下的“瓶颈”，等等。

据台湾“东森新闻”2018年6月1日报道，“全球火力指数”(Global Firepower，简称GFP)网站公布了全球军力排名，在136个国家和地区军队中，前3名分别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大陆，邻近的韩国、日本分列第7、第8名，台湾地区则从2017年的全球第19名跌至第24名。“全球火力指数”是世界最著名最权威的军事排行榜之一，使用了复杂的评估方法，考虑50多种不同因素，根据相关计算结果，得到一个大致反映某国或地区军队实力的评分(火力指数)。

“全球火力指数”网站对两岸军力分别作了评估。中国大陆现役兵力218万人，空军战力包括1125架战斗机，陆军战力包括7716辆坦克，海军战力包括1艘航空母舰(现为2艘)，50艘护卫舰，29艘驱逐舰，73艘潜艇。中国台湾地区现役兵力25.7万人，空军战力包括286架战斗机，陆军战力包括2005辆坦克，海军战力包括20艘护卫舰、4艘驱逐舰，4艘潜艇。由此可见，两岸军力对比，祖国大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其实，在质量上祖国大陆也是占相当优势的，这已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所认定，许多学者特别是军事专家的著述也浩如烟海。

凤凰资讯报道，美军对台军战斗力的评估是十分悲观的，认为台军的“联兵旅”缺乏必要的机械化作战装备，打击火力也十分羸弱。如果进行防御作战，台军的一个军团(通常为5—6个旅)大概能够抵挡住解放军的一个合成旅。在2019年的“汉光”演习中，根据美军的指导意见，台军在最后的台北作战演习中调集了多达4个军团的兵力，才勉强抵挡住解放军3个旅的进攻。如此算来，同等规模的台军战斗力大概只相当于解放军的15%。台湾《军事家》报道，有专家估算，若2025年台湾建造的8艘潜舰完全到位，以10艘潜舰对抗大陆水面舰艇战斗群，其最大攻击成效也只有30%至34%，但台湾相对可能会失去50%至60%潜舰。就连对台湾反导能力很有信心的马英九，也表示对大陆来袭导弹的拦截率只能达到70%。由此可见，如果两岸一旦有战事，台军必败无疑，至于能顶多久，几天？几周？并无多大实际意义。

(二)事故频发、军纪败坏已成痼疾

众所周知，台军事故频发，纪律败坏，歪风盛行，几乎已成社会共识。诸如训练中装备损坏、人员受伤，机舰发生火警，贪污挪用公款，非法私藏毒品，酒驾出事，自杀自伤，性骚扰，等等，不一而足。据《中国时报》报道，台军资料显示，从2002年到2011年，至少有1345名官兵因军纪事件意外身亡，伤残官兵也超过2000人。蔡英文上台以后，台军就像得了“瘟疫”一样，丑闻接二连三，涉事人员从少将到普通士兵，各级都有。2019年8月6日，台军发布新闻稿称，2016年至2018年，台军“性骚扰”实际成立案件，分别为24、29、36件。2019年2月至12月，台军至少发生8起自杀自伤事件，亡7人，伤1人。更令人诧异的是，蔡英文的专机不仅出现“走私案”，还暴露出“飞安危机”。据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台军发生重大事故已有多起，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月2日晨发生的UH-60M黑鹰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台军“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人丧生。在台湾当局大肆吹嘘自身的防疫堪称国际“典范”时，又发生了台湾海军“敦睦舰队”严重“染疾”事件。在蔡英文就职前夕的敏感时刻，台军又爆出“电邮门”事件，号称“第四军种”的资通电军所属单位，遭到台湾“廉政署”上门搜查。以上所列事故，堪称触目惊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着“网络百科全书”之称的“维基

百科”，有一个词目竟然是“中华民国国军的丑闻与争议”。词目依序从“两蒋”时期、李登辉时期、陈水扁时期、马英九时期，到蔡英文时期，对若干重要典型事例均分别列出。能够因“丑闻”而享受“维基”榜上有名的，恐怕也就只有台军这一家了。

为此，蔡英文才不得不强调改善部队管理制度，提升各级干部领导统御能力，要“在维持战力的团队军纪，以及社会价值对个人的尊重之间，取得包容、取得均衡”。然而台军肌体已经病入膏肓，不进行“脱胎换骨”手术，哪来的战斗力!

(三)“为谁、为何而战”陷入迷茫

随着民进党上台，陈水扁、蔡英文等顽固“台独”势力以“军队国家化”为名，对台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改造，在台军中大肆灌输“台独”意识，大搞“去中国化”，造成历史遭否定，传统被破坏，官兵没有了“中心思想”，信仰危机日益加深，台军已被消费得失了“魂”、落了“魄”。台湾前“国安会”处长、退休中将刘湘滨表示，现在是台军有史以来“最脆弱、战力最低”的时刻。

陈水扁上台后，抛出“一边一国”论，制定“中华民国第二共和”方案，宣称大陆不是“祖国”，并将台军《青年日报》“中缝”行之有年的“为中华民国而战”口号改成“为台湾而战”。2004年，台湾当局首次对6000余名官兵(含高级将领50名)以心理测试为名，搞“台独”理念政审，以便摸清官兵“统‘独’意识、政党倾向”底数，更好地从思想上控制军队。陈水扁当局还在台军中实施一系列“去中国化”措施，取消长期坚持的反“独”促统教育，拆除军营内有关“统一”“中国”等字眼标语。2004年9月，决定停止呼喊带有“奉行三民主义”“完成统一大业”等内容口号，取消朗读“中华民国军人读训”仪式，并将使用大陆地名的台军总机代号和以大陆地名命名的舰艇改换名称。由此造成民众思想混乱，青年从军意愿下降。资料显示，当时有40%民众希望不当兵，对台军作战有信心的只有18%，完全没有信心的却占38%。

陈水扁在组织上大力培植“扁”系人马，推动台军“本土化”，特别注意笼络高阶将领。陈水扁第一任期内10次晋升台军将官473名，占将官总数80%。2005年元旦前后，又有近百名将领大调整，占了当时台军将领总数1/4。获得升迁的不是台籍出生就是亲扁亲美派。到其第二任期开始时，台籍将官已由20%上升到30%，台籍校官由40%上升到60%以上。陈水扁在任8年内共晋升732位将官，远远超过同期退伍将官数。

蔡英文上台后，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的是，台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蔡英文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谈到两岸关系时说，“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须做好准备，发展自我防卫的能力”。摆出一副“就算开打也没有关系”的态度，似乎台湾民众和军队都会支持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美国杜克大学“亚洲安全研究”民调显示，一旦两岸爆发战争，只有23%台湾民众愿意“挺身抵抗”(广义的)。如果直接询问被访问者：“请问您会采取什么行动?”回答选择投入战场的竟然只有0.5%，比直接选择投降的2.1%还要低。有评论指出，台湾民众对“统‘独’成本”有一定的概念，若是成本太高，就不会选择“独立”。

台湾实现政党轮替以后，“为谁、为何而战”问题一直困扰台军。2018年5月7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回答国民党民意代表曾铭宗询问“军人会不会为‘台独’而战”时，立即表示“当然不会”；但是他似乎觉得这样回答还不完备，接着补充说，“国军忠于国家，也忠于人民，国军为‘中华民国’而战，且是始终如一”。严德发的回答并没有解决未来将要遇到的问题。试问：当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主席兼台湾地区领导人，并且戴着“三军统帅”桂冠的蔡英文，以“国家”名义向“国家化”的军队发出战争命令时，严德发们将作何表现呢，台军广大军官士兵又将如何行动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警惕和应对的严肃问题!

蔡英文当局利用情治系统搞分裂活动

■ 陈文

日前，国家安全机关继“2018雷霆行动”之后，依法开展“迅雷-2020”专项行动，破获涉嫌资助“港独”、刺探情报、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等行为的数百起间谍窃密案件，并披露了数起台湾间谍搞破坏典型案例。“迅雷行动”既是针对台湾当局及其间谍情报机关的又一次重拳出击，更是国家安全机关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核心利益，维护台海和平，而对“台独”分裂势力主动发出的一次严正警告。从披露的案件可以发现，台湾间谍的破坏活动性质恶劣，危害巨大，背后都有台湾当局情治机关的精心布局，服务民进党当局的政治利益。

台湾当局的情治布局

一是通过系列修法为情治工作提供便利。民进党自2016年在岛内全面执政以来，通过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刑法”“国安法”“机密保护法”，通过“反渗透法”等，阻挠两岸开展民主协商对话，增加民众参与两岸交流的不合理负担，破坏两岸已有的交流机制、平台，筑起两岸交流的法制高墙。其中，“反渗透法”在“选罢法”“公投法”“集会游行示威法”“游说法”等基础上，扩张处罚范围和加重处罚力度，将祖国大陆党政军机构、人员均视为“渗透来源”，“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从事选举、“公投”、游说、集会游行等相关政治活动均可触法；“刑法”修订所谓“外患罪”，将十多种具体罪名扩张适用于祖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国安法”扩张对“共谍”行为的认定范围，新增“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或发展组织”，泄露公务秘密等。这些条文往往定义宽泛，缺乏具体的认定机构和界定程序，便于入罪，使得台湾当局情治部门更容易介入。

二是调整情治系统。有了法例之后，民进党当局加速绿化情治机关与司法监察体系，通过调整考核机制，破坏文官体制，侦搜逮捕支持统一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新党人士，故意制造大量“共谍”案。蔡英文当局积极对情治部门进行整合，整合包括“国安局”“军情局”等，关键是人事布局，重点贯彻绿色政治思想。另一方面，蔡英文当局着手调整法务部门“调查局”等相关部门考核机制，提升了保防安全、“反渗透”等相关案件计点分值，促使相关人员倾向于避开肃贪、反诈骗等吃力不讨好的案件，集中精力侦办安全保防相关案件，使得两岸族群被“查水表”的几率大幅上升。尤其是重大选举之前，岛内更是在情治部门全面发力下陷入“谍影重重”。岛内顺应这一逆流的政法界人士，在绿色加持下看似官运、财运亨通。由“调查局局长”升任法务部门负责人的蔡清祥，就在“反渗透”方面积极配合蔡英文当局政策。“前国安局局长”彭胜竹配合蔡英文当局保防政策，派人监控台商等两岸族群活动，后来闹出“走私烟品案”才被迫请辞。

三是利用香港问题获取政治利益。民进党暗地里对祖国大陆搞破坏的行径由来已久，全面执政后，更是变本加厉。从披露的案例看，台谍破坏活动背后，都有着民进党当局情治机关的精心布局。虽然台谍本人在从事破坏活动时，只是进行着其熟悉的“举手之劳”的事情，但这些事情的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比如，“台独”组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李孟居赴港拍摄军事禁区的视频如果流出，可以通过专业分析算出部队级别、规模、战力和作战意图。在中美博弈日趋微妙复杂之际，民进党当局及岛内“台独”势力甘做反华鹰犬，屡次冲

在搅局挑衅的最前线，不断侵蚀两岸和平基础，大肆利用香港问题获取政治利益。民进党利用港台青年群体涉世未深，并在赚取高额政治利益后，出卖香港同胞。

四是在海外大搞破坏活动。近年来，台湾间谍活动越发隐蔽，且手段越来越多样，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且活动范围不局限于两岸，在海外针对祖国大陆的破坏活动同样增加。台湾当局往往通过情工人员释放小道消息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由绿色媒体跟进引用，必要时还会在国际小报宣传后再引入岛内，放大炒作具有特定政治效应、涉及两岸的事件。曾任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助理的郑宇钦，在捷克以“中欧政治经济研究所”学者身份破坏中捷关系，影响更加恶劣。郑宇钦找到三篇美国反华基金会炒作中国威胁论的文章，进行篡改包装后放到捷克华人圈广泛传播。郑宇钦谎称一些捷克华侨华人是中国间谍，文章是从捷克政府内部截获，不光造成捷克华人圈恐慌，还丑化了中国在捷克的外交形象。前段时间，捷克议长访台闹出不小风波，背后离不开台湾情治机关通过各种手段对捷克“民意”与议员的长期“塑造”。可见，台湾情治机关的活动重心已专注于服务民进党的政治需求，或者在境外炒作假新闻，集中力量造成“爆点”，以“出口转内销”方式扩大政治影响，配合民进党当局的对外政策；或者在重要地区、重大事件、关键节点对祖国大陆进行抹黑、破坏、伤害，进而配合民进党的选举利益。

五是配合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提供情报信息。除了为一党之私破坏两岸和平基础，民进党还直接危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屡次在重要场合与关键节点炒作“中国威胁论”，直接配合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步调，是所谓“印太战略”最积极的唱和者，也是反华理念与手段的输出者。民进党当局在配合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方面，不仅输出“武汉肺炎”等“丑华”话语，还直接提供基础数据，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亚太情报网络系统。

台谍的危害

一是干扰两岸融合发展。蔡英文当局通过情治系统限制岛内有行动能力的统派人士，处罚正常参与两岸交流的台胞，打击客观报道两岸发展的媒体舆论，扼杀支持统一的声音，降低了岛内支持和平统一的声量，在两岸族群中制造寒蝉效应和绿色恐怖氛围，强化了台湾当局塑造的民粹“台独”氛围。

二是破坏中国大陆国际形象。台湾当局通过构建反华价值同盟，煽动“港独”和塑造西方政客学者，将情治系统的目标超出情报收集，定位为服务蔡英文当局的整体战略，尤其是配合其选举执政需要，蓄意制造舆论破坏中国大陆形象。

三是鼓动了民粹冒险投机行为。民进党当局通过网军及公共资源塑造舆论环境，营造“台独”政治正确的民粹氛围。在民进党利用网军和公共资源塑造出来的舆论环境中，普通民众乃至企业、社团、政党，在论及台湾主体性的时候往往大声附和，使得部分冒险投机分子以为“台独”言行可以换取政治经济利益，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从国安机关披露的一起“台独”分子干预香港事务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台独”组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李孟居本来是享受两岸和平红利的台商，在民进党洗脑之下，自以为有利可图，主动赴港拍摄军事禁区作为“政治献礼”提升自身地位，以利于未来参选台湾民意代表。在民粹主义掩护下的冒险投机分裂行为，无疑放大了“台独”势力的能量，也增加了台海战争的风险。

以法治方法震慑“台独”

面对民进党当局种种恶意挑衅，祖国大陆一方面保持定力，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台湾同胞切身福祉出发，尽最大努力持续推动两岸和平；另一方面，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引导香港问题解决，管控台海危机扩大。通过出台《香港国家安全法》，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类型、构成及其刑罚作出明确规定，实施细则更是明确纳入“台独”与“港独”勾连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香港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就是《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的具体延伸，将“台独”勾结“港

“美国在台协会”变脸背后的图谋

■ 杨仁飞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涉台政策不断调整和变化，其中府院协调一致，推行“一中一台”政策，蔡英文当局全力配合“反中谋独”。“美国在台协会”作为美台关系的“白手套”，不断突破自身“民间非营利组织”角色设定，扮演“准外交使领馆”角色，服务美国对台政策转向。

一叶知秋。在中美进入“混合新冷战”的复杂背景下，“美国在台协会”种种举动与做法，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未来需高度关切美国政府是否修改“美国在台协会”的法律地位，提升为“领事”或“大使”层级。若如此，相信中美关系必将迎来惊涛骇浪，两岸关系将会出现重大转变。

一、“美国在台协会”突破民间非营利组织规定，日益凸显其“官方”对台机构角色

“美国在台协会”成立于1979年，是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国务院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并依据哥伦比亚特区法律所设置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功能是为了因应美国与台湾当局没有“邦交”，以及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等因素而设立的处理台湾事务的机构。

但是这个机构并不安分，一直活跃在美台政界，且不断谋求机构“官方化”，谋求升级为驻外代表处或者使领馆。

目前，“美国在台协会”设有“理事主席”及“台北办事处处长”两个主要职位，前者常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阿灵顿总部，主要负责与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及美国各官方单位间的联系工作。2006年薄瑞光接任主席之后，不再兼任执行理事，自此仅称为“主席”，不再称“理事主席”。至于台北办事处处长，则是“美国在台协会”驻台湾负责人，实际上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

“美国在台协会”从成立以来共有13任处长，他们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时好时坏，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台关系的缩影。

陈水扁任内在两岸政策上的“台独”冒进遭到美国反对，前台北办事处处长薄瑞光曾公开批评陈水扁的“入联公投”是制造麻烦，影响台海两岸互动气氛与亚太区域情势，而且是以走后门的方式违背“四不一没有”。前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在两岸问题上倾向中立，曾撰文批评李登辉和陈水扁，包括“3·19枪击案”、对台军售案等，被绿营分子视为眼中钉。而现任处长郦英杰曾任台北办事处副处长，也曾作为美国外交官三度派驻中国大陆，对两岸情况十分了解，是美国在台机构代表中最活跃、曝光度最高、对蔡英文当局最支持的“处长”。现任副处长谷立言娴熟汉语、日语，曾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与东亚经济事务处主任、国

独”的活动纳入管控范围。国安机关以各种典型案例警告分裂分子，有利于戳穿“台独”的虚妄面纱，警醒那些被民进党洗脑的台湾民众。国安机关“迅雷-2020”专项行动对这种勾连行为的打击，正是“斩断民进党当局乱港的黑手，并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行径都是徒劳的，必将自食恶果”。统

务院东亚太平洋事务局经济政策办公室主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及各部门负责人的官方背景与身份日益凸显。

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台协会”以“美国官方驻台机构”身份高调、张扬地开展活动。

早在陈水扁执政的2002年，美国的共和党布什政府曾经放声要将“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职位提升为“大使级”。事隔快20年，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再次传出要升格这一机构的官方层级。10月20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及麦克利(Jeff Merkley)提出“台湾关系加强法案”，建议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对台政策，包括“成立跨部会台湾政策任务小组，要求美国驻台代表的任命应经过参议院同意，建立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反制中国大陆对台锐实力渗透等作为，以更切实反映现况”。

过去4年多，“美国在台协会”大刷存在感，突出美台官方关系不断加深的影响力。如在称谓上，“美国在台协会”官网公开称台湾领导人为“总统”，台湾外事部门为“台湾外交部”，以“台湾”对应“中国”，鼓动“中华职棒”改名“台湾职棒”，呼应支持蔡英文当局的“正名”“去中国化”。此外，“美国在台协会”代表美国政府与台湾外事部门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公开撕去民间机构的外衣。

“美国在台协会”的变脸，与特朗普政府大打“台湾牌”，加强美台实质关系，赋予“美国在台协会”越来越多“驻外使馆权”有很大关系。如，2019年3月下旬郦英杰赴台湾外事部门，与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一起主持“台美共同成立印太民主治理谘商机制”记者会，这是“美国在台协会”官员首次赴台湾外事机构召开记者会，公开强调“价值同盟”下台湾是美国最好的伙伴。

国民党人士称，特朗普很可能会将“美国在台协会”的地位进行升级，摇身一变成“准领事馆”，那这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双方就真的接近“建交”边缘。但是如果真的实施的话，那么台湾将陷入很大的危险。

各种信息表明，美国正在透过各个层面实施“一中一台”政策。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推进“一中一台”政策不同的是，当下的蔡英文当局是一个彻底的“台独”团体，美国支持台湾搞分裂行动、支持台湾“扩展国际地位”，包括在联合国的活动，必将严重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与政策。

二、“美国在台协会”由暗转明直接介入美台军事合作事务

特朗普上任4年，美台军售高达4000多亿元新台币。“武装台湾”，让台湾掏钱买美国武器对付中国大陆已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也是美国各政府部门、政治人物重点推销的任务之一。而“美国在台协会”在美台新一轮军事合作中也不肯缺席，因而处处突出其游说蔡英文当局与国民党民意代表的角色与意图。

首先，公开承认美国军人进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2019年4月3日，“美国在台协会”称，自2005年起，包括美国陆海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在内的现役美军已进驻“美国在台协会”，而在台湾的新址也会按此进行安保。这是“美国在台协会”首次公开承认美军进驻。

其次，在台湾出席各类军事活动。2019年8月，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批准价值80亿美元对台军售后，20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等人参访台湾海军左营军港，这也是“美国在台协会”官员首次公开“视察”台军。2020年7月26日，郦英杰罕见出席台军两名演习中死去士兵的公祭，声称“为保卫台湾的繁荣和自由”“确保台湾战备能力足以因应未来威胁”。2019年10月12日，“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出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活动，称台湾的防务支出跟不上环境变化，台湾不能一味依赖美国的承诺，必须尽本分投资并提高自身防御能力。2020年8月下旬，“美国在台协会”公开一架台湾战斗机和一架美国空中加油机执行空中加油任务照片，公开宣示美台军事合作成果。

今年以来，“美国在台协会”在美台军事合作上力争露脸，显示出不再隐匿与美国军方、联邦调查局(FBI)等的密切关系，公

开站在第一线，彰显其对美台军事关系发展的重视。

三、“美国在台协会”大变脸与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对手有关

过去4年，“美国在台协会”一改过去相对低调、只做不说的方式，公开站在第一线执行美国的对台政策，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由此反映美国对华战略与对台政策重大调整。

美国政府为了对付中国，重拾“一中一台”政策。上世纪60年代，美国企图推销“一中一台”政策，但是遭到蒋介石当局的“拒绝”。事隔60年，美国重新回归“一中一台”政策，而其本质已有重大转变，美国现在支持的是一个主张“台独”的政党与当局，主张台湾与中国大陆“分裂”。

2019年，美国国防部提出印太战略报告，将台湾列为“一个国家”。2020年5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对华战略方针，强调中美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模式方面的竞争，突出美国将以“全政府方式”，综合运用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一切资源，调动、整合盟国与伙伴国等一切力量，与中国开展竞争，阻止中国对美国的安全挑战。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官方虽然表示将继续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两个公报”为基础的“美国的一中政策”，维持与台湾强劲的非官方关系，但是美国的对台政策不断突破底线，不断冲撞中美关系。2020年10月5日，在“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上，莫健就美国对台政策再次进行宣示，声称“稳定的两岸关系对维护地区稳定至关重要，这一点没有改变”。然而，美国最近的公开演讲和证词强调，中国大陆日益增加的威胁要求美国和台湾加强合作，以维护台湾的安全和整个地区的稳定。莫健重申了“六项保证”具体内容，和当年里根所说“美国对台售武程度要依对岸威胁程度而定”，强调美国在台海两岸问题上的政策并不是真空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意图，将不可避免地推动美国的政策”。与此同时，这些保证的核心是美国继续支持海峡两岸的人民和平解决他们的分歧。莫健认为，在此背景下，有关美台防务合作、防务采购过程，以及台湾自卫和安全需求的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虽然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没有改变，但台湾必须尽其所能，明智地投资于武器和维护，努力训练，发展理论，并在必要的地方进行改革。

在实际操作层面，美国执行的是“一中一台”政策。9月8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演讲时称，美台关系不从属于美中关系，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最可靠的合作伙伴之一。3月19日，郦英杰出席美台成立印太谘商机制记者会时称，“美台关系是基于美国的一中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而美台合作倡议应视为美国与台湾的合作，不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因素。相信美国有可能同时和台湾与中国都维持良好关系，美台关系不应视为对中国的挑衅，不应该与中国因素混为一谈”。

可见，“美国在台协会”履行特朗普政府赋予的角色，将美台关系公开化、官方化，而这恰恰是美国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大陆的重要武器之一。

而受到“鼓舞”的民进党与国民党趁机提出美台“复交”或“建交”。早在去年9月，民进党游锡堃就曾提出过所谓的“台美建交”，当时声称要实现“建交”，在特朗普及蔡英文任内可能性较高。2月13日，刚上台不久的立法部门负责人游锡堃与郦英杰见面，希望美国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建议尽快促成台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FTA)，同时建议美国可以考虑“台美建交”。国民党在立法机构提案台美复交，更是火上浇油，将自己置于与蔡英文当局一模一样的立场上，为蔡英文当局的美台政策“背书”。

尽管美台第一时间给“建交”议题灭火，表示没有美台建交这回事。但是美国将台湾打造成攻击中国大陆的“豪猪”“刺猬”，不断提升美台关系，居心叵测，用心险恶，而且祸害严重，需要高度警惕。

充满争议的台湾地区选举补助款制度

■ 杨晶华

台湾地区的选举政治制度需要庞大竞选经费做驱动，这就为金权政治发展提供了土壤。以避免选举沦为有钱人的专属游戏为理由，台湾地区于1989年在选举中增设选举补助款制度，发展至今已有30年。因选举补助款来自财政预拨付，并且在鼓励政治参与的同时也衍生出不少负面效应，因此其存废与否、领取门槛、金额多少，以及补助对象是参选个人还是政党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台湾社会高度争议的话题。

一、台湾地区现行选举补助款制度

维系政党的基本财源有助于健全政党发展、落实政党政治、促进民主竞争，并减少政党对捐款的过度依赖，以及一定程度避免贪腐与政商勾结的问题。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或地区都设有政党补助金制度。德国早期对政党的补助只采“竞选经费补助”，以所有公民为基础，每位公民以5马克计算，得出总额后再由各政党依得票比例分配。日本90年代政治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金权政治，1994年配合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制定了《政治献金法》，规范政治献金上限以及捐献方法；同年，仿效德国制度，制定《政党助成法》。法国制定的《政治财务透明法》也将“得票数”及“席次”作为公费补助依据。

台湾地区现行选举补助规范中，主要包括个人与政党两个层次。个人补助方面，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3条规定，候选人除不分区及海外侨民民意代表选举外，当选人在1人，得票数达各该选举区当选票数1/3以上者，当选人在2人以上，得票数达各该选举区当选票数1/2以上者，应补贴其竞选费用，每票补贴30元新台币。但其最高额不得超过各该选举区候选人竞选经费最高金额。

政党补助方面，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层面上，根据“选举罢免法”第41条规定，各组候选人选举得票数达当选票数1/3以上者，应补贴其竞选费用，每票补贴30元。但其最高额，不得超过候选人竞选经费最高金额。政党推荐的候选人补贴费用，应由该推荐的政党领取；2个以上政党共同推荐1组候选人时，应共同具名领取。根据“政党法”第22条规定，主管机关对于最近一次不分区及海外侨民民意代表选举得票率达3%以上之政党，应编列年度预算补助之。前项补助，依最近一次不分区及海外侨民民意代表选举各政党得票数计算，每年每票补助50元，并按会计年度由主管机关核算补助金额，通知政党于2个月内掣据向主管机关领取，至该届民意代表任期届满为止。政党依第2项规定领取之补助，应用于竞选费用、人事费用、办公费用、业务费用、政策研究费用及人才培育费用。

二、台湾地区选举补助款制度的发展演变

在台湾地区刚“解严”时期，国民党拥有庞大的党产，民进党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募款比较困难，选举补助款为其发展提供了助力。台湾选举补助款制度最初规范于“动员戡乱时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1989年增修的第45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候选人得票超过各该选举区最低党选票数3/4以上者，应补贴其竞选费用，每票补贴10元，但其最高额不得超过各该选举区候选人竞选经费最高限额。前项最低当选票数之当选人，如凭借妇女保障名额当选，应以前一名当选人之得票数为最低当选票数。第一项所

需补贴费用，由各级选举委员会依法编列预算。

此后，选举补助款制度于1994年进行重要调整，除了调整对候选人的补助标准之外，还增列了补贴政党的规定。个人补助方面，除了不分区与“侨选”民意代表以外，应选1个人的选区，补助得票数达该选区当选票数的1/3者，或应选2人以上的选区，补助得票数达该选区最低当选票数的1/2者，得到的补助款为每票补贴30元，总额不能超过竞选经费上限。而政党补助方面，不分区与“侨选”民意代表得票达5%的政党，获每票5元补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部分，“选举罢免法”1995年7月20日修订版本增加选举补助款规定，得票数达当选票数1/3以上者，每组每票补贴30元，最高不得超过竞选经费上限。政党推荐候选人的补助费用，由政党领取。之后“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分别又在1997年5月31日与2015年1月22日进行了两次重要修订，先将不分区、海外侨民民意代表选举中的政党补贴标准从每票5元提高为每票50元，并将补贴方式从一次性给付改为每年一付，至该届民意代表任期届满为止，后将政党领取补贴的门槛由得票率5%下降为3.5%。立法机构2017年三读通过“政党法”，将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中政党领取补助金的门槛，从得票率3.5%降至3%。只要政党票得票率达3%以上，就能获得每年每票50元的政党补助金，直到该届民意代表任期结束。另外，执政当局对于候选人竞选费用之补助是事后补助，由候选人本人领取，候选人不用申报支出用途，也无须缴纳所得税。

三、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意代表“二合一”选举政党及个人领取选举补助款情况

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当选人蔡英文、赖清德可领取2亿4500多万；国民党韩国瑜、张善政可领取1亿6566万余元；宋楚瑜、余湘因得票数不足选举人总数5%门槛，所缴纳的1500万元保证金依法将不予发还。因这两组参选人都是政党推荐的，选举补助款由民进党、国民党领取。

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方面，根据“中选会”最后公布结果，共有民主进步党(33.97%)、中国国民党(33.35%)、台湾民众党(11.22%)、“时代力量”(7.75%)、亲民党(3.66%)、台湾基进党(3.15%)等6个政党可获得补助款。根据“中选会”计算，民进党获得政党票481万1241票，每年可获2亿4056万2050元；国民党获得472万3504票，每年可获得2亿3617万5200元补助。台湾民众党政党票获得158万8806票，每年可获得7944万300元；“时代力量”获109万8100票，每年可获得5490万5000元补助。亲民党政党票获得51万8921票，每年可获得2594万6050元；台湾基进党获得44万7286票，每年可获得2236万4300元。

四、台湾选举补助款制度主要争议

以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意代表“二合一”选举为例，支付给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的选举补助款总共约4.11亿元；不分区及“侨选”民意代表部分，支付各政党的补助款每年总共约有6.59亿元；区域民意代表部分，支付候选人的补助款每年总共约有3.8亿元。如此庞大的数额，均来自纳税人的口袋，并且选举补助款制度在设计及运行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引发各界质疑。主要争议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举补助款制度的存废。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消耗大量社会资源，滋生激烈的政治斗争，并且导致有效决策的拖沓，整个行政体系都围绕其运转，一直以来都遭到社会大众的诟病。而选举补助款制度作为选举制度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层面意在构建公平的选举环境，使民意可以多元呈现，小党能够存活下来，但在实际的运作中除加重财政负担外，还演变为豢养“政治肥猫”的重要渠道之一。另外，选举补助款出台时，国民党拥有庞大党产，而民进党及其他政治力量一无所有，并且募款也非常困难；为表面上使选举看起来公平，才有政党补助款与候选人补助款，但随着后续的发展，募款逐渐“法制化”，许多企业愿意资助政

党或参选人。很多岛内人士多次提议废除选举补选款制度。前民进党主席、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独立候选人施明德批评，选举补助款已经变质，变成政客致富秘诀，大则以亿计算，中则数千万元尽入私囊，呼吁废除选举补助款。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曾积极支持，并带头提案“修法”，尽快删除“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有关选举补助款的规定。但由于牵连甚广，涉及包括民意代表自身在内的各方政治力量切身利益，很难废除。

二是选举补助款领取门槛。尽管从选举补助款制度的演变看，政党领取门槛由最初的5%下降为3.5%，后继续下调为3%，但各方声音指出政党补助款得票门槛过高，不利小党生存，却使得大党获得丰厚竞选补助，希望能争取“修法”，让小党即便没有办法过5%席次门槛，至少也可以有补助款可拿，不至于竞选落败后面临解散的命运，使得“小党泡沫化”。尽管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让更多资源有限的政党与候选人能够参与到选举中，并且也不能否定此制度在帮助小党生存上确实发挥一定的作用，如亲民党等就将政党补助款作为党务运作主要经费，但相对于资源本来就很丰富的强势政党及候选人，制度的具体设计对于无党籍个人及小党来说并不友善。过高的参选门槛及补助款门槛使得本来就更容易募款的大党或候选人获得更多资金支持，而部分小党如亲民党、“时代力量”等还可以分得一杯羹，其他实力更弱小的小党不仅一无所获，高额选举保证金也领不回来。以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意代表“二合一”选举为例，国民党、民进党领取到的选举补偿款占总额的82.9%。民进党领取到的选举补偿款约是民众党的8倍，“时代力量”的10倍，亲民党或“基进党”的20倍。由此可见，这种制度的运行最终可能会导致大党越来越大，小党越来越小，基本演变为一种蓝绿分赃的制度。不仅不利于改善国民党、民进党两党恶斗的局面，反而起到加剧的作用。因此，岛内相关研究人员提议降低选举补助款门槛，设置领取天花板。

三是选举补助款的使用。因选举补助款来自“财政”，其流向一直是外界质疑的焦点。政党补助款多用于党务，包含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人事、业务、公关支出等日常营运费用。根据台湾媒体报道，1996年李登辉与连战搭档参加大选，选后以补助款成立“李连教育基金会”，主要投入教育领域。2000年大选，国民党由连战与萧万长搭档，选后的补助款由国民党中央加码出资成立国民党智库。至于2004年蓝军推出连战与宋楚瑜搭档，选后为了选举补助款，双方意见存在严重分歧。亲民党认为补助款应该公平分配，但国民党认为选战主要经费都由国民党方面支出，最后还是由国民党领取。民进党对于选举的补助款项规定行之有年，一般党留用1/3，其他2/3交给候选人做公益。2000年及2004年大选，陈水扁获3.4亿余元补助款，悉数由民进党使用。2008年大选，谢长廷、苏贞昌搭档参选获选举补助款1.6亿余元，其中0.2亿元拨回竞选总部使用，1.4亿余元则由民进党中央使用。蔡英文用2012年大选补助款成立了“小英教育基金会”，除资助偏乡课辅、医疗等公益用途外，也与地方县市合作进行政策研究。区域县市长或民意代表候选人与议员等民意代表层面，在选举过程中有许多隐性与显性的成本支出，在选举期间所收受的政治献金用在支付竞选费用后，可能仍有不足，会需要用到补助款进行填补。但对部分知名度高或曝光度高的候选人而言，政治献金扣除所需要的费用往往还有剩余，选举补助款基本可以留作他用。2014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后，曾有媒体报道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将把选举补助款中的1000万元拿来偿还父亲借给他的房贷，引发较大的争议。不同的当选人有不同的处理及运用方式。因为目前台湾针对选举补助款的使用并没有法律规范，同时也没有相关法律规范要求选举补助款的使用必须公开账目。各当选人或候选人当然有权自行使用这笔补助款，扣除选举必要开销后，可以上缴政党中央、成立基金会、用作公益、或

台湾当局强推“爱奇艺条款” 将冲击台湾影视产业

■ 李仕燕

如果要问两岸民众2020年两岸最火的电视剧，台剧《想见你》应当是不可缺少的答案选项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下，这部本在岛内电视频道周末放映的电视剧，能够红遍两岸，甚至打败多年前台剧《恶作剧之吻》，荣登韩国 Naver 台剧搜寻榜之冠，离不开影音 OTT(Over The Top，即网络串流媒体) 平台爱奇艺的助力。

然而，助力台湾文化产业复兴的爱奇艺台湾站，却在2020年8月被台湾当局突然宣布“违法”。为了防堵所谓的“陆资”和“中国文化入侵”，台湾当局火速修改有关条例，禁止台湾业者代理祖国大陆影音 OTT 与销售会员等事务。鉴于岛内目前仅有爱奇艺台湾站符合该条款，因此亦被称为“爱奇艺条款”。

爱奇艺，风起宝岛

作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影音 OTT 龙头之一，爱奇艺最初是以韩剧《太阳的后裔》打响名号，进入台湾市场的。相较其他韩剧在线播放平台，爱奇艺无论在翻译准确度，更新速度，还是周边花絮与精华 CUT 片段上，均获得台湾用户的认可。此后，爱奇艺台湾站增加不同来源地的影剧，中国大陆、日韩、东南亚与欧美均有上架。2017年，曾进入台湾“学测”(高考) 试题的祖国大陆剧《延禧攻略》正是爱奇艺台湾站率先引入宝岛。而包括《中国好声音》在内的热门综艺节目，以及台湾观众喜好的《航海王 One piece》等动漫，同样成为台湾用户追捧观看的内容。2019年，爱奇艺台湾站全站流量冲破17亿。2019年台湾 Google 戏剧搜寻排行前五名当中，有三部作品在爱奇艺台湾站独播，分别是由台湾青年演员林依晨参演的《小女花不弃》、祖国大陆剧《皓镧传》与韩剧《德鲁纳酒店》。组建四年多以来，爱奇艺台湾站在岛内掀起的在线影音风潮已蔚然成风，融入民众生活。然而，这个台湾民众在线娱乐的主要平台，却有一个曲折的落地故事。

曲折落地，口碑取胜

2015年，爱奇艺连续获得《琅琊榜》《女医 · 明妃传》与《花千骨》等多部作品的在线播放权，并一举拿下台湾标志性综艺节目《康熙来了》的在线播放权，被视为进军台湾市场的重要起步。此后，爱奇艺与同为网络影音 OTT 平台的美国 Netflix，以及依托通讯软件 LINE 来自韩国的 LINE TV，相继向台湾当局申请核准在台湾成立子公司。台湾当局核准 Netflix 与 LINE TV，却驳回了爱奇艺。为了进军

者用在个人私事方面，等等，全凭其个人意愿。选举补助款的使用不存在任何法律责任，只会在道德责任或社会观感上存在一定的约束力。因此，许多岛内研究人员呼吁应该对选举补助款的使用“法制化”，将固定比例用在政策研究上，借此提高候选人政见能力及日后问政的质量，以真正落实政党政治。

综上，目前不合理的补助制度使得一些政党与个人的参与以获得更多资金补助为目的，从而助长了不当预期与投机得利，但又因“提案权”与“立法权”的掌控者正是“奶酪”的获得者，从而使制度很难朝向真正良性的方向发展。

台湾市场，爱奇艺被迫选择以代理的方式，授权台湾代理商“欧锑锑娱乐”公司负责在台湾开展包括会员销售与宣传等业务，依法在台湾登记与缴税，组建成立“爱奇艺台湾站”。台湾影音 OTT 市场进入激烈争夺时代。

即使在起跑点上略显“先天不足”，且时常因“大陆因素”在“太阳花”运动后的台湾社会被“刁难”，爱奇艺台湾站仍旧凭借自身作品与优质会员服务，一步步赢得台湾消费者的认可。一方面，爱奇艺台湾站继承爱奇艺 (大陆) 庞大的影音资源，向台湾用户提供丰富的观看内容；另一方面，比起高高在上的 Netflix，以及内容相对单一的 LINE TV，爱奇艺台湾站加大了对台湾本土综艺与影音产品的采购与对外推广。台湾本土实境综艺节目《综艺玩很大》、台剧《我们不能是朋友》和《想见你》等，均通过爱奇艺平台走出宝岛，进入中国大陆、日韩与东南亚市场。

截至2020年1月，爱奇艺台湾站成功领先同为影音 OTT 平台的 Netflix 与 LINE TV，稳居台湾影音付费订阅人数排名第二，仅次于 YouTube。表明台湾消费者认可爱奇艺台湾站的作品与资源，也强化了爱奇艺台湾站扎根台湾的决心。据统计，台湾15-49岁民众中，约有96% 有透过影音 OTT 平台观看影音的习惯，平均人均使用3.2个影音平台；高达78% 几乎每天收看，平日每人平均2.8小时，假日则增加至4.7小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有21% 使用者“宅”在家超过6小时疯狂刷剧。

两岸人员交流因疫情受阻之时，正是一部高流量的爆款台剧《想见你》让两岸民众得以实现“云交流”，刷出极高的收视率，也让《想见你》成为疫情阴霾下台湾影视业脱颖而出的逆势“奇葩”。2020年暑假，在爱奇艺台湾站与台湾“公视”同步播出的新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也已积累了过千万点播率，被视为今年下半年的“台剧大黑马”，在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引起不少关注。2020年7月，爱奇艺台湾站公布，2020上半年全站流量近7.5亿。

为了延续好口碑与高流量，2020年上半年，爱奇艺台湾站宣布2020年将购入9部台剧，同时计划2021年开始在台湾自制节目，让更多观众认识与了解台湾。然而，这一切计划最终却被民进党当局一纸禁令而中止。

跨级拦截，自损行动

早在爱奇艺申请在台湾落地的2015年，绿营就已经在立法机构炒作过所谓的“文化统战”议题，间接造成马英九当局未能批准爱奇艺落地的决定。2016年，台湾再次政党轮替。同为祖国大陆影音 OTT 巨头的腾讯视频海外版 WeTV 最终放弃落地台湾的计划。而在爱奇艺台湾站在台湾经营的这4年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绿营政客拿出来“消费”一通。

2020年3月，台湾通讯传播主管部门 (简称 NCC) 率先针对所谓美国国务院出版的“2019年人权报告”中提出台湾媒体受中国大陆影响的内容，发布新闻稿，提出要法办与推动修订 OTT 相关法规。随即，民进党籍民意代表范云在立法机构提出质询，指爱奇艺台湾站违法绕道落地台湾，规避列管，呼吁通讯传播主管部门勿姑息，要比照所谓的“外国企业”标准尽速列管。在现场被范云质询的苏贞昌回应，要防止所谓“入岛、入户、入脑”的统战手段，自称一定不会让“中国 (大陆)”达到并吞台湾的目的。这一表态已被媒体解读为通讯传播主管部门修法抹上了政治色彩，营造祖国大陆威胁所谓台湾安全的“鹤唳风声”。

为了维护自身权益，爱奇艺台湾站台湾代理商“欧锑锑娱乐”公司开始依据台湾现行法令维权，和台湾本地影音 OTT 业者共同参与由通讯传播主管部门主导的所谓“网路视听服务管理法”草案座谈与公听会。然而，就在9月3日公听会开会之时，台湾经济部门突然公告禁止台湾业者代理或销售大陆 OTT 相关条款，且即时生效。这种跨级、跨部门的“精准”拦截，在台湾文艺界实属罕见。这一条款不仅直接让爱奇艺台湾站瞬间失去“合法”身份，而且将台湾全部影音 OTT 平台“一网打尽”。大量直接或间接代理祖国大陆不同类型影音 OTT 的台湾

中小型企业均被集体拉下水。而该条款衍生出来最快的效应，竟然是爱奇艺台湾站代理商“欧锑锑娱乐”放弃代理权，宣布裁员，被台湾业界批评该条款“自损”。

由于禁令毫无缓冲期，广大爱奇艺台湾站台湾用户面临退款困难的风险，引发舆论哗然，甚至有台湾会员网络串联要向通讯传播主管部门追讨会费。通讯传播主管部门被迫出面解释，按照台湾现行网络规范，台湾用户仍可直接跨境收看与跨境支付会费，继续登录爱奇艺会员账户与 App，间接承认台湾经济部门的禁令对台湾用户来说形同虚设，权益不受损失。而受损失的是无法从合法代理企业中收税的台湾当局，以及被企业裁减的台湾员工。长远来看，台湾文化产业将受到更深远的波及。

看见台湾，需要爱奇艺

文化产业与社会发展相生相伴。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与“亚洲四小龙”身份相匹配的是台湾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尤其影视领域。《还珠格格》《流星花园》与《恶作剧之吻》等台湾影视作品曾席卷亚太地区，汇聚成一股强劲的台湾文化“软实力”。然而，伴随岛内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尤其是政治生态的重大变化，台湾文化产业一度陷入资金、场地、剧本与人才的多重断层。

个人对个人 (P2P) 技术率先打开了两岸影视业的时空壁垒。2008年前后，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与《大学生了没》，台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等相继打入祖国大陆市场，再次燃起了台湾文化产业的希望。此后，2008-2016年，得益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双方文娱界合作越来越紧密，大量电影、电视剧与综艺节目共同合作，众多台湾影视演员、导演与编剧穿梭两岸，实现资源互补与人才互助。近年来，在红遍两岸的影视作品中，如《步步惊心》《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与《如懿传》等，都能见到台湾影视业者的身影。

2016年5月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岸既有官方沟通机制停摆。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协商制订的两岸影视节目互相发行播映规定已不合时宜，却未能开展进一步沟通协商。两岸影视业在产值、资本与人才等方面落差日益拉大，台湾影视作品缺乏一个对外输出与展示的窗口。2016年，由台湾本土的“台视”“八大电视”与“公视”、多位本土导演与青年一代演员共同发起，旨在提升台湾影视业竞争力的“植剧场”计划，推出了包括《花甲男孩转大人》《茶藨》与《恋爱沙尘暴》等短篇影视作品，培养了包括吴慷仁、卢广仲、许光汉、安心亚等新生代演员。在“植剧场”计划完成的2017年，台湾“公视”首次与 HBO Asia、新加坡稜聚传播跨国合制的短篇电视剧《通灵少女》，首次探索对外输出的路径与可能性。然而，这些打着按 HBO 标准制作的台湾影视作品，尽管培养了新人，提升了拍摄技术，但受限于输出地语言、社会风俗以及影音平台的各种苛刻条件，实际与 HBO 合作外送的台湾影视作品，对外传播效果参差不齐。大部分局限于华人聚居的东南亚或部分北美地区，然后“出口转内销”再回到岛内。

现阶段，中国大陆是全球影视业的沃土。2018年，中国大陆电影票房录得600亿元人民币。在影视领域，自2006年改为备案制后，影视作品备案数量每年增势明显。2015年，中国大陆备案剧集总集数全面跨入4万集时代。同年，影视 OTT 平台成为中国大陆影视业新增长点。4G 技术与智能手机的问世，促成手机移动 APP 与网络电视普及，助力“后起之秀”影视 OTT 平台挑战传统卫星电视台在影视作品与综艺节目，乃至少儿节目的垄断地位，甚至出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基本形成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与芒果 TV“四强鼎立”格局。

爱奇艺作为唯一一个落地台湾的祖国大陆影视 OTT 平台，为台湾影视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曝光机会与潜在商机。正是在爱奇艺的搭桥引路下，经历过“植剧场”的演技培养以及 HBO 制作双重磨练的台剧《想见你》，才能突破两岸现行影视播映限制与规定，顺利“登陆”爱奇艺 (大陆) 与腾讯视频两大平台，冲高人气，获得2020年台湾金钟奖多项提名。而类似的成功案例还包括，2019年率先

在爱奇艺台湾站宣传的台湾“公视”、影音 OTT 平台 CatchPlay 与 HBO 三方合制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引起祖国大陆网民关注。最终由被台湾当局“吓跑”了的腾讯视频 WeTV 高价购得祖国大陆独播权，开创了同类社会议题台剧“登陆”的成功先例。《我们与恶的距离》在祖国大陆豆瓣网拿下9.4高评分，助力其最终拿下2019年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影片。

2020年，全球影视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巨大，欧美地区普遍无限期停工。行业巨头美国迪士尼公司不得不将精心打造的电影《花木兰》，在欧美地区转向在线影音 OTT 平台 Netflix 播放。相较之下，中国大陆电影业已开始复苏，8月最早恢复上映的国产电影《八佰》创下亿元人民币票房。更重要的是，与欧美影视业停摆情况截然不同，中国大陆一方面保有大量影视作品库存，足以满足中国观众与海外观众需要。2020年暑假，爱奇艺台湾站推出《隐秘的角落》《三十而已》，立即受到台湾用户高度关注。腾讯视频海外版 WeTV 爆红的《传闻中的陈芊芊》，芒果国际 TV 与华策影视 YouTube 频道更新的《以家人之名》，以及在优酷与芒果国际 TV 同步播出的网剧《琉璃》，均为2019年已完成拍摄剪辑的作品。相较于欧美基本停工、日韩在疫情之下艰难地“边拍边播”，以及台湾地区少量库存的情况，中国大陆还有大量作品仍在排队上档。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良好的防疫成效也助力影视业尽快复苏。通过制定严格的防疫规定与打造全封闭拍摄环境，中国大陆成为全球影视业最早安全复工的地区，甚至出现横店拍摄基地8000名临时演员仍不够用，工资普涨30%，有台词有经验的临时演员日薪可达5000元人民币的“复工奇观”。

祖国大陆影视业的复工，给台湾影视从业人员提供了工作机会。因《想见你》而爆红的男主角、台湾新生代青年演员许光汉受邀到祖国大陆参加综艺节目，拍摄杂志封面，拿下多个品牌代言。而同为新生代、被台湾网友称为“最萌国民男友”、曾在爱奇艺独播过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台版) 与《我们不能是朋友》担任男主角而被祖国大陆观众熟悉的刘以豪，同样在祖国大陆复工复产后，到祖国大陆参与新剧拍摄。此外，由《我们与恶的距离》编剧吕蒔媛打造的台剧《她们创业的那些鸟事》，已由爱奇艺购买独播权，并已经受到祖国大陆豆瓣网的关注。

业界都在努力，当局为何放弃

事实上，自2019年起，爱奇艺已经推出海外版 App，目前已在全球60个地区开放下载。此次“爱奇艺条款”反而加速了爱奇艺海外版 App 在台湾上架的速度，预计2020年年末将原本“台湾站”内容并入海外版。腾讯视频与芒果 TV 两大平台也加紧了国际化脚步，代表未来由包括爱奇艺在内的祖国大陆影音 OTT 平台采购的台湾节目将“自动”获得全球众多地区用户观看的舞台，而这个舞台正是众多台湾影视业者梦寐以求的。

《想见你》男二号施柏宇应邀到祖国大陆参加综艺节目《创造营2020》，担任嘉宾导师。返台后，施柏宇透露自己花了3天时间与学员一起完成《怪女孩》舞台练习。而在休息的时候，大陆学员照样工作练习，让他感叹“有多少人努力着，我们凭什么放弃”。

蔡英文曾多次公开表示要努力让世界看见台湾，也曾自曝喜欢在睡前吃泡面，刷一刷最初由爱奇艺台湾站引进的大陆宫斗剧《延禧攻略》和《如懿传》。苏贞昌曾在2018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竞选时，用《延禧攻略》中的角色来自诩自己，拉近与新北市民众的心理距离。绿营多位民意代表也曾被曝光，一边在立法机构通宵“守夜”“反中”，一边在议事会场刷爱奇艺追剧。由此表明，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之风早已成型，且这些绿营政治人物也是“跟风”之人。那又为何要放弃一个既可为台湾创造就业机会，满足台湾观众需求，又能助力台湾作品走出宝岛，进入最大影视消费市场的祖国大陆，让世界看到台湾影视作品的平台呢? 蔡英文当局此举无异画地为牢、自我设限，最后受伤的还是台湾影视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

台湾选举政治中的网络媒介及其影响

■ 翁明源

在台湾地区选举政治中，不同媒介有不同的功能和侧重，例如PTT(批踢踢实业坊)侧重文字性讨论，YouTube(“油管”)侧重影音视频分享，脸书(Facebook)则侧重信息的综合和扩散。因而在进行选举操作的时候，不同媒介也有不同的应用方式。在台湾当前选举实务中，社交媒体是最主要载体，PTT、LINE、YouTube、脸书、Instagram、推特(Twitter)、WhatsApp等都在发挥作用。

一、PTT

通常来讲，新的媒介方式出现会逐渐替代旧的媒介方式，但PTT却是个例外。PTT全称批踢踢实业坊，是1995年由台湾大学学生杜奕瑾成立的一个BBS网站。经过20多年发展，同期成立的其他BBS网站大多都已关停，而PTT则走出台湾大学成为当前台湾地区最大的BBS网站，拥有每天约15万人次访问量。

虽然界面单一，长期以来以文字为主，但是PTT却是台湾地区最主要的信息发布和讨论平台，很多媒体记者也都到PTT取材。这主要是因为PTT不隶属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同时主张学术中立和绝不盈利，并且通过特别的算法和严格的制度清除行为异常的网军账号。因此，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网络讨论平台。然而，PTT虽然不受控制，但PTT里的账号却可以被控制。公关公司可以在PTT长期培养账号，以摆脱PTT对新账号在发文评论上的限制，当有政治团体提出诉求，这些账号就可以用来为这些政治团体服务，宣传自己，抹黑对手，俗称“带风向”。同时又因为PTT长期标榜的客观性，网民通常不太会怀疑这些账号及其信息的真实性，从而使得PTT上的“带风向”比传统媒体有更好效果。在岛内喧嚣一时，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杨蕙如豢养网军事件，就是杨蕙如利用在PTT长期培养的账号为特定政治人物服务。

二、LINE

LINE起源于韩国，在日本获得成功，现在已经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台湾地区有了大规模发展。LINE是一个即时通讯类软件，类似微信，可以进行即时信息传递和通话，也存在类似于微信的“朋友圈”和“公众号”功能。截至2018年，台湾有高达89%的人使用LINE，是台湾地区进行资料传递的重要工具。

LINE在台湾选举中的应用主要是两个方面功能。一是信息定向传送。如果对某个候选人感兴趣，可以关注这个候选人的LINE，然后就会收到这个候选人的行程信息、新闻信息和言论信息等，还可以跟候选人进行一对一互动。LINE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功能是组织动员和协调，LINE的群组功能是选举动员重要工具。候选人的竞选总干事会把各地方桩脚或“蛇头”，或网络中的意见领袖或网军拉到一个群组当中，当候选人需要在线下进行造势充人头或线上组织“带风向”的时候，这一个个群组就会扮演起“指挥部”的功能，总干事在群组中下达和分配任务，协调各桩脚之间的利益分歧。

三、YouTube

YouTube是全球最大视频播放网站，有超过10亿使用者，使用者每天在YouTube观看影片总时数突破10亿小时，产生的观看次数每天也高达数十亿

次。作为一个视频播放网站，YouTube之所以也被视作社交媒体，是因为它上面也存在由网民自发组织、分享资源交流想法的虚拟社区。YouTube上的视频除了特定媒体的专属视频之外，主要都是普通网民自发上传的视频，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订阅专属的视频类型，并且可以在每一个视频下面进行交流。

YouTube还会根据个人观看记录推荐相关视频。在网络时代的选举中，广告宣传片是候选人展示自己，打击对手，打动选民的重要武器。由于YouTube相关性推荐功能，每当网民在搜索候选人或候选人对手及其他与候选人有关的主题时，都可能会看到候选人的广告宣传片，极大地增强了广告宣传片的传播效应。因此，只要候选人拍摄的宣传片足够多，涉及的主题足够广，候选人的视频就可能出现在网民的搜索词下面。YouTube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在于它是候选人各项活动进行直播和视频传播的最主要平台，无论是选举造势还是网络节目直播都需要借助YouTube实现。在网络流量无限化和智能手机普及化的今天，每支手机都是一个摄像头，候选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可能会通过手机经由YouTube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

四、脸书

同样诞生于校园的脸书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2020年月活跃用户已经增长到约24亿。“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启了‘脸书选举’的年代”，奥巴马运用脸书辅助选举成为其胜选重要因素。此后，脸书在选举中的应用进一步扩展，以至到2016年被指责为干预美国选举的利器。脸书在台湾选举中的应用主要开始于2012年。蔡英文和马英九都注重对脸书的经营，开展了密集的选举攻防，近乎蔡英文三倍的粉丝数量是马英九赢得网络战场的重要原因。自此，脸书成为台湾地区各类选举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脸书以高达92.8%使用率成为台湾地区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体平台是有原因的。脸书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综合性社交媒体，既可以像PTT那样进行信息发布和讨论，也可以像LINE那样实现信息即时传输和多人群组沟通，还可以直接嵌入YouTube进行视频播放和开展直播。不仅如此，对选举来讲更重要的是，脸书可以合法地置入政治广告，并根据对象的浏览倾向定向推送；而好友之间的互相转发可以迅速将信息扩散出去。候选人只要拥有足够多账号，建立相关群组和粉丝专页，就可以使他的对象选民沉浸在对候选人有利的信息当中。但也正是如此，脸书也被诟病容易把选民带入“同温层”，而受到候选人操纵。

网络的出现和发展彻底改变了台湾选举政治面向，一方面对选举本身来讲提高了效率增加了透明度，但另一方面对选民和选举情势来讲却也加剧了政治分野，模糊了选举焦点。

一是提高选举效率。网络技术应用大大减少了选举成本，客观上提高了选举效率。在传统选举中，文宣和组织是两个主要板块，也是花费最大的板块。文宣除了在街头插旗挂广告牌外，还要在报纸电视和公车上买广告，面临缺乏选民反馈、展示时间滞后、变动不易、展示成本高等缺点。但是借由网络优势，不仅文宣的发布更加多元而便捷，而且每一条信息的输出都能获得反馈，可以及时地根据这些反馈和突发事件灵活改动自己的文宣内容，而这些花费只需要一个编辑和专业文宣制作团体。组织方面，传统选举组织需要长期的地方经营，需要与地方派系和桩脚保持良好人际关系。而在网络政治中，不需要请客吃饭的网络动员可以依靠网络的扩散性发布消息，依靠网络的便捷性进行指挥操作，从而极大节省了组织动员成本。

最为突出的是2014年参选台北市市长的柯文哲。柯文哲本身是政治素人，缺乏政党和财团支持，因此，选择了通过网络展开选战。“‘不插旗、不挂广告牌、不用宣传车’，把重点放在了低成本的网络宣传战中，先后推出了30支‘柯P新政’政策影片，利用YouTube充当播放

平台，再透过脸书扩大宣传，增加点阅率。”获得了以年轻人为主网民的追捧，最终赢得了选举胜利。

二是增加选举透明度。在网络政治时代，候选人的一言一行都会留下痕迹，不仅如此，候选人过去的所有经历都将经受对手的检视并且在网络上散播开来。因此，客观上限制了候选人进行暗箱操作和违规选举的作为，选举的每一过程都会被选民用放大镜进行观察，从而增加了选举透明度。而另一方面，通过网络监督以及与候选人互动，选民对选举的参与也更加频繁且全面。同时候选人可以更加及时地回复选民诉求，并不断告诉选民他们的重要性，使得选民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对选举的参与和候选人的影响，提升了选民的选举效能感。

三是加剧政治分野。在传统选举中，选民对选举信息的接收是被动的，因此客观上选民会被动接收竞选各方的选举信息。而在网络中，选民可以在极其丰富的信息源中进行自由选择。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选择的自由，大部分选民会选择与他们主张接近的看着让自己舒服的信息源，而不会选择那些刺眼的会颠覆自己认知的信息。并且在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说服下，选民会认为对候选人不利的信息都是对手抹黑，都是假消息，从而更加坚定自己对候选人的支持。这就是网络政治中同温层的形成。网络技术本身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同温层。无论是脸书还是YouTube，都有一种功能是根据网民的浏览记录进行相关内容推荐。比如关注韩国瑜的选民就主要会被推荐韩国瑜相关的信息，从而使得选民在有限时间内接触的都是韩国瑜相关的信息，而强化其对韩国瑜的认知。第三种强化同温层的方式是利用网军“带风向”。当选民在浏览某些新闻评论时，首先看到的是数十条同一倾向性的评论，从而使其误以为全体民众的想法都是这种倾向，如果跟自己的想法一致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认知，而如果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就会怀疑自己然后不敢发言，形成“沉默螺旋”。殊不知这数十条评论可能都来自同一家公司的网军账号。

而不同同温层的形成则加剧了选民的政治分野。蓝绿不同阵营选民在同温层的影响下都认为自己掌握的是真相，都把对方视作被“假消息”蒙蔽而冥顽不化的人，与对方的交流也多带有这样的偏见，从而减少了双方真诚交流客观评价政治事件的可能，也使得双方的政治分野愈发难以弥合。

四是强化政治恶斗。台湾选举中的政治恶斗主要是蓝绿恶斗，一直以来都为人诟病，而网络政治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恶斗。由于网络信息的巨量和网络传播的迅捷，一条劲爆的消息无论真假都很容易掀起网络热潮，并对选民认知造成冲击。因此，在过去依靠黑函耳语的攻击手段，如今在网络社会中迅速应用并且产生了扩大化影响。诚如自比“东厂”的前“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副主委”张天钦所言，“间接影射杀伤力最强了”。 因此，竞争对手会在网络上释放无论真假的劲爆消息，以抹黑对手，影响选情。而进一步的恶果则是减少了在选举过程中本应是重点的政策主张，而充斥着不知真假的抹黑对手的消息，模糊了选举焦点。

综上，网络媒介的争夺是选举政治发展不可逆的趋势，它不仅仅是传统政治过程的网络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的更新，也带来了民众参与政治新形式和选举操作新模式。网络媒介在台湾地区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越来越重要，谁掌握了网络政治的运作逻辑，谁就能够更好地适应网络政治发展规律，在选举中占得先机。在2020年台湾地区选举中，网络媒介已经成了候选人进行选举操作和民众参与选举过程最重要的载体，网络突发事件的迅速传播会显著影响选举情势变化。网络媒介的政治化对台湾选举来讲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则需要仰赖台湾民众的智慧和政治人物的良知。

蔡英文当局继续炒作消费陈同佳案

■ 香港 姚志胜

陈同佳2018年2月在台湾涉嫌杀死女友后逃回香港，被控以洗黑钱罪罪成，2019年10月刑满出狱。陈同佳通过发放的录音强调，到台湾自首的意愿一直未有改变，并已通知台湾代表律师联络相关部门处理赴台自首安排，希望在10月内成行。然而，蔡英文当局却百般阻挠，台湾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表示，不会让陈同佳以“自由行”方式赴台云云。

事实上，陈同佳在香港出狱后，已经表达愿到台湾地区投案，但蔡英文当局却先后抛出对陈同佳实施入境管制、发话要派员赴港押解陈同佳、特区政府不使用“单一窗口”等脱离法律实际甚至是捕风捉影的说法，使陈同佳始终无法到台湾投案。蔡英文当局抛出各种各样的说法，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的只有一个：不让陈同佳赴台投案，继续炒作消费陈同佳案。

整起杀人案都发生在台湾，罪证也在台湾，根据属地原则，完全应由台湾侦办，香港并无司法管辖权。台湾蔡英文当局却转移矛头，一直针对特区政府，说“香港不愿意侦办”，指责“港府推卸责任”云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众所周知，港台之间并没有司法互助及引渡协议，特区政府无法把陈同佳送到台湾受审。香港警方只能以他偷盗死者财物控告洗黑钱罪。特区政府亦多次强调，陈同佳出狱后已是自由人，他是否联络台湾相关人员，是否经由其律师作其他安排，或以任何方式赴台，是他作为自由人的选择，特区政府没有法律授权作出任何干预。然而，台湾却“听而不闻”。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是，两地没有移交法律基础。苏贞昌所谓“两地政府要商讨”，坚持“通过两地政府协商处理”，根本就是有心刁难，故意制造事端。

本来，疑犯自首是最直截了当的处理方法，那么，蔡英文当局为何千方百计阻挠陈同佳到台湾自首？明眼人一看就知，蔡英文当局是食髓知味，仍然在恶意消费陈同佳案。人们不可能忘记，香港修例风波缘于陈同佳案。蔡英文当局上任以来，政绩乏善可陈，蔡英文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就是靠打“香港牌”、大肆炒作香港修例风波而使支持率起死回生。在蔡英文当局看来，陈同佳案是一根始终插在特区政府心头的刺，拖越久对特区政府越不利。蔡英文当局岂会轻易让陈同佳赴台投案，让港府解套？

必须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蔡英文当局搞“台独”搞昏了头。民进党当局和美国加紧勾连，演出美国高官接连赴台的闹剧，频繁制造事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大陆不仅发出强烈警告，而且在军事上作出强烈反制。现在，民进党当局在陈同佳案上诸多阻挠，企图借此玩弄“台独”把戏，不过是痴心妄想，注定是死路一条。

需要留意的是，香港反对派议员竟然在陈同佳案上与台湾民进党当局遥相呼应，配合默契。根据香港现行法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安排不适用于“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其他部分”。如果有人在台湾犯事后逃到香港，台湾没有法律依据要求香港警方移交逃犯和提供资料，香港特区政府也不可能违反法律就陈同佳案向台湾提供证据。

然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接受传媒访问时声称，倘能将陈同佳在香港录取的口供转交台湾，相信能有助台湾调查。反对派的说法显然是配合台湾将陈同佳案炒作成政治事件，误导公众，混淆是非。反对派议员无视香港的法律规定，与台湾民进党当局狼狈为奸，损害香港的利益，必须予以谴责。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

国民党“双提案”是闹剧

■ 刘红

今年以来，国民党一直不顺，在大小3次选举较量中一直处于下风不说，围绕党内改造、论述调整和两岸政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双提案”的怪事，作为新变局中的战略误判和现实挑衅，只能是闹剧而已。

一、隐形于“双提案”的“过时梦”

10月6日，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抛出“政府应请求美国协助抵抗中共”及“与美复交”两项“决议案”。第一案表示要“请求美国协助”以“抵抗中共”，要蔡英文当局“积极说服”美国政府依照“与台湾关系法”精神，“一旦中共有明显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时，在‘我国政府’请求下，将前述中共举动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并以外交、经济与安全防卫等方式协助‘我国’抵抗”。第二案声称，蔡英文当局“应以美国与‘中华民国’恢复‘邦交’作为对美国外交目标，并积极推动”。“双提案”在立法机构“无异议通过”。要说有什么不同，据一些媒体报道，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只是把“原提案”中的“当台湾遇到危险，美国应用直接军事等方式支持台湾”，修改为“安全防卫”方式。

“双提案”按国民党的解释，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运用，却难以掩饰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心理状态中的强烈冲动和历史萦绕。“美国梦”在国民党一些政治力量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台湾当局和美国“建交”“美国协防台湾”那些往事。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撤到台湾、两岸对峙正式形成后，虽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曾经有过“弃蒋、进而弃台计划”，但很快出现改变，因为刚从中国大陆撤到台湾岛内的台湾当局，需要维持在岛内的政治地位，需要同中国大陆全面对抗，需要维护国际活动空间。美国需要围堵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成为其前进基地。政治上的一致促使双方走到一起。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成为双方合作启动时点，提升台美“实质关系”和“美军协防台湾”成为具体合作点。

军事上“协防台湾”。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要求第7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全面部署侵入台湾海峡。6月29日，美国第7舰队6艘驱逐舰和2艘巡洋舰侵入台湾海峡开始巡弋。7月31日，美国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赴台同蒋介石会谈，议定台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1951年5月1日，美国在台北成立“军事顾问团”。在此前后，各类先进战斗机、军舰、坦克、大中型火炮在内的美国军事力量，大量进驻台湾。1954年12月3日，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完成“协防台湾法制化”。

“外交”上提升关系。1949年8月2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结束3年任期后，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保持“代办”级别。1950年7月28日，“驻台公使衔代办”蓝钦赴任，1953年初晋级为“大使”，台美“邦交关系”正式确立。同时，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最多时维持69个“邦交国”。

经济上全面援助。美国提供、台湾急需的各类生产生活资料源源不断运抵台湾。1951年开始至1968年结束“美援”的18年间，美国给予台湾的经济援助共14.82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民所得

的8%，国际收支经常账差额的86%，及同期全部固定资本形成的58.8%。“美援”结束后，1967年到1977年底，由台湾当局担保的各种对美借款达65.58亿美元，相当于18年美国“经援”的4.4倍。这些贷款额相当于1966年到1978年期间台湾当局及官营企业固定资本形成的四分之一。正是因为台美此类关系的存在，成为台湾当局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这种情况维持30年，到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时，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和壮大，一方面是国际格局的调整，一方面是美国留在台湾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因此美国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从台湾撤走一切美国武装力量，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伴随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国际活动空间也在“一个中国格局”中不断调整，不仅退出联合国，“邦交国”也大幅减少。上述情况已经延续40余年，还将继续下去。

“双提案”折腾的是历史故事，70余年前发生，40余年前改变，今天竟然想要一步回到当年，难怪提案人信心不足，国民党也没把其列为行动纲领，舆情上反响不热烈。甚至民进党方面也不敢配合，只是由对外关系负责人公开表示，“目前不会寻求与美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一旦台海发生冲突不会依靠美国介入”。可见，“双提案”只有挑衅性没有可行性，所以在岛内都没有炒作起来。

二、“双提案”性质十分严重

“双提案”无力拨动中国大陆掌控下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大局，却已伤害国民党40多年来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象。

（一）“双提案”是两岸关系的历史倒退

一是从两岸关系性质和发展过程看，美国因素是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两岸关系要发展，必然要解决中美关系问题。40余年前，中美两国关系理顺、台美官方关系结束是“因”，缓和军事对峙、两岸关系进入交流交往时期是“果”，也就是两岸关系之所以迎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中美处理台湾问题的正确态度，成为中国大陆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推动两岸交流交往的重要国际环境和政治动力。显然，“双提案”是要毁“因”来毁“果”，是要让两岸关系回到40余年前的老样子。

二是“台美复交”“请求美国协防台湾”是要恢复台美间“断交、撤军和毁约”前的状态，是要挑战国际格局中的基本架构，是在冲击“一个中国格局”。请问，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众多国家，无论是国际重大活动，还是履行国际条约，怎么能够改变当今国际格局的基本架构？台湾有何实力，有何能力，能让美国舍弃综合实力位于世界第二的中国大陆？置世界进步、两岸关系发展于不顾，留恋40余年前、70余年前的世界有点可笑。

三是要测试祖国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耐心。“双提案”要做的事，不仅是涉及台美间的事，也是两岸间的事，是要一步回到曾经存在30年的两岸军事对峙阶段，是要无限期拖延祖国统一大业。两岸关系的发展现实和成果，决不允许走回头路。中美建交、两岸交流交往40余年来，中国大陆在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台美关系中的话语权、主导权和掌控权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大陆在特朗普发动的以遏制中国大陆发展为主旨的外交冲突中越来越主动，中国大陆在防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上越来越成功。“双提案”是开历史倒车没有出路。“双提案”如果得到蔡英文当局的全面贯彻、落实，对“台独”来讲则要面临一场大惩罚。

（二）“双提案”是“新论述”的必然结果

在党主席江启臣等“中生代”主导下，国民党内“两岸政策新论述”出现偏向。如把“九二共识”加上“宪制性”限定，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优先”极端化等。在“九二共识”形成过程中，以及在“九二共识”指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过程中，都没有相关资料证明在“九二共识”上加上所谓“宪制性”的存在。如9月6日的国民党全代会“党务报告”称，“两岸交往与台美合作同步并

行”。事实上，两岸关系和台美关系对台湾来讲都十分重要，但性质不同，侧重点也不同。台美关系必须在一个中国格局中运作，两岸关系则是内部事务。如国民党的“核心论述”，为‘九二共识’设置限制性条件，为国民党在两岸关系发展上扮演积极角色设置障碍。国民党自我设限的后果是，不但提不出积极的两岸问题解决方案，而且原有优势也进一步流失，对两岸关系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国民党“新论述”对于两岸关系指导原则、政治定位和发展前景的偏向，成为“双提案”出台的背景和舆论准备，更是一种必然结果。面对美国不希望中国统一心态在特朗普时期又有强化的现实，国民党内一些人直接围绕这一台湾问题的症结做文章。更要看到，“双提案”是有“影子内阁”之称的国民党智库部分成员策划，立法机构党团出面提出，因为党主席江启臣是立法机构党团成员，等于是智库、立法机构党团和党的领导集团共同参与，因而性质更加严重，情节更加离奇。“新论述”失误之处与“双提案”一起，使得40余年来国民党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者和力行者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三）“双提案”是剜肉补疮式的小算计

“双提案”出台后，国民党自知问题严重，没有“提案成真”的可能，因此围绕如何落实、实施提案本身没有过多诠释，在相关场合谈及也是有所克制，而且还通过一些渠道解释“双提案”只是“策略性考虑”，是要迎合岛内民意，提升党的政治支持度。也就是说，要通过此举，能够得到更多选民支持，拉到更多选票。

国民党急着扩大支持者群体，想法正常，可以理解。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蔡英文大赢，6月韩国瑜的高雄市市长职务被罢免，8月高雄市市长补选李眉蓁败选，一连串失败压得国民党透不过气来。国民党在保住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552万票的基本队伍基础上，开始把思路定在“争取中间选民支持”上，重点是提升党的民意支持度，具体策略和政策之一，则是通过“两岸政策新论述”，通过对于参与两岸交流的自我设限，迎合岛内现阶段存在的“拒统”民意，调整对“九二共识”的坚持，调整对共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坚持。“双提案”则是配合“两岸政策新论述”的重要招数。问题是如此做能有效果吗?

一方面“中间选民”和社会上对国民党的不满，当然有一部分是不赞成国民党以往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和做法，但更多的是看不惯国民党落伍、僵化、内哄等“宫廷内斗、老人政治、酱缸文化”，这些严重影响和败坏国民党的社会观感。因此，国民党冀望通过“双提案”“两岸政策新论述”提升支持度，应该说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有些药不对症，甚至也会让基本支持者不满意。

另一方面即使如其所说，能够暂时得到一些“中间选民”的“呼应”，问题是受制于美国自身利益所限，性格怪异的特朗普喜欢“极限施压”，也只能在交流形式和策略层级，做些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的把戏，不可能在中美关系上打破“一中格局”和自毁政治基础，理性稳重的拜登接任总统后也不会否定一个中国政策。所以“双提案”不仅没有可行性，而且让两岸关系更加严峻复杂，届时不仅这些“中间选民”会嘲笑，蓝营基本盘也会再次“选择性休眠”。作为拙劣的政治算计，结果是“短多长空”，得不偿失。

三、需要放弃“双提案”的幻觉

“双提案”到底是不是国民党推进复兴和提升社会观感的策略或手段，要从国民党的现有优势出发。在岛内国民党、民进党中，无论是内部事务，还是对外事务，无论是施政方针，还是行政手段，无论是管理人才，还是执政经验，要有重大、突出优势已经不可能，因为借鉴也好，剽窃也好，任何一方有任何一点新意创意的概念、提法、主张和政策，都会被对方照搬照抄，但是有一点有很大不同，那就是两岸政策。无论是两岸关系的演变过

程，还是岛内政治现实，都说明这一点，只要国民党坚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进党是不愿学也学不好。问题是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新论述”在“九二共识”问题上的偏向，特别是“双提案”此类的政治事件，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不小，也有损国民党形象。“双提案”和“两岸政策新论述”，基本没有推翻两岸交流基调，但表明国民党处理两岸事务的思维、立场、态度等已出现变化，对两岸关系将造成负面影响。

一是“本土化”中“独台倾向”继续增加。国民党“本土化”开始于蒋经国，从其任行政部门负责人起全面推进的“催台青”“本土化”，实质是加速国民党当局撤到台湾后一直缓慢进行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台湾化”和“中国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在地化”。蒋经国病故后，“本土化”从李登辉开始，加入分裂祖国的因素，成为“实质台独”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同时党内也有一些实力派一直没有停止此类活动。受党内传统政治包袱影响有限的江启臣出任党主席以来，为推进党内组织改造和理念创新作过不少努力，当然也出现一些异于国民党传统思维方式、战略策略、政治主张的做法和提法，岛内一些媒体认为国民党的“本土化”在加剧，其中的“独台倾向”在增加。党内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双提案”出现的背后，意味着“本土化”在党内的市场在扩大，组织上排挤党内“非本土化”势力、论述上向民进党靠拢等情况会加剧。

二是国共两党交流受到严重干扰。国共两党交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主流，是两岸交流交往的主体，是经济和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领导人成功会面更是国共两党交流带来的历史性成就。国共两党交流之所以实现，是因为国民党接受“九二共识”。如今，国民党“以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延续两岸互动，并以此寻求互动方式与时俱进”，在“九二共识”前加上“宪制性”的限定，一方面是不符合“九二共识”达成时的初衷和事实，一方面如此“新论述”是用强调“中华民国”来激化两岸政治对立，也是在岛内党内有关“九二共识”的讨论中误导岛内舆情，当然也直接影响到国共交流的政治基础。岛内有媒体认为，“双提案”直接宣扬“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得不怀疑国民党对于“九二共识”的诚意。国民党走出“双提案”这一步，严重冲击2004年4月以来形成的国共两党交流模式和地位，国共论坛和两党定期协商合作机制效用减弱。

三是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从两岸关系演变过程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曾经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已经成为历史潮流，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向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是“九二共识”，近一段时间来，国民党对于“九二共识”的坚持不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全面推进的那几年，理念上的“两岸政策新论述”、行动上的国共论坛等两党重大交流项目中断搁置、政治上“双提案”出台等在坚持“九二共识”上出现的偏差，打破两岸间基于“九二共识”的合作默契，削弱了政治互信基础，也使得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积极推动者和主导者的国民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蔡英文当局否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受到严重干扰情况下，本来应该是国民党大显身手的时候，应该是国民党为民族为两岸为台湾建功立业的时候，国民党却自废武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影响力被压缩。

四是影响两岸交流与融合发展。国民党作为两岸交流的参与者和主导者，长期以来在两岸融合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为摆脱被泛绿阵营扣上的“亲中卖台”标签，一再要求“两岸对等、尊严交流”，提出要“自我设限”，更是出现党内一些重要人物拒绝参加海峡论坛等两岸多年沿续而来的盛会等不该发生的事。在全面推进两岸交流、经济和社会融合过程中，国民党声音不高努力不够，又出现“双提案”直接伤害两岸关系的政治事件，将对两岸交流形成新的干扰。党内有识之士认为，国民党要明确方向和

解决政治对立台海才能持久和平

■ 台湾 纪欣

蔡英文“双十讲话”在岛内普遍被视为“调子放软”“有降温目的”，不少学者更解读蔡英文“对大陆释放出最大的善意”“有决心踏出稳健一步”“要以谈判代替对抗”。其中，赵春山甚至建议，大陆应该用“新思维认真体会蔡英文的弦外之音”。

蔡英文是否及为何“释出善意”

且不论蔡英文仍企图把“两岸关系国际化”、强调印太围堵战略，毕竟承认了“面对对岸机舰骚扰，台海情势比较紧张”，也说了“会坚守不畏战，不求战的原则，避免擦枪走火”，这透露出，她担心台海兵凶战危，也清楚一旦开打，台湾根本无法靠“价值同盟”伙伴，或“外购武器装备”能应付得了。

另外，根据岛内民调，94%受访民众希望两岸和平相处，超过80%民众赞成两岸要交流，赞成对抗的只有2.6%。这显示台湾没有人不害怕台海发生战事，也心知肚明统一无可回避，至于是否以和平方式统一，则决之于台湾的选择。一心想永远执政的民进党，不可能长期违背民意。

其实，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9月底就公开表态“不寻求台美建交”，连之后中国国民党在立法机构提案要求当局促成“美台复交”，当局发言人都立即响应说目

终极目标在哪里？梳理清楚两岸之间的关系，在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方面先下“操作型定义”，拿出具体作为帮台商、台生、陆配排忧解难，处理能够说到做到的部分，才能一点一滴争取台湾人民的认可与认同。也就是说，国民党没有为两岸经济和社会融合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是削弱岛内反“独”促统力量。长期以来，国民党是岛内反对“台独”的第一道防火墙。如今，一方面国民党短期内难以完全根除病灶，党内“正统蓝”与“本土派”矛盾分歧不易化解，长期累积的体制僵化、理念不清、高层内斗、脱离民意、人才断层等结构性问题根深蒂固，地方派系、基层桩脚、农渔组织、军公教票仓等严重萎缩涣散。再加上民进党将继续追讨党产，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清算，亲民党、民众党等第三势力也将加紧蚕食国民党支持者，国民党复兴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另一方面“两岸政策新论述”和“双提案”等导致国民党在岛内主导两岸交流中的优势弱化，下次选举时部分传统泛蓝支持者又会像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那样“政治休眠”，用选票教训国民党，不参加投票，客观上助长民进党“一党独大”局面，进而造成国民党制约民进党“台独”分裂活动的能力下降。

显然，“双提案”不是国民党推进复兴和提升社会观感的策略或手段。蔡英文当局和特朗普拱起的、损害一个中国政策的台美关系，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低潮。“双提案”重回40余年前的老路也好，留恋“蔡英文当局式的台美关系”也好，都是不现实的。说一千道一万，从岛内情况看，经济健康发展能否长期化，社会能否确立安全感，普通民众能否有正常心，都需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方面国民党有过成功的实践和经验，也因之有过在岛内选举中的重大胜利。如今何乐而不为？

前并无此打算。台湾驻日代表邱义仁更在美国人面前说，“台湾不会搞‘台独’，除非疯了”。这些都说明，尽管美国频频售台高尖端武器，协助台湾建立有威慑力的防备力量，却不见得愿意过度挑衅中国大陆，以免引发美中军事冲突。基于此，可以合理推测，蔡英文的讲话是配合美国，缓解台海情势，也避免自己成为陈水扁之后的第二个“麻烦制造者”。

这也同时显示，美国作为大打“台湾牌”的发牌者，可以随时依据自己的需求收放自如。台湾作为棋子则只能配合演出，如太入戏或过分冒进，坏了大事，就等着从棋子变成弃子。

民进党当局的挑衅造成两岸对立

蔡英文讲话中说愿意“以谈判代替对抗”，但除了未提“九二共识”这个重启谈判的政治基础外，还把“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作为开启对话的前提。这种推卸责任的态度，何有善意可言？又岂符合事实？

今年以来，当局借反渗透之名，刻意阻挠两岸交流合作，限制两岸经贸合作，甚至试图制造两岸“脱钩”，直接损害了台湾民众和企业的福祉和利益。民进党民意代表王定宇提案修改“国安法”，打算进一步大力整肃异己。游锡堃更说启动“修宪”是要让“国家正常化”。为讨好美国、日本，自动放弃声张南海与钓鱼岛主权，频频向美国购买具有攻击性的武器，以武谋独。这一桩桩践踏大陆底线的行径，才是造成两岸对立的祸源，大陆又怎么能片面“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

承认“九二共识”才能开启对话

“平等协商，共议统一”始终是大陆的对台方针，数十年未变。尤其，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又再次说，“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过，若开启政治对话的前提是要舍弃“一中”，则是万万不可能。台湾领导人或许不在乎“违宪”“违法”，大陆则没有任何人敢为了急于求成，放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蔡英文及其智囊若认识到这一点，理当坦然接受既能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又承认两岸之间存在政治分歧的“九二共识”。近年来，台湾一些人围绕“九二共识”内涵争执不休，其实，不论是两岸的现行法规，或是1992年“两会”商谈的背景和内容，两岸双方当时确实达成了“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台湾当局应该诚实面对历史，审时度势，为台湾前途做出明智的选择。

“九二共识”四个字充满善意与包容，蔡英文既然说在策略上“会保持弹性、灵活应变”，在没有找到其他更合适的替代表述前，就应该好好运用这把两岸和平之钥，重启对话协商，让两岸关系立即获得改善，台海维持和平稳定。更可透过双方凝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达成蔡英文所谓“有意义的对话”。

除了对当局的动向应持续密切观察外，台湾内部以下几方面发展亦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岛内启动所谓“修宪”工程，后患无穷。在各政党民意代表已提出的若干项修正草案中，除“18岁公民权”“废除考监两院”案，也有删改增修条文前言“为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第四条“固有疆域”案，这些都将直接触犯《反分裂国家法》，后果不堪设想。不过，“降低修宪门坎”案也不可小觑，因为一旦“修宪”门坎从现行民意代表四分之三通过，降至三分之二，或甚至降为一半，再把公民复决门坎改成公民总额半数以上投票，相对多数即可通过，那民进党之后就可一党“修宪”，或把“修宪”当作筹码伺机而动，成为两岸关系一颗不定时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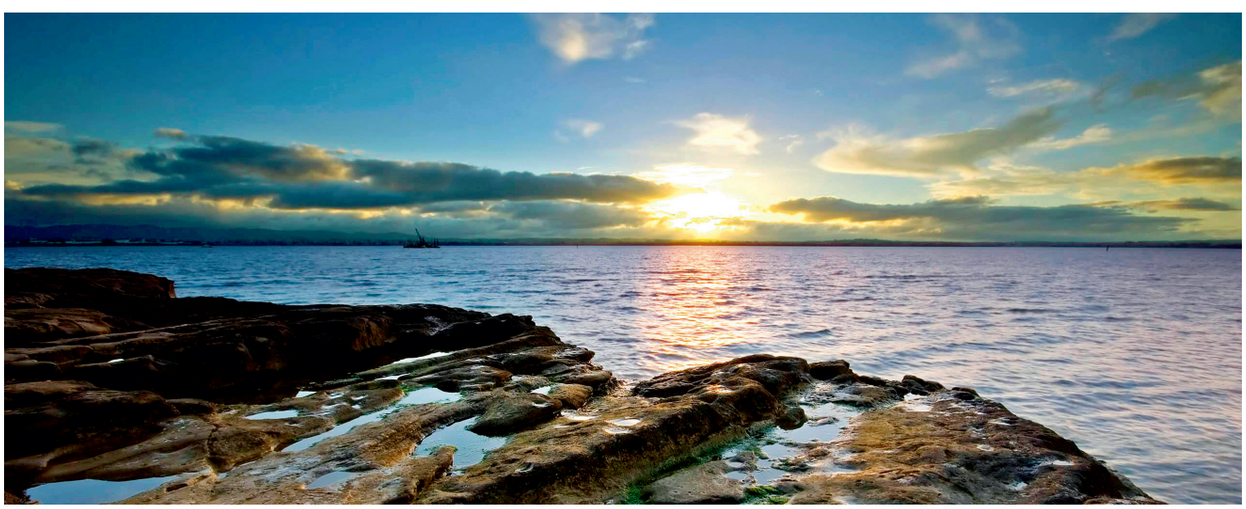
其次，在野的中国国民党难以制衡民进党。国民党在两岸政策论述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历史传承，淡化“一中”，幻想“和陆亲美”，日前又在立法机构提出“请求美国协防台湾”及“美台复交”两项公决案，令人扼腕。其实，国民党今年初在检讨败选时，就开始考虑要放弃或搁置“九二共识”，前主席朱立伦更频频放话“国民党要尽快撕掉所

谓‘亲中卖台’的恶意标签”。6月19日，国民党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宣达两岸论述十个要点，包括：肯定“九二共识”历史贡献；拒绝“一国两制”；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两岸共识；推动两岸人权协议；订立军事防止意外机制；盼能打破僵局，走出统“独”之外的第三条路等。被在现场的国民党中常委批为“小绿”，也立即遭到两岸学者逐条痛批，“台湾从此无蓝绿”“国民党成了民进党的附随组织”。国台办更表示，国民党丢弃长期坚持的理念，不仅会损害互信基础，而且会对两党及两岸交流合作造成障碍。面对党内外的反弹，国民党在9月6日召开的全代会上，并未完全放弃“九二共识”，而强调要延续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国民党一方面反对美猪进口，另一方面却不敢反对军购案，其立法机构党团更漠视蓝营学者的“基于‘宪法’的稳定性，不宜草率、贸然‘修宪’”建议，赞成“修宪”，令人匪夷所思。更令人忧心的是，少了最大在野党的制衡，贪腐、堕落已失控的民进党，将把台湾引向何方？

再者，台湾民间社会改革力量大不如前。从最近几起社会事件可知，一向标榜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民间改革运动已荡然无存。一是蔡英文宣布进口含瘦肉精的美猪，引起社会一片哗然，但比较马英九执政时期进口美牛，曾遭到上百个民间团体强烈抵制，现在却只有消基会、主妇联盟两个团体出面指责“民进党不该牺牲民众健康权益来换取政治利益”。二是蔡英文前发言人丑闻被踢爆，引发全民讨伐，但民进党妇女部、自称“女权斗士”的范云、赖品妤等绿营女民意代表，以及妇运团体却始终保持沉默，遭网民大骂“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三是劳保年改传出劳退月领金额可能大砍三成，台湾900万劳工无不担心受怕，却没有劳团出面抗议。这不是因为所有劳工都被蔡英文的“劳工是心里最软的一块”骗了，而是工运分子大多已被民进党收编，无心带领劳工走上街头抗争了。以上三例说明，台湾在党外时代突起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已因蓝绿对立、统“独”矛盾“颜色化”了，他们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蓬勃发展，到了民进党执政就自动噤口不言。这绝非台湾人民之福。

综上可知，两岸关系若不快速改善，台海问题若不获得彻底解决，台湾就算过得了今天，也过不了明天。这是台湾人民要的吗？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责任，确实必须由两岸共同承担。为了解除台湾人民空前的焦虑不安，为了及早找到两岸“和平相处之道、共存之方”，蔡英文应当“本于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态度”，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言行，创造“促成两岸的和解及和平对话”的有利条件。

（作者为统一联盟党主席、《观察》杂志发行人）



让社区服务成为两岸交流重要角色

——从社区防疫服务说起

■ 台湾 王裕庆

笔者是两岸关系良好的受益者。笔者发现大陆的社区布局与台湾的发展方式有相同性，例如，最基层的居委会就如同台湾的社区委员会或里长办公室一样，落实好对基层老百姓的生活照顾。不论是居民平时各种生老病死的服务，还是疫情期间的防疫工作，最基层的社区服务与居民息息相关。随着两岸交流的频繁，两岸同胞渴望建立一个共同家园的意愿也在增加。正因如此，两岸同胞就应开始探讨两岸深入融合发展的下一阶段，如何完善社区服务，让社区之间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下一阶段的重要角色，让最基层的社区成为两岸同胞相亲相爱的共同家园。因此，笔者觉得，作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并且也是南来北往交流的最基础平台，社区也是欢迎台湾同胞到大陆最亲的家人。其服务的增加与落实对两岸同胞融合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当然，社区的功能也会随着未来两岸同胞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增加其服务项目。正如今年疫情期间，笔者在大陆一直没有回台湾，亲眼看到大陆对台胞在疫情期间的照顾，同时发现从学校到居委会都发挥很大的作用。例如，疫情期间，居民小区果断采取封闭式管理，并且在小区大门给出入人员做体温测量，实行“一户一人两天”即每户每两天可以一人出外采购的政策。物业每天在微信群与居民联系报告情况，甚至居委会还派宣传车（在台湾俗称小蜜蜂）在社区里巡回宣导防疫方式与需要知道的事项。笔者居住的河北大厂，疫情期间的物价也很稳定，完全没有台湾一些媒体抹黑大陆的那样夸张报道。所以，笔者在疫情期间完全没有感受任何恐惧与害怕，更相信大陆不论是对疫情的管控与对台胞在疫情期间的照顾，都很成熟与稳定。

学校的社区服务功能在疫情期间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例如，学工办与导师过一段时间就会联系笔者了解在学校的情况。导师时时刻刻关心笔者的学业，甚至还很贴心地询问笔者在大陆疫情期间的情况。笔者是大陆女婿，还有更多来自妻子和大陆家人的关怀。部分台胞参加了社区防疫工作，帮忙量体温，或是对出入车辆排查。笔者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沟通两岸澄清谣言的责任，不论是在自媒体或在《环球时报》发文，都如实地把大陆疫情情况说清楚而不误导台湾岛内民众，让他们了解大陆防疫与大陆社区服务的防疫努力。同样的，笔者在台湾的朋友和亲人说，岛内疫情期间的社区工作也做得不错，尤其是对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他们也很满意。例如，对待回台湾隔离的人员，每天按时送饭，送生活用品，并且还常常打电话对他们嘘寒问暖，不时登门查体温，让大家在岛内没有感受到疫情的恐慌。疫情期间，笔者深深感受到，社区服务的完善与落实的确不仅对大陆老百姓很重要，对两岸关系与未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有更大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尤其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参与在社区工作上，将会带给两岸关系新的心灵契合链接点。

蔡英文在岛内连任，在两岸关系上仍然坚持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并且在疫情期间企图“以疫谋独”，甚至还大肆利用公权力报复支持

认同祖国统一的人士，围堵“有组织有题目”的正规官方交流活动，导致未来可能出现岛内组织害怕民进党当局，不敢与大陆合作举办两岸交流活动。

鉴于这个问题，笔者建议：

首先，大陆可以完善以社区为最基层行政单位的两岸新交流。对于社区新交流模式，也可以“化官为民”的思路完善其社区服务内容。所谓“化官为民”，“为”有两种字意，一个是为民服务，另外一个是民间牵头举办，政府监督的社区服务。换句话说，有些交流活动可以交给民间来举办，政府负责技术指导与监督品质。欢迎台湾各界人士参与各种大陆民间社区中心举办的“融合居民课程”“青年领导营”或是“创业就业辅导班”，让想到大陆看看或是想到大陆居住工作就学的台湾同胞，不分年龄都可以参加。欢迎台企依据大陆《公益法》，参与赞助各种两岸交流活动，以减税方式鼓励他们多支持台青就业与就学的奖励金政策，与开放更多就业机会回馈两岸（不分大陆或台湾）乡里。这样就可以让两岸交流成果更贴近平民百姓而落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且还可以成为衔接顶层两岸交流与民间交流需要的枢纽。台湾方面，笔者建议台湾的社区委员会与乡里委员会，也可以与大陆民间社区中心合作，建立合作热线与连线，当台湾乡亲要去大陆前，可以协助乡亲联系大陆可以帮上忙的社区中心，让台湾乡亲到大陆前不再茫然害怕。这当然也包括未来两岸在社区健康方面的合作。例如，未来可以欢迎台湾医疗团在社区中心与权威医疗机构帮忙和监督下，在大陆各地做义诊服务。甚至，可以落实两岸一家亲理念，协助台胞申请医保或申报台湾健保服务。所以，两岸下一阶段的交流，非浅层次交流，而是要进入乡亲互助，血浓于水一家亲的细致社区工作。

其次，大陆可以印发比较权威的“居民手册”。笔者在加拿大调研，发现加拿大对居民融合的政策非常重视，尤其是免费印发非常权威的居民手册。手册里，加拿大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导一个人如何解决第一天到加拿大遇到的问题，包括以后在加拿大可能遇到的工作、婚姻、生活等形形色色的资讯帮助。居民手册可以在网上下载，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免费申领寄送纸本。大陆也可以印制针对赴陆台胞的居民手册，让台胞不再担心遇到问题找不到联系电话或单位，还可以减少道听途说导致台胞被骗的情况。笔者非常支持让台胞依据居民手册，依靠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而社区中心只要发放手册网址小卡片就可以。当然，现在大陆很多社区中心已经印发了自己的居民手册，但内容仍然过于广告化和地方化，导致这些手册无法全国通用，甚至也让取得的台胞不会太珍惜而浪费纸张。因此，笔者建议大陆在印发居民手册时，联合有关单位一起编辑手册内容，并且鼓励台胞自己通过网络下载。台胞在大陆常常遇到一些问题需要权威部门协助与解答，找不到门路使其觉得很无助，建议大陆给台胞提供一个热线电话。笔者希望大陆未来能够政府与民间合作，发挥社区服务精神，官方做权威解答，社区中心做实体服务工作，让服务台胞的大陆网络能从点到面网状连接。

第三，未来的两岸交流应该多以“没有主轴与刻意目标，但有成果”的交流方式。所谓“没有主轴与刻意目标，但有成果”的交流方式，就是在一定时间里把交流活动办得多彩多姿，让民间社区中心的灵活性与创意性发挥出来，台胞也可以多样性参与，不局限在“同一个主轴与刻意目标”情况下完成心灵契合的细致交流，让台湾同胞心中深深感受大陆的诚意与爱心，渐渐爱上大陆，渐渐认同大陆，进而会常常到大陆，天天想大陆，最终就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要善用中国台湾网的“融融”商标，让更多社区中心两岸服务以“融融”商标为标志，张贴以示政府授权服务单位。也可以以“融融”大玩偶为标志，在各机场、港口、车站与地铁站设立专门位置，让台胞可以询问信息，依据授权服务中心取得进一步的相关资料。

当然也包括有“融融”标志授权的医院，协助台胞解决医保。

第四，可以根据“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以同等待遇培养台湾青年的“工匠精神”，因为台湾的产业并非仅是文创、电子业，而更多是机械行业中小企业。很多家境一般的基层台湾青年，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接受技能方面的教育，并且很多学习技能的台湾青年，家庭背景就是机械行业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很多就是台湾技术界的中坚力量。此外，在岛内也有许多著名的技能学校专门教授独门技术，但由于少子化现象的发展，导致这些学校出现招生困难。鉴于两岸技术人才融合需要，与壮大大陆技术人才需要的趋势，大陆可以制定台青的学徒规划与台湾技能学校到大陆设立分校的计划。这样不但可以为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技术行业创造机会，也能满足大陆缺乏精密技术人才的市场需要。甚至，还可以让台湾独门技术，不会因招生不足而出现失传，让这些独门技术得以在大陆延续，为祖国的科技增光添彩。要特别关注岛内高级研究机构或技术部门退休的技艺绝学人才，他们很多人不仅在工业上有高超技术，在艺术或文化技艺的传承上也有个人的深入研究和成果。因此，未来引进岛内重要技术人才，也可以以社区成人班招聘老师的方式牵头，安排岛内退休技艺绝学人才到对口技职学校教学，可以规避岛内政治的影响，让他们可以带着自己技艺绝学到大陆找到“第二春”，并期待他们能以授课收徒的方式，把这些促成岛内技术高速发展的技艺绝学在大陆传承下去。甚至，也可以准许他们在大陆收徒办课办学，让他们自成“一家”，而让大陆的工业发展与文化传承有新的力量。

第五，建议大陆善用5G网络社区力量，让台湾同胞深入了解大陆，尤其是深入了解大陆民主协商的方式与生活情况的交流。笔者参加了《人民政协报》“假如我是委员”网上活动，可以通过申请为“网上虚拟政协委员”参与建言献策提案。网友还可以透过“假如我是委员”平台，与政协委员直接沟通。很多人也因声音被政协委员听见，而让社会更和谐。正因如此，笔者非常支持这个活动，更希望“假如我是委员”活动能成为另外一种两岸交流的新方式。尤其是可以借由接纳更多来自台湾的“虚拟政协委员”为岛内民众提合情、合理与合法并且大陆能做到的提案，让台湾同胞可以感受到大陆民主协商的先进性，并且还可以成为一个新兴对台舆情参考的网络社区平台。因此，笔者希望平台也能参与对台交流工作，让台胞提早参与大陆的政治协商，进而可以让平台成为一个台胞参政议政的新试验平台。大陆因为疫情鼓励推广台青直播创业，尤其是直播带货或直播介绍大陆情况。笔者希望未来大陆支持的直播创业，不仅支持关注台湾同胞参与，而应多鼓励两岸主播在同一个平台里合作录节目，甚至更应支持愿意帮大陆说实话，帮两岸统一说话，或为两岸幸福说话的主播，帮他们安排平台，安排境外媒体传播机会，让他们好的直播节目传播到全世界各地，进而让他们都能在境内境外的媒体社区里得到很好的服务效果。甚至，也可以提供一些地方电视台的演播室与媒体资源，让优秀的两岸主播有充分的设备录制好的节目，让全世界都了解大陆对两岸关系和平与发展的用心，和坚定完成祖国统一的决心。直播都应采取“民间媒体公司牵头、政府支持监督”原则，让直播更活泼自然。在笔者看来，社区服务除了有实体的服务外，还应该有网络上社区虚拟服务。

总之，社区服务功能的增加，对两岸深入促进一家亲有很大帮助。不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如何，在未来的日子里社区中心的服务对细致的两岸交流来说会更加重要。所以，两岸未来融合发展与交流的心灵契合，都需要社区中心的扎实工作。而且“民间牵头、政府支持监督”的交流方式也会让更多台胞更深地爱上大陆，愿意与大陆亲近。

一次与母亲河亲密的相约

——“龙的传人·相约黄河”两岸媒体大美黄河行联合采访活动综述

■ 孙永鹭

9月22日至28日，由河南省台办主办的“龙的传人·相约黄河”两岸媒体大美黄河行联合采访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十余家媒体20名记者围绕“中华源·黄河魂”主题，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人民群众生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黄河文化保护传承等为主要内容，深入黄河流域郑州、洛阳、济源、焦作、新乡、开封等地集中采访报道，讲好黄河故事，展现多彩河南。



在原址上复原的二里头夏都遗址

探寻黄河遗址 传承黄河文化

大禹治水、禹划九州……这些深植于中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究竟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来到二里头遗址，或许就能一探究竟。二里头遗址被誉为最早的中国，是黄河流域的夏文化、河洛文化发源地，而台湾人又素以“河洛郎”自称。两岸记者在二里头遗址感受这座古老王都的神秘气息，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介绍“华夏第一龙”——绿松石龙形器，方得知“华夏子孙”龙的传人的由来。“中国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象征着华夏文明龙图腾的形成。

“谁非过客，花是主人”，这是新安县千唐志斋中书房所刻之字。千唐志斋及其所藏千余件唐代墓志铭均由中国国民党陆军上将、辛亥革命元老张钫先生创建和收藏，是中国唯一的墓志铭博物馆，也是海内外专家、学者等寻根觅宗的“千年秘籍”，以珍藏唐及历代墓志石刻1400余件而闻名于世。“我们曾两次带着藏品拓片去台湾进行文化交流。”千唐志斋博物馆馆长陈花容介绍说。

“没想到张钫故居这四个字是江丙坤先生题的，现在江丙坤先生已经故去了，这很有纪念意义，也很让人唏嘘”，台湾东森新闻云记者任以芳在看到张钫故居的匾额时感慨地说道。

作为一座黄河岸边的古老城市，开封历史上经历过数次水患。尽管常有洪水肆虐，但一代又一代中原儿女依然选择在此建城，且基本上都是在旧址上屡淹屡建，城市的坐标基本固定，城

址没有移动，中轴线不变，这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特有的宝贵实例，由此形成了“城摞城”遗迹现象。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当地探明了叠压在现马道之下的两层古马道遗址，形成了上、中、下三层垂直叠压的奇观。以前在文献中的所见，如今以实物的形式得到真实再现。

“以前我们都知道大陆有像北京、西安这样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但我现在觉得河南更厉害，比如开封，都是我们从小在书本上看到的地方，所以来了之后感觉心里很亲切，实际踏进这个地方还会觉得有些似曾相识。”来自东森电视台的杨钊表示，在他看来，黄河文化其实就是中华文化，而河南非常重视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尤其是硬件建设做得非常棒，已经能和国际接轨。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联合采访团专程来到位于郑州的黄河博物馆，在博物馆里看黄河。黄河贯穿着黄河博物馆基本陈列的主线，通过600余幅照片、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珍贵的文物标本、灯光图表、过水工程模型、录像和触摸屏等形式，展示和介绍了黄河的地理、地貌、气候等自然概况，灿烂的黄河文化，以及历代水患灾害、河患治理、水土保持、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开发的远景规划等内容。

来自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的特派记者李奕晴、罗筱媛在黄河三峡“追根溯源、万姓同根”大树下合影留念后，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姓氏”旗，在她们看来，“两岸同胞同根同源，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



黄河博物馆

一代代中华儿女励精图治 守护大河生态和安澜

“当年愚公移山处，大坝巍巍挽狂澜；曾经武王会盟处，滔滔大河起欢声。”这里的大坝就是指建筑于黄河之上、位于河南省济源市和孟津县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集防洪、防凌、减淤、灌溉等功能于一体。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营以来，黄河连续13年不断流，有效改善了小浪底库区和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为黄河中下游岁岁安澜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我知道黄河会溃堤、会淹水，但刚刚听讲解知道了小浪底建好后，既解决了下游淹水的问题，还能够有效、分段式地处理黄河河道内的淤泥，而且上游水土保持也做得很好，延长了大坝的使用寿命，这一系列的工程建设真是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和苦心。不得不说，大陆的治水工程实在太完善、太令人震撼了！”来自台湾东森新闻云的记者任以芳在走访小浪底后，忍不住为祖国大陆的水利工程建设点赞。“台湾也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水库，像是位于台湾桃园市大汉溪中游的石门水库，但它的作用就没有这么多，现在主要是作为观光景点。”同行的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特派记者李奕晴也说到。

有“万里黄河第一观”之称的嘉应观坐落在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上，是雍正皇帝为了纪念在武陟修坝堵口、祭祀河神、封赏治河功臣，仿北京故宫建造的一处

集宫、庙、衙署三体合一的淮黄诸河龙王庙，并封其“四渎称宗”。“既然是雍正皇帝下令修建的，那么雍正本人也来过这里吗？”在得知嘉应观是雍正皇帝下令所建，来自台湾的几位媒体朋友惊讶地问道。“雍正皇帝虽然没来过，但他还是皇子的时候，曾经来过这里治理黄河。”嘉应观负责人告诉大家，由于嘉应观供奉着自大禹以来华夏历代治河英雄，记录着治河方略和重大事件，是了解黄河文化、学习治河经验的博物馆，也是自清代以来国家治理黄河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它已经成为黄河流域现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科学、历史、艺术价值最高的黄河河神庙了。

历史上黄河在封丘境内多次决口，留下了大面积滩涂湿地。近年来，得益于黄河流域各地治理和生态保护，位于封丘县陈桥镇的陈桥湿地公园，在原有陈桥湿地的基础上，退耕还草、退耕还水，逐步打造成了以湿生植物为主题园区的湿地公园。陈桥湿地是豫北最大的鸟类自然保护区，在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是万千鸟儿的家乡。天空中鸟儿不时飞过，脚下的池塘里鱼儿游来游去，看到此情此景，台湾媒体记者纷纷感慨，“台湾的老百姓平时会觉得黄河很容易泛滥，但是为什么近年来黄河会这么平顺？其实就是因为黄河治理经历了数代人的努力已经有了成效”。

在乘船游览黄河三峡时，每个人都静静听讲解员介绍黄河三峡的神话传说，近距离感受黄河的美丽。“在这几天中，我们了解到了很多与黄河有关的文化故事，可以说黄河与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黄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当然，现在的黄河能够如此平稳、安澜、美丽，与长期以来的治理是分不开的。”



兰考县爱心美德公益超市

多管齐下 助力黄河流域脱贫攻坚

“搬迁把我们几辈人的穷根给拔了。来到新家以后，我们扎下了富根。”这是黄河滩区封丘县李庄镇迁建点的当地老人告诉两岸记者的话。走进迁建点一处小区，满地晾晒的玉米等粮食作物给来自台湾的媒体朋友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金蜀卿好奇地问道：“他们不是都搬出来了吗？为什么还要种地？怎么还有这么多粮食？”镇长介绍说，搬迁只是第一步，让老百姓留得住、过上好日子才是最终目的，“虽然当地农民的确搬过来了，但他们的庄稼还在。下一步，我们计划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把农民经营转变为合作社经营和规模化经营，让农民真正地过上好日子”。听完介绍，台湾媒体朋友不禁赞叹道：“这可真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工程！”

作为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兰考县实施的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联合采访团一行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穿过万亩泡桐林，来到了全国著名的乐器村——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一来到这里感觉就很不一样，之前见过的农村感觉每家都是堆满了玉米，但是这里好像家家都有琴。而且这里的路修得也很好，每家每户的房屋也都建得很有特色，看得出来大家收入

两岸青年互动与交流的助力与掣肘：以文化治理的观点

■ 能武

“治理”是一个相对松散且又模糊的概念，解释流派众多，有较为丰富的外延。“治理”的概念已被学者引入到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其核心是强调以协调、协商、沟通的方式，来达成政策目标。随着“治理”的社会功能不断凸显，“文化治理”也随之受到文化研究、政治学、公共管理等领域学者广泛关注。尽管学界对“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解、运用，甚至态度都大不相同，往往是“一个词汇，各自表述”，尚无基本共识，但仍可将“文化治理”视为“治理”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故此，“文化治理”可理解为“通过文化来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场域之调节与争议，以各类组织、程序、知识、技术、论述和作为运作机制而组构的体制或场域”。在两岸交往中，文化领域本就具备政治性低、互动性强与讨论度高的特点，以“文化治理”为路径审视当前的两岸青年互动与交流助力与掣肘，更有助于两岸青年间的融合发展。

一、网络文化助力两岸青年

应该都很不错。”来自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的记者边走边讲述自己的感受。

据介绍，徐场村共有105户，其中80多户都在制作民族乐器，并曾经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唯一指定的演奏乐器，形成中西部地区最大的民族乐器生产基地，一弦一曲继续改写着兰考人的命运。小小的乐器帮助村民实现了脱贫致富，建成了人人羡慕的小康村。

同样依靠产业脱贫的济源市下冶镇大岭村则通过电商扶贫的“网络+”模式，销售村里的艾草及相关制品，带领着村民走在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上。

除了发展特色产业，当地政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也想了不少好点子，爱心超市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兰考县惠安街道爱心美德公益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日常生活用品摆满了货架，但是所有的商品都没有价格，而是贴上了“1分”“10分”“50分”等特殊的“价签”，这些分数就是“爱心积分”。当地政府以这种方式鼓励村民在脱贫致富、好人好事、传统美德、人居环境等方面评比中获得“爱心积分”，兑换生活物品。小小超市撬动了大扶贫，保障了困难群众“吃穿不愁”。但是，爱心超市的意义绝不止于扶贫，也必将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实这种‘爱心积分’的模式也可以在台湾的普通社区里推广一下，经常会看到很多老人没什么事情做，用积分换购的方式可以鼓励老人们多活动，还能兑换各种商品，他们肯定也特别开心吧。”在参观爱心超市后，台湾媒体的记者们相互探讨着……

在5天的采访时间里，两岸记者边走边看、边听边想，聚焦黄河文化保护传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沿黄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注重讲述“黄河故事”，展现出彩河南。共刊发各类稿件近80篇，被不同的平台和媒体转发超过百余万次，进一步宣传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

互动与交流

当下的两岸青年人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两岸青年间的交流与对话，从未离开互联网的影响，而且互联网对两岸青年人的影响也只会更为深刻。

互联网创造了两岸青年间共同的节目记忆。198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媒体数量暴增，至今成为全球媒体覆盖率最高地区之一。媒体数量暴增加剧了电视行业的竞争，节目制作水平进而提升，出现了一些两岸都很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互联网的兴起也改变了祖国大陆观众收看台湾电视节目的方式，由通过祖国大陆电视台购买台湾电视节目播放，变为直接根据个体喜好通过互联网点阅台湾地区制作的电视节目。一些台湾制作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颇受两岸青年欢迎，制造了许多青年一代的共同记忆。近年来，祖国大陆电视节目和电视剧制作水平迅速提升，反观台湾电视节目却长时期处于恶性竞争状态。祖国大陆越来越多电视节目被台湾青年所喜爱，也成为在台湾的青年朋友们日常讨论的话题，出现了台湾青年观看过一些真人秀节目后改变了对祖国大陆的认识。

两岸青年日常生活均深受互联网营销的影响。以“双11”购物节为例。从2009年开始，电商龙头“淘宝”将11月11日宣传为“狂欢购物节”，随后其他电商也纷纷加入，“光棍节”逐渐演变成网络购物节。今年仅天猫“双11”销售额就高达4982亿元。近年来，台湾地区受欢迎的电商平台“PChome”“Yahoo 商城”“博客来”“虾皮”等，也参与进“双11”的营销风潮中。因为网络购物相对便宜且选择多，成为两岸青年所喜欢的购物方式。准确地说，网络购物的兴起与普及为两岸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形塑了一种相似的生活文化。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App 也成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互动场域，可以建立起一些话题讨论。如，近年来在两岸流行的一款名为“抖音”(TikTok) 的音乐短视频社区 App。在台湾地区，抖音可以说是中小学生近几年最热门的话题，还举办了拍摄“抖音”的比赛。回归到分析层面，两岸青年之间也早已把“使用抖音”当作社交日常，每天乐此不疲地花1到2小时刷抖音，通过录视频分享给朋友及其他网友。“抖音 App”透过社群平台的形式将用户的视频快速扩散，并让其他用户留言、点爱心表达对视频的喜爱，快速满足年轻人“想被认同、肯定”的心态。

除此之外，还有网络外卖送餐、网络游戏等都是融入当下两岸年轻人日常生活的网络元素。互联网的发展确实为两岸青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议题与场域，对两岸青年融合发展是有巨大促进的。互联网科技的日新月异，为两岸青年的交流与对话带来了非常正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当下的全球社会处于一个由互联网高速发展带来的“全网”时代。人们已经不自觉地处于这样一个“全网”时代，身处海峡两岸的青年也不例外。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资讯传播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全网”时代让资讯更聚焦，点到点传播效率更高，加之社交软件不断推陈出新，让受众对其所接收到资讯的反应更迅速。传播效率更高并不代表所传播信息真实性越高，甚至传播效率的提升会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人为操作。因互联网发展而形成的网络文化对两岸青年的交流与对话是利远大于弊的。

二、减少掣肘：惯性思维影响的两岸青年互动与交流

习惯性思维模式充斥日常生活各个角落。惯性思维会在做出决策前就形成思维上的预判和认定，这样当然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决策。执行效果良好的决策只有建立在真正的了解和认知基础之上。由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分离状态，相互隔阂在所难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这样的寒冰当然需要时间和耐心，均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知基础之上。

在两岸青年交流领域，也存在一定的“惯性思维”。比如，中南部台湾青年非常抵触“两岸交流”，不愿意看到两岸交流，更不愿意主动投身两岸青年交流，等等。但凡提及两岸青年交流，

惯性思维使然会很容易对“台湾青年”形成思维定式，认为他们因为年龄与成长的时代背景，所以相似。其实，在开展与台湾青年的交流与对话时，并没有很好地区分“北台湾”与“中南部台湾”概念。为了继续开展更为有效的两岸青年交流与对话，必须突破思维定式，在“共性”中找到“个性”。

1980年代之后，北台湾在经济上成功发展并与全球生产网络接轨。加之，政府推出的“贴补促发展”政策倾向，加速形成了台湾岛内区域不均衡现象。由于地形所限，台湾的产业空间主要分布于西部平原。而近20年来北部区域产业聚集的情形更为突出。北部区域随着政府补贴政策大量投入资源，挹注高科技产业，并强化其金融中心与服务业优势，而吸引了中产阶级进驻。南台湾传统农业与加工制造业长期以来支援北台湾生产性服务、研发，并理所当然地用以支援高科技产业发展；更由于高科技产业产值高，被执政者视为政治资本，进而开启并深化了区域发展不均衡及空间分工失衡下所形成的区域分殊。

长此以往，北台湾集中台湾地区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等，社会资源不均衡当然会影响岛内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而会影响对政治的态度。美国学者Ronald Inglehart所提出的“价值变迁理论”(Theory of Value Change)，即在长期研究欧美等先进工业化社会在经济发展之下，民众的基本价值将会由原先重视物质需求(生理、安全)转而重视非物质需求(环境保育、自我实现)；亦由“物质主义价值”(Materialism Value)变成“后物质主义价值”(Post-materialism Value)。换言之，一个社会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会影响其区域政治认同的差异。也即是说，较为落后经济发展区域，都属于“物质主义”的政治文化，其政治态度都以“经济安全”为重。

体现在两岸议题上，南北台湾存在的差异巨大。北部更关心“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例如，“九二共识”。在南部根本不在乎，南部在乎的是对生活有帮助的东西，这是“低阶政治”(Low Politics)。就像虱目鱼卖祖国大陆只是为了改善生活。在两岸青年交流领域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在台湾，年轻人喜欢称台北市为“天龙国”，天龙国以外的人认为“天龙国国民”享受着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生活期待。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部分北部台青普遍更看重自身的发展，更看重以后的人生规划，而中南部青年更希望解决当下的工作与薪酬问题。在两岸青年交流领域，尽管目前各方对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支持力度不小，基本上是只需要个人支付交通费用，其余全程赞助，但似乎缺少了对一些台湾中南部想参与两岸交流但又无法参与学生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一些台湾中南部尤其是技职体系学校的学生而言，就连两岸交流的交通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值得注意的是，岛内别有用心的政客为达到政治目的，在中小学课纲上推行“去中国化”，在日常生活中“逢中必反”，使得一些台湾青年学子无法形成全面的历史观，进而造就了所谓的“天然独”。尤其是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创党的“时代力量”，更将“天然独”当成是政治营销的工具，快速地拉拢更多年轻人认同。

因互联网发展而带来的网络文化为两岸青年交流与对话提供了议题与场域，而所谓的“惯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在两岸青年交流领域对两岸青年良好交流与对话形成一定掣肘。而“两岸青年交流与对话”不能仅仅是通过一些活动增进情谊，更应该上升到思维和文化层次的交流与对话。“文化治理”本质上是“治理”的价值导向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先要有形成文化治理的场域，在场域之中要有议题讨论，才可促进两岸青年的对话与交流。当然，在推动进行两岸青年对话与交流过程中，必须突破惯性思维，在更深的维度进行两岸青年交流与对话。唯有如此，才会让两岸青年交流与对话变得更有意义，才会更大程度上助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

2020 年 10—11 月
海峡两岸大事记

10 月

1 日，100 多幅由海峡两岸艺术家创作、以“长江三峡”为主题的书画作品与台北的艺术爱好者见面

1 日，展现两岸大学生心灵触动和创作才华的“云南茶马古道纪实摄影展”亮相台北华山文创园区

2 日，“同沐闽南风 · 共系两岸情”2020 年海峡两岸闽南文化研学体验营在福建厦门（集美）闽台研学总部开营

7 日，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公布，9 月对大陆（含香港）出口额 142 亿美元，创历年单月第二高，比去年同期增加 22.3%，占台湾总出口额 46.24%，大陆（含香港）持续位列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

10 日，皖台创富交流营活动在安徽合肥举行，台湾淡江大学华东校友会 36 名台商参加一系列考察活动

11 日，依托福建福州马尾区成立的“青年筑梦平台”正式启动，面向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群体

12 日，作为 2020 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第一场下乡演出剧目，由两岸合作排演的福建歌仔戏（芗剧）《陈三五娘》上演

13 日，以“携手共筑美好家园”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

14 日，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经向有关部门了解，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开展“迅雷 -2020”专项行动，依法打击民进党当局及其间谍情报机关针对大陆的情报渗透破坏活动。近一个时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加紧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频频制造事端，大搞“台独”分裂活动，严重危害两岸和平和台海局势稳定，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台湾有关方面应当顺应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不要做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

15 日，两岸出版高峰论坛暨第二十五届华文出版年会在福建厦门举办

16 日，以“新时代 · 新成长 · 新发展”为主题的 2020 两岸青年交流合作北京峰会在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

17 日，以“给明天的礼物”为主题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

18 日，台湾光复 75 周年前夕，海峡两岸历史学者、相关研究专家、亲历者及其家属在台北和江苏南京举办网络视频连线座谈会

回顾两岸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纪念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呼吁两岸人民铭记共同的血泪记忆，共护和平谋未来。

18 日，70 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相聚四川成都，以历史图片展和艺术作品联展的方式纪念抗战胜利、台湾光复 75 周年

20 日，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9 月台湾企业外销大陆（含香港）订单 143.6 亿美元，比上月增长 11.4%，比去年同期增长 31%

20 日，以“打造两岸产业链、共创发展新局面”为主题的第二十三届京台科技论坛在北京、台北同步开幕

21 日，以“携手创新 · 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二届“重庆 · 台湾周”在重庆开幕

600 余名海峡两岸嘉宾通过线上或线下参会的方式，共同探讨两岸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包括 4 个板块和 13 个分项活动，涉及经贸交流、文化体育学术交流、基层交流等系列活动。

22 日，纪念台湾光复 75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历史、鉴往知来，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激励两岸同胞团结一致，共担民族大义，共促祖国统一，共圆民族复兴伟大梦想。两岸各界与会代表发言时表示，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重

要成果，彰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两岸同胞要铭记共御外侮的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携手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光明前景。

22 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售台武器答记者问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对台军售计划

22 日，针对有消息称美国已经批准一份总价值 18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22 日，针对美国政府刚刚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约 18 亿美元的武器计划，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我们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 · 一七”公报规定，停止一切对台售武

22—25 日，用镜头捕捉武汉的城市风景，向身在台湾的亲戚朋友讲述这里的“英雄故事”，22 名在祖国大陆多个城市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在武汉走访拍摄大街小巷、工厂、公园和社区，记录传递武汉的新气象与勃勃生机

23 日，“情系三江源 · 大美青海情——两岸文化和旅游联谊行”云直播系列活动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北京、青海、台湾举行

24 日，一年一度的“50 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慰灵大会”在台北举行

秋祭活动以“反对‘台独’挑起战祸，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为主题。来自全台各地的白色恐怖受难人及其家属和各界代表共 200 多人参加，缅怀上世纪 50 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为追求两岸统一、民族复兴而牺牲的进步人士，并呼吁反对“台独”，推进两岸和平统一。

25 日，“金瓯无缺——纪念台湾光复七十五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刘结一、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台盟中央副主席杨健、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等两岸各界人士 100 多人出席开幕式。

25 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 75 周年，“绿水青山待我还——台湾同胞抗日遗址遗迹摄影展”线上展览开通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8 日，以“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在浙江宁波开幕

28 日，台盟中央、台盟广东省委会、台盟北京市委会、北京市台联联合主办的“唱响统一——海峡两岸青年歌会”在北京举办

28 日，全国台联、闽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台商发展论坛在陕西铜川开幕

29 日，2020 海峡两岸婆媳文化节开幕式暨“家风 · 家训 · 家教”主题论坛在浙江宁波奉化区举办

31 日，福建尤溪县朱子文化园内举办朱子祭祀大典，庆贺朱熹诞辰 890 周年，来自两岸的学者、朱子后裔等 300 余人参加祭拜

31 日，以“情深似海，义重如山”为主题的第九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在浙江台州开幕

11 月

1 日，福州台湾会馆复建揭牌

福州台湾会馆前身是清末专供台湾士子赴榕参加科举考试的栖息之所，未来将打造成两岸交流新平台。台湾会馆分为历史主题展区、当代专题展区、交流活动区、配套功能区等四个区域，具有展示收藏、联谊联络、合作互动、学习交流和学术研究等多种功能。

1 日，大陈岛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授牌仪式在浙江台州举行

6 日，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 5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出席座谈会。

6—9 日，第十六届海峡两岸（三明）林业博览会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三明举行

活动以“深化海峡两岸合作，做实绿色三明文章”为主题，旨在通过展销两岸绿色生态森林食品等，促进海峡两岸林业交流融合。

9 日，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公布，10 月对大陆（含香港）出口额 141.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占台湾总出口额 44.0%，大陆（含香港）持续

位列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地

9日，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主办的2020台湾“美丽中华”线上推广活动在台北启动

9日，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续会以视频方式召开，续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分别通过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续会议程

11日，2020两岸企业家峰会（紫金山）创新发展研讨会开幕，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江苏南京和台北分别设立主会场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江苏省金融业联合会，联合江苏19家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共同发起成立苏台企业合作联盟，进一步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激活企业内生发展动力。

11日，以“慈行天下、和乐人间”为主题的2020雪窦山弥勒文化节在浙江宁波奉化区雪窦寺开幕，中华弥勒台湾之行等系列活动启动

13日，在湖北武汉召开的“台企台商荆楚行 共建两岸合作区”大会上，160多名台商企业家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13日，闽台交流合作剧目《12.3坪》在福建福州首演

这是福建人民艺术剧院第5度与台湾编剧纪蔚然携手合作。

15日，“第四十届旺旺·时报文学奖暨第一届金沙书院两岸散文奖”颁奖仪式在福建厦门海沧举行

15日，2020海峡两岸汉字节暨两岸年度汉字评选在福建厦门启动

15日，以“匠心演绎·创意东方”为主题的第四届黄公望两岸文创设计大赛正式启动，启动仪式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江苏常熟、台湾分别设立会场

16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闽南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三届“两岸一家亲”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梅州举行

16日，以“缘聚武夷、茶和天下”为主题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在福建武夷山开幕

18日，为简化在港澳台学习人员办事程序，便利在港澳台学习人员在内地（大陆）工作和生活，教育部决定取消《大陆居民在台湾地区学习证明》

18日，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在福建福州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揭牌成立

18日，“第十二届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人大赛台湾赛区决赛”在台北举行

20日，第五届两岸青年和平发展论坛暨两岸青年创新大联盟2020年年会在北京举行

20日，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发布统计显示，10月，“投审会”核准赴大陆投资35件，较上年同期减少31.0%；核准投（增）资金额4.9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0%

21日，叶圣陶研究会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两岸学者共话·世界史”论坛在上海举行

22日，第四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在台北开幕

24日，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华文化论坛在北京大学开幕

24日，“守望相助 携手前行”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十周年纪念展览在福建三明永安开展

25—28日，以“相约冰雪 助力冬奥”为主题的第四届两岸媒体参访活动举行

26日，以“共享机遇·筑梦未来”为主题的川渝粤台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在四川成都开幕

27日，第十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开赛

首次开启“云端”辩论，主控场地设在福建福州，另外还设了台北赛场和祖国大陆高校赛场。

27日，汇聚两岸文坛中青年作家、文艺评论家的“2020上海—台北两岸文学营暨小说工作坊”在上海和台北以网络视频连线方式启动

29日，江西师范大学和台湾中华鬯庐书法学会共同主办的“并蒂花开——第二届赣台高校书画联展”开幕式以云视频形式在江西南昌、台北跨时空进行

（吴亚明）

台湾芯片产业现状与两岸合作前景展望

■ 钟厚涛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加剧，芯片正在成为双方较量的重要场域。“得芯片者得天下”，芯片作为现代工业核心组件，攸关整个产业链下游的人工智能、大数据、5G 通讯、云计算等“新经济”兴衰沉浮。美国为维持全球霸权，不断利用芯片对华为等中国大陆企业“断供绞杀”，并要求台湾的台积电等企业全面配合。未来两岸只有携起手来，强化产业链对接，才能有实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打破美国的无理要求和技术讹诈。

厚积薄发，台湾的“芯片之光”

相较于美日韩而言，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包括整个半导体产业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才设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给予一定扶持。台湾的可贵之处在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终于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历经40余年发展，台湾已成为全球芯片产业公认的行业引领者，建立了近乎无可撼动的地位。

从产业链上、中、下游来划分的话，芯片产业粗略可分为设计、制造、封装及测试四大过程。在这四个环节中，台湾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芯片产业链，而且每个环节都扮演“排头兵”角色。

芯片代工，全球遥遥领先。谈及台湾的芯片产业，首先想到的就是其龙头企业台积电。2017年，台积电市值超过英特尔，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企业。2018年，台积电位列《财富》500强排行榜第368位。2019年，台积电全球市场占有率近52%，是第二名三星的3倍多。

除了台积电，台湾的联电和力晶科技分别在全球排行榜上占据第三和第六的宝座。仅这三家台湾公司所生产的芯片，就占据了全球芯片代工市场的60% 以上，地位无人能及。

芯片设计，位居世界前列。2020年《麦克林报告》显示，2019年台湾芯片设计产值占世界17%，位居第四位。台湾的联发科是近年来成长最快的芯片设计公司。2019年11月，联发科领先高通，率先生产出5G“单芯片系统”，将原本数个功能不同的芯片，整合为一个具有完整功能的芯片，引发业界轰动。

封装与测试，引领时代潮流。台湾的日月光集团是全球最大封装与测试供应商，占有19% 的市场份额，为全球90% 以上的电子公司提供半导体封装和测试服务。日月光目前在中低端芯片领域满负荷运转，高端领域更是供不应求。除了日月光，台湾的京元电、华泰、南茂、颀邦、矽格、矽品等，也都迈入百亿新台币俱乐部，而且每年都保持正增长。

半导体设备销售激增。2019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销售总额598亿美元，较2018年同比下降7%，但台湾稳坐全球半导体新设备最大市场宝座，销售额逆势上扬，年增68%，高达171.2亿美元。

构建集群效应。台湾在芯片领域实力雄厚，目前力求更进一步，再上层楼，正规划从零组件制造，迈向整机和系统输出，提升岛内产业全球供应链韧性，全力发展人工智能 (AI)、5G、物联网产业，打造全球芯片研发中心。据不完全统计，台湾已累计吸引47家国际企业在台湾设立65个研发中心，平均一年约设立三个研发中心。

美国冷战霸权思维，
台湾被迫唯美是从

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科技封锁后，首先瞄准的虽是华为等中国大陆企业，但台积电等台湾芯片领

域企业同样受到重大冲击。例如，特朗普政府为落实“美国优先”政策，重塑美国产业链结构，近年来一直喊话台积电，要求其必须在美国设厂，并将技术一并带到美国。对于美国的施压，台积电始终犹豫不决，因为背后牵涉到是靠近客户还是靠近产业链，是规避风险还是降低成本的结构性矛盾。在美国设厂，或许有利于分散政治风险，但同时又面临被美国“在地绑架”的新难题。

对于美国的无理要求，台积电此前态度一直模棱两可，既没有明确答应，也未直接拒绝。台积电首席执行官(CEO)刘德音曾表示，台积电若选择在美国建厂，需满足“符合经济效应、成本有优势、人员及供应链要完备”三要件，而台积电“5纳米、3纳米芯片”的制造工艺将留在台湾。

但5月15日，台积电一改往日含糊不清的表态模式，正式对外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建立5纳米芯片代工厂。台积电表示，亚利桑那州的新厂规划月产能为2万片芯片，将创造超过1600个高科技专业工作机会，在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中间接创造上千个工作机会。

台积电在美国新工厂计划2021年开始设计，2024年投产，但能否如期进行，仍面临多重困境。

一是外部环境考验。随着中美博弈的持续加剧和美国两党政争的纷扰，整个国际环境因贸易纠纷及美国大选等政经因素而扑朔迷离，加上新冠疫情前景不明，台积电要想漂洋过海去美国投资建厂难度可想而知。

二是人力资源不足。台积电筹组工程技术团队，要求都在硕士学历以上，在美国要找到能够胜任且足够的人力，并非易事；而且东西方工作模式差异较大，很难实现每天24小时的轮班制。台积电在台湾芯片厂创立的庞大高学历人力轮班运作模式，要想同步复制迁移到美国恐需较长时日。

三是产业链不配套。台积电在美国建厂还不够，还需要有完整的供应链配合，但美国缺乏半导体中下游制造所需的集群效应，没有半导体下游封装、测试及组装产业链等。这意味着，如果短期不能形成配套，台积电制造出来的芯片需要再送往台湾或东南亚进行封测组装，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在无形当中将大幅提升。

事实上，由于上述类似原因，鸿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代工厂到现在靴子还未落地。台积电此前在华盛顿州的工厂也一直未能扩产，而且长期亏损经营。美国本土最大代工厂格芯(Global Foundries)Fishkill纽约厂近乎难以为继，就连英特尔都要去海外设厂来降低成本。这些都颇能说明在美国建立芯片厂的难度。

也正因如此，外界有人认为美国最厉害的是设计研发，很难成为科技产品制造王国。外界推测，台积电在美国建厂成本过高，不符合规模经济，而且大笔投资能否回报，即使回报也是周期过长，所以台积电不会“真心实意”在美国设厂，只是在“打假球”，最多也只是做个样板厂而已。

祖国大陆市场广阔，两岸产业优势互补

两岸芯片产业向来合作密切。在贸易方面，据台湾“贸易局”等统计，2020年上半年，台湾对祖国大陆(包括香港)出口占全部对外出口比重高达42.3%，其中6月对祖国大陆出口占比46.1%，创历史新高，也进一步折射了两岸经贸关系之密切。而在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的所有货物清单中，半导体设备及芯片等占比高达50.6%。换言之，台湾对陆货物出口，超过一半是电子产品，其中芯片占据“半壁江山”。

在芯片制造业，祖国大陆高端电子产业发展历程中，一直伴随着台湾的身影。且不论台积电在南京等地设厂，过去几十年间，联发科技、威盛电子、瑞昱半导体等台湾主要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和芯片制造商，都在祖国大陆设立了工厂或合资企业，这也进一步带动了祖国大陆芯片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之形影相随的是，台湾企业的到来，也直接催生了台湾芯片产业领域人才的西进。例如，中芯国际技术骨干很多来自台湾。

在祖国大陆众多企业自身奋

发有为和台湾相关企业协助拉抬下，祖国大陆芯片产业开始逐渐升温，水平日益提升。以封测为例，祖国大陆本土专业封测公司越来越注重专业化和精细化，以上海华岭、利扬芯片、确安科技为首的专业测试公司已经开始崭展露头角。

在代工领域，目前全球10大芯片代工厂，已经有两家中国大陆企业跻身榜单，分别为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自不待言，上海华虹半导体也是目前中国大陆第二家掌握28纳米芯片技术的代工厂。这两家企业虽然与台湾的台积电、联电、力晶等世界先进“头段企业”依然有较大差距，但持续追赶态势明显。

芯片产业发展攸关整个“新经济”兴衰，没有高度发达的芯片产业作为支撑，中国大陆力推的新基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都将被蒙上沉重阴影。目前，中国大陆在先进制程上正加紧布局，力求迎难而上，一举扭转颓势。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也迎来了历史性机遇。

在政策方面，加大对芯片产业扶持力度。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明确提出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文件要求逐渐提升芯片自给率，力争可以从目前的30% 左右，提升到2025年的70% 左右。

在人才培育方面，拉高集成电路专业位阶。台湾芯片产业如此辉煌，人才是其“通关密码”之一，目前台湾从事芯片研发的工程师就有4万多名。为了培育更多专业人才，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投票通过，将集成电路专业升级为一级学科。毫无疑问，这将为芯片设计、研发和制造建立起强大的“人才储备库”。

在材料创新方面，瞄准前沿“碳基芯片”。作为全球先进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在硅基芯片的研发上已经突破5纳米工艺，目前正在向3纳米和2纳米进军，但2纳米已经逼近了物理极限，达到了近乎难以突破的瓶颈。新材料、新技术无疑是芯片转型升级的新希望。依据目前最新研究成果，石墨烯制造工艺的碳基芯片，可以达到普通硅基芯片的10倍以上。目前，中国大陆正加紧研发石墨烯技术，有望闯出一条新路。

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芯片消费市场，在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方面市场潜力巨大。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中国大陆经济率先止跌回升，走出低谷，成为包括美日英德等全球24个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地区，这也为芯片市场的繁荣创造了重要条件。随着新基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性规划的实施，中国大陆对于芯片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未来中国大陆将利用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提高产业链水平。广大台湾芯片产业企业只有积极投入到这一潮流中来，才能把握新的历史机遇，才能提前抢占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台湾有技术优势，中国大陆有广阔市场，两岸若能联起手来，在芯片产业加速产学研，将会进一步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体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列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明确了对台工作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十四五”时期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祖国大陆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为广大台胞台企在祖国大陆发展提供更多机遇。未来祖国大陆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持续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祖国大陆发展机遇，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这也将为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广大台企到祖国大陆发展提供更为宽广的舞台和空间。

民进党当局逼近红线也逼近两岸最终统一

■ [美国] 吴惠秋

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地区大选中大幅胜出，并在岛内实现了行政和立法的“全面执政”。蔡英文当局连任以来愈加利令智昏，加大“倚美抗中”和各种“反中”“仇中”民粹操弄力度，加快了割裂两岸往来的“台独”步伐。人所共知，民进党的胜选只能表示民进党选举伎俩的娴熟及其民粹操作的胜利。客观地讲，在民进党操弄下台湾民众“台湾主体意识”上升，并不代表主流民意赞成两岸因“台独”分裂而产生两岸对抗。对两岸和平的期望和加强两岸沟通，仍是台湾民众的主流声音。可是民进党当局却一意孤行，试图不断将2300万台湾同胞和“台独”分裂图谋相捆绑，不断冲撞两岸关系的红线。世人须问，难道台湾民众不得不承受由“台独”的甚嚣尘上而带来的两岸关系“地动山摇”吗?

实际上自民进党执政以后，台湾地区“去中国化”进程加速。台湾当局以修改历史教科书为主要手段，逐步实现将中国史和台湾史分开，将“大陆”改称“中国”，采用“两国”取代“海峡两岸”。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台湾中学的《台湾史》公开宣称“台湾地位未定论”“一边一国”和“两国论”。各大学通识课程中的中国史部分全部删除，在两岸关系中以“台湾独立论”论述，强调“维持现状”的必要性。因此，从课纲到教科书，民进党当局正用尽一切手段“去中国化”，切割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连结，借由“法理台独”“文化台独”，遂行“台独”的政治目的。客观地讲，马英九执政8年对“文化台独”没有有效地拨乱反正，使“去中国化”得以不间断地延续，马英九负有历史性的负面责任。尽管祖国大陆义正词严地谴责，民进党当局似乎视之“鞭长莫及”，变本加厉，我行我素。

近来，民进党执政者迎合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甩锅”和选举政治的需要，和美国不良政客沆瀣一气，完全站到了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对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肆无忌惮地进行切香肠般的挑衅。最近蔡英文当局献媚美国主子，高调宣布开放损害台湾民众民生利益含瘦肉精的美猪美牛输台。美国又高调“解密”里根时期给予台湾地区的单边“六项保证”，其中提到不会对台湾军售设下期限、不会强迫台湾与中共谈判，等等。岛内绿营媒体趁机将此演绎成美国对台从“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更有甚者解读为美国不排除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台湾。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 (Keith Krach) 于9月中旬访台，主持所谓“台美经济与商业对话”。先前，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 (Alex Azar) 访问台湾，已被岛内绿营媒体炒作成“史上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官员。克拉奇访台又一次使“台独”势力雀跃，岛内绿营媒体继续自嗨炒作美台关系。尽管明眼人都知道，克拉奇此行只是出于美国自身政治需要，如同阿扎一样，高调在台湾四处晃悠过后，什么实际的东西都给不了台湾。而此举严重挑衅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必将会使民进党当局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美国为其自身利益和政治需求可以随时做出取舍，毕竟弃去一个“笔尖”是何等轻而易举之事，那些对“美国保证”抱有幻想者该清醒了!

9月初，民进党当局公布了精心设计的最新版所谓“中华民国”“护照”，不仅台湾的英文获得最大程度地放大，同时将所谓“中华民国”的英译缩到几乎很

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意义重大

■ [菲律宾]董拔萃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2020年注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严峻挑战，中国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心战“疫”，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在抗疫艰难时期，外部反华势力“借疫制华”，岛内“台独”分子“以疫谋独”，“仇中反中”的政治病毒快速扩散。面对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全面围堵和极限施压的野蛮霸凌，面对岛内“台独”分子认贼作父的无耻行径，中国大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决策高层运筹帷幄，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凝聚磅礴力量，坚定必胜信心，做好了随时应对任何严重情况、痛击来犯之敌和消灭“台独”人民战争的战略部署。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75周年，海峡两岸、港澳地区、海外侨社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一不能忘却的日子。

10月22日，以“纪念台湾光复 推进祖国统一”为主题的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汪洋指出，75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彻底洗刷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及其分裂行径，绝不容许失而复得的神圣领土得而复失。来自海峡两岸的与会代表在发言中，用铁的史实和法理依据，阐明台湾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重要成果之一。

回顾历史，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但“台湾士民义不臣倭”，丘逢甲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发

难发现，并将其标注成在护照所谓“国徽”外围的一圈“装饰”。护照英译也不再见所谓“ROC”。可以看到，在台海局势持续寒冷和紧张的大背景下，所谓“中华民国”“护照”的改版并未掀起太大风浪，国台办只以“搞小动作”定性台湾当局的“台独”举动。确实，相对于台海局势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严重态势来讲，所谓“中华民国”“护照”改版无疑是一个台湾当局谋求“台独”的小浪花。但正是这样不间断切香肠式的“小动作”聚沙成塔，让台湾社会在“去中国化”的路上越走越远。

民进党当局近来的内外表现确实给人一种“无限逼近红线”的感觉。可以预料，在蔡英文当局的任期内，这类无所不用其极、无节制地向红线发起挑战的动作还会名目繁多，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甘做美国马前卒，不惜挑衅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手段会更加眼花缭乱。然而，蔡英文当局的倚美抗中只会落得个美国舍弃这个无足轻重“笔尖”而去的结局。而台湾民进党当局必须明白，逼近红线也是在逼近两岸的最终统一，因为中国必须统一，中国也必然统一已经是历史的巨轮滚滚而来，不是区区螳臂可以阻挡的！

（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长）

出“风月有天难补恨，江山无地可埋愁”的慨喟，讨日檄文宣誓“愿人人战死而失台，绝不拱手而让台”。凛然大义令人肃然起敬。台北沦陷后，“保卫国土，万死不辞”的武装斗争从未停止。尽管武装反抗被日本人镇压，但抗日火种从未熄灭。

上世纪20年代，台湾反日民族运动蓬勃兴起，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反对奴化教育，反“皇民化”的文化抗日方兴未艾。台湾人民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抗争，体现永不屈服的民族气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台湾同胞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同时在台湾以各种方式配合祖国大陆抗日，牵制日军。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台湾同胞从未缺席，而且抗日斗争是最早发起，也历时最长。

历史雄辩地证明，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在攸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两岸同胞守望相助，共同谱写了反外来侵略、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壮丽诗篇。台湾光复是前辈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台湾重新纳入中国版图。

今天，令人痛心扼腕的是，台湾光复的胜利果实不被台湾当局重视，反而遭到玷污和糟蹋，台湾处于绿色恐怖与战云密布的阴霾中。

民进党当局为其“台独”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篡改教科书，歪曲历史，把祖国当敌国，把同胞当仇人，视美日为主子，“台独”分子一副恬不知耻的汉奸洋奴嘴脸令人愤慨。75年前台湾光复，现在几乎沦为外国势力严重介入和操控的“准殖民地”。原本是以生产水稻、甘蔗、茶叶闻名的宝岛，现在却是以大量购入军火，成为“高危突发地区”受到关注。台湾当局或将成为反华势力的战争“代理人”，富庶的宝岛或将成为惨烈的战场。在台湾光复75周年的今天，台湾当局为“台独”目的把台湾再度推向黑暗的灾难之中，重演历史悲剧，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绝不容许的。台湾必须有完全意义的光复，台湾同胞必须真正地融入祖国大家庭，共享民族的尊严，共同反对外来势力的欺凌打压，共担道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共建美好家园。绝不能让前辈先烈的鲜血白流，不能让失而复得的神圣领土得而复失!

在历史与现实面前，对于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否定台湾同胞爱国精神和为抗战胜利所作出的贡献，否认两岸同胞骨肉亲情，切割两岸关系的行径，应予以谴责。对于所谓的“台湾光复与大陆毫无关系”“台湾和澎湖列岛回归的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谬论同样要予以谴责。

历史不曾远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是残酷的，对台湾造成的灾难不应忘记，更不容许有人为之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建设发展，是殖民者为了能统治台湾更久，掠夺更多资源，让台湾民众驯服地为其长期服务。任何本末倒置、认贼作父的行径，都应受到谴责。

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标志着台湾摆脱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台湾人民又重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台湾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版图，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捍卫前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果实，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团结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这是海内外同胞纪念台湾光复的真正意义。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系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国际局势复杂、台海风云变幻新形势下，台湾岛内有担当的政党和有识之士，应该对局势有明确的认识，对前途有正确的选择。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普遍的国际政治常识，是台湾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都必须接受的正确认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任何“台独”分裂都是死路。任何人企图分裂中国将自绝于国家民族，成为历史的罪人。

（作者为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台湾“大一中架构”的名与实

■ 王英津

1949年10月以来，祖国大陆在两岸问题上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在“两蒋”时期也是如此，但李登辉主政时，逐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其策略手法就是通过虚化“一中”来捍卫“中华民国主体性”。20多年来，面对祖国大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刚性坚守，岛内不断有政党、团体或人士复制李登辉的手法。其中，2014年5月，台湾7位知名人士提出的“大一中架构”，就是企图在虚体“一中屋顶”下偷渡“中华民国主权”典型论述之一。在未来“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大势下，随着岛内急“独”越来越失去市场，这类以虚化“一中”来应对祖国大陆一中原则的论述，还会反复出现。祖国大陆如何因应这类貌似“一中”的论述，成为当下学界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台湾“大一中架构”之基本要义

2014年5月27日，台湾蓝绿知名人士包括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前驻美代表程建人、前海基会副董事长焦仁和与洪奇昌，前大陆事务主管陈明通与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7人（前行政部门负责人郝柏村退出）召开记者会，共同宣布他们所提出的“处理两岸关系问题的五原则”，即“大一中架构”，其基本要义包括：①尊重现状，不改变现状。②现状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起即已并存于世，而且双方政府已从“交战政府”转为“分治政府”。③“一中”原则已被部分人士窄化、僵化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名词，既无法呈现两岸现状，也愈来愈难被“中华民国”2300万人民所接受，建议用“大一中架构”取代，才能符合现状，迈向和解之路。④“大一中架构”意在“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上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以共识处理双方关切事务，作为两岸现阶段的过渡方案。⑤在“大一中架构”之下双方应消除敌对，共同维护本地区之和平与安全。双方承诺互不使用武力，且不得与任何国家签订不利于另一方的军事攻防协议，双方均享有参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原则。对于以上内容，“大一中架构”提出者反复强调，它们是一个整体，是“套餐”，倘若大陆要接受就要全盘接受，不能“单点”，即不能只接受其中的部分内容。

那么，如何看待台湾人士提出的“大一中架构”？其背后意旨是什么？是否排除了“台湾独立”的元素？为厘清这些问题，笔者做如下解析。

第一，是“捍卫台湾主体性”的架构。“大一中架构”旨在凝聚台湾社会共识，共同“捍卫台湾主体性”。提出“大一中架构”的7位人士均是长期从事两岸关系研究或实务工作的官员或学者，并非不清楚祖国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底线，为何他们还要提出如此背离一个中国原则的论述呢？笔者认为，“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因为，当时（即2014年）两岸关系正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无须再通过提出“大一中架构”来推动，从该架构五点主张看，其针对的并非是当时两岸之间亟待解决的问题。不难看出，“大一中架构”论述只是以两岸问题做导引，根本目的是在“中华民国”基础上凝聚蓝绿共识，捍卫“中华民国主体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一中架构”论述也反映出台湾社会目前普遍存在的一

种焦虑感。

第二，是虚化、否定“一中”架构。“大一中架构”要求先确定“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等地位，然后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跨两岸的“大一中屋顶”，该屋顶是一个不完整国际法人。换言之，“大一中架构”其实是希望在两岸之上建构一个松散的超国家机构。与作为一个完整国际法人的欧盟相比，作为不完整国际法人的“大一中架构”显得相对松散；而与并非国际法人的邦联相比，“大一中”则显得相对紧密。不难推知，“大一中架构”是一个介于欧盟（根据政治学的通常定义，联邦是具有国家性质与职能的政治体制，而邦联只是国家间松散的联合，其本身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国家职能。如果以这些基本标准来衡量，欧盟同时具有两者的某种特性，但至少在现阶段又很难将其划入两者的哪一类。应该说，它是介于联邦与邦联之间，且偏于联邦的一种体制。参看王英津著：《国家统一模式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与邦联之间的超国家机构。该架构在名义上要求祖国大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对等地位，实质上要求祖国大陆承认“中华民国”。该架构的问题在于其处理两岸关系的逻辑基点是错误的，即先确定两岸对等，再构建“一个中国”，以此为基点建构起的“一中”必定是虚体中国，与祖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有本质不同。

第三，是“曲线救国（“中华民国”）”的架构。“大一中架构”的提出是台湾社会在面对自身“主权”式微的情势下所采取的“被动抵抗”，企图通过主张“两岸主权共存”试图凸显“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等地位。该架构把“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列，认为“所谓现状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起并存于世，双方政府已从‘交战政府’转为‘分治政府’”。整个论述的主轴在于凸显两岸的现状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立、分治、互不隶属，以此逻辑，在“中国屋顶”之下，存在“两个中国”，一个是“中华民国”，另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质是要祖国大陆承认“中华民国”。该架构旨在“维持现状”，而“现状”就是两岸当局从“交战的政府”变成“分治的政府”，其实质是维持台湾“事实独立”的局面。

第四，是“独台”与“台独”合流的架构。五原则自始至终没有提到“统”字，虽有“一中”二字，却背离一个中国原则，是“事实台独”论述。正如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张麟征教授认为，“大一中架构”旨在虚化“一中”，实化“台独”或“独台”，是“台独”与“独台”的汇流。从民进党的角度看，其既不接受“两岸一中”，也不接受“中华民国”（仅接受“中华民国”为暂时“国号”）。倘若民进党接受“大一中架构”，意味着其从不接受“一中”到接受一个虚体“一中”，表面上看这是民进党的进步，但实际上这是“以退为进”的策略，旨在以仅接受近乎虚体“一中”的低廉代价换取祖国大陆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从国民党的角度看，倘若其接受“大一中架构”，即意味着从实体“一中”立场倒退至近乎虚体“一中”的立场，从不承认祖国大陆政权的合法性到承认祖国大陆政权的合法性，从“一中”论述倒退至“不统不独”的“事实台独”论述，这等于偏离了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中华民国”论述，向绿营不断靠拢，趋向“中华民国台湾化”。

回顾2014年5月7位台湾人士提出“大一中架构”后，祖国大陆并未予以强烈批判，这并不意味着祖国大陆接受该论述。笔者认为，当时祖国大陆未予以强烈批驳的原因在于，尽管提出“大一中架构”的7位人士中有人曾在公权力部门任职甚至身居要职，但在提出“大一中架构”时，他们的身份却是民间人士，其观点仅能代表部分台湾社会人士的观点，并不代表执政当局和政党。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台湾社会，这是不难理解的。但倘若是台湾执政当局或主要政党提倡依据“大一中架构”

祖国大陆“一中框架”与台湾“大一中架构”比较

	祖国大陆“一中框架”	台湾“大一中架构”
论述基点	将“一个中国”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然后在此前提下处理两岸关系	将两个“分治政府”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处理两者与“一个中国”的关系
“一中”虚实	实体“一中”	近乎虚体“一中”（带有某些实体成分）
论述实质	一国一府	“一国两府”或“一中两国”
论述性质	强调“两岸一中”，是“一中”论述	暗含“一边一国”的意蕴，是“一中”名义下的“事实台独”论述
国际法主体	单一完整国际法人	两个完整国际法人＋一个不完整国际法人
“一中”时态	“现在时”	不确定的“未来时”

来处理两岸关系，问题的性质就大有不同，两岸关系就会倒退至李登辉时代的紧张状态。

二、台湾“大一中架构”与祖国大陆“一中框架”之比较

台湾“大一中架构”与一个中国原则相距甚远，主要体现在如下6个方面：

第一，论述基点不同。长期以来，两岸关系中一直存在着如何处理“一个中国”（简称“一”）与“两个政权”（简称“二”）之间关系的问题。祖国大陆“一中框架”是在“一”的基础上处理“二”，而台湾“大一中架构”则是在“二”的基础上处理“一”。可见，两者论证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有着本质不同。

第二，“一中”虚实不同。祖国大陆“一中框架”下的“一中”是实体意义上的中国，而台湾“大一中架构”下的“一中”是近乎虚体的中国。后者主张“中国为不完整国际法人”，相

较于李登辉时期的“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带有某些实体成分；但相较于祖国大陆的实体“一中”，其实体成分又微乎其微。这表明台湾“大一中架构”既不是实体架构，亦并非完全的虚体架构，而是“实中带虚、虚中带实”的“半实半虚”架构。

第三，论述实质不同。祖国大陆“一中框架”的实质是一国一府，而台湾“大一中架构”的实质则是“一国两府”或“一中两国”。台湾“大一中架构”使用了“分治政府”代替“分治国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国家”一词，但并不表明其不是“国与国”定位。

第四，论述性质不同。祖国大陆“一中框架”强调祖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一中”论述；而台湾“大一中架构”则是强调“一中”屋顶之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等并存，旨在凸显“中华民国主体性”，是“事实台独”论述。

第五，国际法主体不同。祖国大陆“一中框架”是单一国际法主体；而台湾“大一中架构”则是一个不完整国际法人，该架构之下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完整的国际法人（根据施明德的解释，“完整的国际法人”就是“国家”，“不完整国际法人”是指“享有部分主权组织”，例如，欧盟、联合国、邦联或国协）。

第六，“一中”时态不同。祖国大陆“一中框架”下的“一个中国”是现在式，强调目前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尽管海峡两岸存在着未统一状态，但中国的主权是统一的；而台湾“大一中架构”下的“一个中国”则是不确定的未来式，即未来两岸并非确定不移地走向统一，统一仅仅是一个选项。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大一中架构”与“一中框架”有着本质区别，其中所谓的“两岸分治”“‘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组一个不完整的国际法人”等内容包含有“独台”“台独”“两个中国”和“一边一国”之意涵，因此不可能被祖国大陆所接受。

三、台湾“大一中架构”之评议

如果“大一中架构”仅仅作为一种观点、主张而存在，其对两岸关系并没有过多影响；但一旦有政党将其作为处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那么它将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假如未来台湾社会某政党主张以此作为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祖国大陆该如何回应？这就要求祖国大陆未雨绸缪、提前研判上述情况可能会对一中原则造成的伤害，以便及时做出应对。

第一，该论述是凝聚“台湾共识”、共同“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的论述。台湾蓝绿两大阵营的两岸政策立场日渐靠拢，“中华民国台湾化”逐渐成为台湾社会的新共识。倘若祖国大陆接受这一共识，可能会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局面；倘若不接受，则可能面临岛内蓝绿阵营与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未来两岸政治谈判将难以启动。该共识一旦形成，将对祖国大陆涉台政策形成巨大挑战。

第二，该论述表面上助推但实质上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短期看，“大一中架构”将直接影响到蓝营对“九二共识”的承认，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两岸互动交流。一旦“大一中架构”在台湾社会变成“全民共识”，政治精英和主要政党迫于选票的考量，就会倾向于这个共识性表述，进而对“九二共识”造成冲击，动摇国共两党互动合作的政治基础，“不统不独”局面将长期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台湾“大一中架构”与台湾原有的“一国两府”“一国两治”“一中两宪”“一中三宪”“欧盟模式”“德国模式”等许多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单从架构上看，它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创新设计，然而，若从论述倡导者的构成看，它却有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就是：该论述由蓝绿人士共同提出，是台湾社会各界凝聚共识、联手作业的产物。这一做法在岛内尚属首次，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政治动向，值得祖国大陆高度关注。

凝固的岁月——寻访台湾义勇队在福建武夷山史迹

■ 杨瑞荣

80多年前，一支由台湾同胞独立组成的抗日义勇队在武夷山组建，在李友邦将军带领下，胸怀“保卫祖国，光复台湾”的爱国信念，积极投身祖国抗日，其斗争足迹遍及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影响远及东南亚。

1938年5月，金门、厦门相继失陷，福建省政府将留居在福州、漳州、泉州、晋江、连城、东山沿海的台湾同胞433户、1535人，先后分4批送到崇安县（现在的武夷山市）安置，并成立“台民垦殖所”，附设“台童教养所”。

1939年，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的国民党少将李友邦，在武夷山组建了“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他们以武夷山为根据地，培训了大批台籍青少年，在浙东、浙南、闽南一带抗日前线以及后方各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组成部分。

2019年9月11日，笔者陪同东南广播公司记者，沿着当年台湾义勇队留下的足迹，拂去历史的尘封，寻找台湾抗日义勇队那段在武夷山的峥嵘岁月……

李友邦，1906年4月10日出生于台北市郊芦洲，祖籍泉州同安县兑山村，现在是厦门市集美区后兑山村。1939年2月，李友邦奉周恩来指示，与中共地下党员张毕来（已故全国政协常委）在武夷山组建台湾义勇队。台湾义勇队大部分都是医生，同时承担对敌人进行政治瓦解和搜集敌军情报等工作。

1943年，在日军占领的厦门，台湾义勇队展开了三次军事行动。

第一次6月17日，义勇队突击队化妆成游客，走亲访友。夜晚全部集中到日本经营的一个兴亚院附近，突击队员向兴亚院投掷了数百枚炸弹，摧毁了日本鬼子居住的兴亚院。首战告捷大长了抗日人民的声威，给日本侵略者一次沉重打击。

第二次6月30日，再次袭击兴亚院，距离第一次袭击兴亚院仅仅13天。他们晚上悄悄地向日军建的油库附近投弹十几枚，把油库全部摧毁，震动了整个厦门岛，厦门人民拍手称快。

第三次，攻击油库成功第2天，日本侵略者在厦门市伪政府举办庆祝3周年大会，以示武运长久。台湾义勇队组成一支突击队，埋伏在会场周围，从不同角落向会场投掷手榴弹数十枚，炸死日伪军数十人。台湾抗日义勇队3次在厦门取得抗日战斗成果。

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成立后，立即奔赴抗日前线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他们有的从事医务工作，为抗日部队和人民群众医病治伤，自办医院，为抗日军民免费治疗；利用武夷山作为根据地，收集抗日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浙江金华一带抗日前线。有的发挥能读、会讲日语特长，参与对敌政治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积极发起台湾复省运动和参加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

许多散居在闽南一带的台胞闻讯后，长途跋涉奔赴武夷山。台湾义勇队人数从最初的108人猛增到1500多人。

笔者和记者一行踏上古驿道探寻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留下的摩崖石刻。在武夷山苍屏峰麓岩壁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醒目的摩崖石刻：“打倒日寇，保我中华”。这是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在武夷山留下的抗日标语。几个大字虽带着稚气，却闪耀着中华儿女抗击外敌必胜的决心。

当年台湾少年团组成后，和